

目 次

编辑室报告：一种学术资源的再分配.....i-iv

论文

记者的另类诠释社群：对一个组织外新闻空间的民族志研究...王海燕 /

1

空间、科技、与声音：新老工人阶级文化空间的比较研究.....

王洪喆、邱林川/ 27

中国独立电影创作的场域分析, 1990-2013邱海棠 / 61

韦依思想的当代意义：一种对新自由主义的古希腊史诗精神反思...

王贺白/ 99

现场报告

来去西安：一名台湾教师在彼岸的教学经历与见闻.....余阳洲/ 137

主题介绍与书评：文化与自由贸易(2)

Unesco 与 WTO、文化与经济.....编辑委员会/ 161

「文化例外」与《文化多样性公约》在中国：

从十本年度报告说起.....编辑委员会/ 179

稿约

稿约详情请见 <http://twmedia.org/archives/502>

· 传播 文化 与政治 · 第二期
2015 年 12 月

编辑室报告： 一种学术资源的再分配

台湾、中国大陆、香港与澳门 32 家大学今（2015）年 11 月集会，「承诺共同订定中文学术期刊的评鉴标准」，因为「我们的语言和文字，承戴了我们的文化、历史和价值」（张谦，2015 年 11 月 18 日）。

重视母语，天经地义；期刊评鉴，可以讨论。

在香港与澳门，受限于历史，发展学术中文期刊比较晚些。在台湾及中国大陆，虽以中文期刊为主，却有奇怪的现象，此及学术评鉴的参照，如同港澳，不一定重视中文期刊。

若能治愈看重外文写作这个「有失国格」的宿疾（台湾前教育部长黄荣村语）（反思会议工作小组，2005，页 345-346），两岸四地的大学想要共同制订定期刊的评鉴标准，是有至为根本的价值，所有中文刊物无不应该支持。

不过，万事仍得退一步设想。海外期刊若能知名、形成特色，似乎是通过时间的考验、沉淀与学界口碑，是逐步积累的过程，是学术论文之阅读社群自发自洽的结果。

然而，在两岸行有多年，学术期刊的等第划分，是学术行政机关促成。

但是，与其介入期刊等第的划分，学术行政机关（与学术社群）应该研究的是，华文学术期刊欠缺哪些条件，以致无法如同海外期刊的通例，假以时日而凸显各自的特征，并在学术社群形成不言自明的认知？

比如，两岸行政权力涉入期刊评鉴的程度，虽有差异，但对学术期刊的健康与茁壮，是否适得其反，造成了伤害，不一定是提携？

学术人的工作，不外「教学」（若在不招收学生的机构，如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则无）、「研究」与机构内外的「服务」等三个项目。决定是否能够在本机构继续工作，以及职等是否升迁，在台湾主要依靠研究成果。这个时候，主要的评估依据，得看当事人的论文（期刊、专书、会议论文…等等）质量，通常是委由机构外的同行数人审查。

此时，接受考核的情况，可能有甲乙两类。甲类涉及非同行审查，可能

需要参考期刊的等第。乙类是同行相互审查，应该无须假借期刊的等第，又可以分作两种。

先说甲类，划分期刊的等第若有些必要，这可能是唯一情况。常见的例子是，高教行政机关要从许多，比如十个，不同的专业领域，决定较少的人，比如五个，给予额外肯定与奖励。这个时候，是有可能无法完全同行考核，于是出现期刊的高低等第，以及受奖励者的发表数量，可能成为重要的获奖参考，乃至依据。

但乙类的两种考核，都是同行审查，应该无须参考期刊的等第先后。第一种是今日的我，比昨日的我。是看今昔之间，短则两、三年，多则七、八载，我是不是已经有了合理的进步，达到了升等的要求，或符合留任的要求。

这个时候，机构外审查人的责任，是在详细阅读受考核人所提供的代表著作（通常在一至三份，佐以其他参考），质量是否符合水平，他或她的学术判断，可能与期刊审查人的认定相同，可能不同，但若说期刊审查人的份量，理当高于机构外审人的权威，并无道理。

乙类的第二种情况是，在本行数人之间，互作匿名比较，如台湾科技部的年度研究案申请。此时，申请人的过往研究表现，加上当年的申请计画本身，共同决定了结果。多年来，各个学门申请的通过比例，似乎略有下降，但也许仍在 40-50% 左右。但是否下降，不是重点，重要的是，此时的审核仍然是同行考核，负责审查的人同样是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因此对于申请人研究表现的评价，与乙类第一种相同，其权威与期刊的审查人，不应该有任何高低的差异。

就此来说，高校机构在考核学术人员的升迁与留任，科技部在决断申请人的学术表现时，如果用暗示，或以明示的文字，要求审查人给予特定类型的期刊（无论是外文资料库期刊，或是本国行政机构认可），较为优厚的评量，并不恰当。

学术行政机关并非不知道期刊强行划分等第之害。因此，台湾行政院科技部的前身，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的主委与三位副主委，即曾联名在报端发表评论（朱敬一、贺陈弘、牟中原、孙以瀚，2012 年 6 月 25 日）。他们表示，无论是比较粗糙，仅看期刊是否收入（海外）商业学术资料库，或是更进一

步，将期刊的所谓影响因子列入计算，这些「科研指标」在台湾学界推展十多年来，除了必有「人文社会的应用…局限」，其在自然科学的弊端，也已经明显得让他们不得不强调，「学界过度评比科研指标的趋势，应该予以稍遏」。

科技部长徐爵民今年五月更进一步，他说，〈大学争世界排名 科技部长：没意义〉（陈皓嫻、陈智华、沈育如，2015年5月13日）。排名没有意义，排名所经常依据的期刊等第，以及期刊论文的发表数量，若有意义，不会太大。

学术行政机构介入期刊等第的划分，常态是委请学术人依据指标审查，但是，不公正或根本不可能公正的情况，早就在所难免。更大的缺点则是，它排除了通过学术社群的使用经验，逐步由学界自己认定与形成，从而是更有价值的、属于真正自治的评鉴。

学术行政机构与学术社群愈早集体改正这个窠臼，对于学术及其期刊的健全，愈有帮助。但行政权力尚未行动之前，学术社群尚未集体行动之前，个体仍然可以自行作为，投入「学术资源再分配」的行列。

依据现制，学人而特别是需要接受机构考核，决定是否能够升等，或继续留任与保有工作权的人，往往倾向于向行政机构所认可的期刊，投递文稿。这个现象可以理解，无足为奇。不过，学人在学术行政还没有改变之前，仍然可以从三个层次，为改善学术研究的评鉴，有所贡献。

一是审查学界同仁的研究表现时，仅考量其论述本身的质量，期刊在所不论。其次，不标示研究成果所发表的期刊，是否进入行政机关的认可之列。其三，行政机关所认可的期刊，仅是次要投递论文的对象，学人可以变更常态，优先向并未列入行政机关所认可的期刊，作为首选的投稿对象；若能如此，最后这个作法会是学术资源的一种再分配，资深的人向新兴刊物移动，挪出的主流刊物空间，可以让学术新秀进驻。

以上三个层次的个体贡献，愈是资深、愈是没有升等压力，也无意跨领域竞逐行政机关肯定与奖励的资深同仁，愈是会有贡献的能力。如同社会的健全，需要各尽所能，学术的健全，同样需要有这个认知与客观条件的学人，尽力于斯。

《传播、文化与政治》编辑委员会
2015 年 12 月 13 日

参考书目

- 反思会议工作小组（编）（2005）。《全球化与知识生产：反思台湾学术评鉴》。台北：唐山。
- 朱敬一、贺陈弘、牟中原、孙以瀚（2012 年 6 月 25 日）。〈我们该如何看待「科研指标」？〉，《中国时报》，A14 版。
- 张谦（2015 年 11 月 18 日）。〈两岸四地拟订中文学术评鉴标准〉，《中央社》（香港电）。取自 <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511180283-1.aspx>
- 陈皓嫻、陈智华、沈育如（2015 年 5 月 13 日）。〈就算进世界百大 但社会贡献是什么？大学争世界排名 科技部长：没意义〉，《联合报》，AA4 版。

记者的另类诠释社群： 对一个组织外新闻空间的民族志研究

王海燕*

本文引用格式

王海燕（2015）。〈记者的另类诠释社群：对一个组织外新闻空间的民族志研究〉。《传播、文化与政治》，2:1-26。

投稿日期：2014 年 9 月 28 日；通过日期：2015 年 2 月 15 日。

* 作者王海燕为广州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e-mail: haiyan.wang2009@gmail.com。

《摘要》

传统的新闻学研究通常倾向于在新闻室的情境中考察记者，而很少关注新闻室之外的空间。本文考察的正是后者，即在新闻室之外的空间，一个记者的诠释社群如何形成。本文具体的研究对象是广州一家以记者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酒吧，名为「凸凹吧」，透过民族志研究，本文发现，在总体压抑的媒体大环境下，凸凹吧作为一个游离于组织之外的记者空间，吸引着大批同气相求的记者加入其中，在同行互动的过程中，他们建构着一套另类的职业价值观。

关键词：中国媒体、凸凹吧、组织外新闻空间、诠释社群、新闻专业主义、论述实践

壹、 导言

传统的新闻学研究倾向于将新闻和记者置于新闻机构和新闻室的背景之中来考虑（见 Breed, 1955; Gans, 2004; Schudson, 1978; Shoemaker & Reese, 1991; Tuchman, 1978; Tumber, 1999），新闻（news）常被窄化为「新闻机构制作的新闻」，新闻业（journalism）等同于「基于某个新闻机构的行业」，新闻记者（journalist）等同于「新闻室情境中的记者」。而新闻室之外的空间里的新闻记者和他们从事的与新闻业相关的活动却被极大地忽视，相关研究更是严重缺失，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和局限了我们对新闻业和新闻记者的理解。

新闻室之外的空间，对新闻业有着与新闻室之内的空间同样的重要性，承载着很多与新闻室之内的空间同样的功能。在这个空间里，记者的社会化同样在进行，身份的认同同样在塑造，新闻业的边界同样在界定。而更重要的地方在于，它可能为新闻室之内的空间所不为。它超越了新闻室的机构和组织的局限，突破了传统的通过专业（profession）和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这一框架来看待新闻业的方式，把新闻和记者放在社群（community）的背景中来考虑，它不再视记者为新闻业的唯一行动主体，在记者之外，阅听人、消息来源、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等都可以在这个空间出现、互动，并相互影响，形成意义、话语和一个诠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

基于此，本文试图探索的是，在组织外的空间里，记者与不同行动主体之间进行着怎样的互动，这些互动如何对记者造成影响，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新闻作为一个职业又是如何被重构。本文采纳诠释社群的理论框架，具体考察的对象是广州一个知名的记者社交据点，一个名为「凸凹」的酒吧，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民族志研究（ethnography）。

研究记者在新闻室之外的空间在中国大陆有着特别的意义。这一空间的存在，在媒体自由的国家和社会也许并不显眼，但是在中国大陆却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大陆的新闻改革开展至今已有 30 年，其成效不可谓不大，尤其是在推动媒体市场化，丰富新闻产品等方面（Lee, 1990, 1994; Zhao, 1998,

2008)。但在另一方面，对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却始终未见松懈，新闻机构几乎无一例外地仍为政府所有，并受官方严密管制，机构制作的新闻常常必须与官方话语一致，体制内的新闻工作者常常必须服从党和政府规定的行为准则，违者得咎（He, 2000; Lee, He, & Huang, 2006, 2007）。在这样一个压抑的新闻业气氛中，新闻记者不可避免地感到新闻室内空间的局促和制约，这使得他们在寻求组织机构之外的活动空间上比媒体自由社会的记者更为积极和踊跃。比如，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网络上写博客，在 BBS 上开记者论坛，组建同行之间的即时聊天群，组织地下的记者联盟、开办专对记者的酒吧，举行非正式的记者沙龙，等等。这些组织外的空间，无论是在线的还是线下的，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都是记者的重要活动场所，都是新闻业被定义和重新定义的重要时刻，为新闻学研究者所不能忽视。

贰、诠释社群

新闻室之外的记者空间，可以看作是一个诠释社群。在这个诠释社群里，记者们在同行之间以及与其他社区成员进行日常互动的过程中，形成共有的话语和论述，建构、分享、再建构共同的意义。

「诠释社群」的含义，与社群建构的问题密切相关。一个社群的形成，地理原本是必要条件，上个世纪德国社会学家 Ferdinand Tonnies（1957）做出的对「社群」（Gemeinschaft，即：community）与「社会」（Gesellschaft，即：society）的区分即以地理为划分社群的重要因素。但是，进入现代社会和大众传播时代，人们对社群的理解，已经超越了对地理的、客观物质性存在的认识，而是进入了是非地理的、文化层面的强调。「社群」存在于主观的文化建构中，社群是「意义的社群」（community of meanings），是「实践的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 Wenger, 1998），是「想象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y; Anderson, 1983），甚至是「虚拟的社群」（virtual community）（Rheingold, 1993; Turkle, 1995）。

诠释社群的概念与文化建构派的社群观点一脉相承。对于一个诠释社群来说，最重要的构成要素是意义。美国文学理论学者 Stanley Fish (2003) 曾用诠释社群的概念解释为甚么一群不同的人在阅读同一个文本时能得到大体一致的体验，他认为这些散落在世界各个不同角落的人能形成一个类似社群一样的共同体，是因为他们面对文本时有一套大体相同的诠释策略 (interpretive strategy)，而这套共享的诠释策略是从相似的社会、文化、教育背景，相似的社会化过程中得来的；因为共享一套相同的诠释文本的策略，并共享相同的意义，这些人成为一个「诠释社群」。与文学领域共通的是，在新闻的领域人们也通常面对各种不同的「文本」，只不过这种文本不是以诗歌、散文、戏曲等可触摸的文学形式出现，而是一种无形的「社会文本」(social text)。某种程度上，新闻工作即是关于记录、解读或者分析社会文本的工作，新闻业即是基于这些社会文本而形成意义的场所。

与诠释社群是个意义的社群的观点不可分割的是，诠释社群同时也是一个实践的社群。实践是文化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指的是社会群组之间进行互动、在此过程中创造意义、并影响行动的过程，不同的实践将导致不同的意义系统的形成，实践是形成意义的过程和方式 (Hall, 1982; Williams, 1977)。新闻业是这样的一种实践，它是一种互动，是一个过程，是不同的行动主体在进行文化、社会互动的过程中解读社会文本的意义并将其呈现于大众面前的过程。人们通常的看法是新闻业的行动主体是以记者和他们的新闻机构为中心的，但是在一个诠释社群中，记者和新闻机构远非唯一的新闻实践者和新闻定义者，新闻并非仅仅根据新闻从业者追求的专业标准，或者新闻机构的商业诉求来书写的，也是根据现实社会的权力关系，甚至是在记者们在与新闻源的日常社会互动中形成共识性价值的过程中被书写的 (Berkowitz & TerKeurst, 1999; Ettema & Glasser, 1998)。

同时，要谈论诠释社群，也离不开时空情境的问题。无论是话语的实践还是意义的建构，都是在一定的时空中进行的。当然，这个时空已经超越了传统社群的地理局限。这个时空情境是一个文化层面上的场所，是行动主体进行话语实践和建构意义的场所。新闻业的诠释社群所存在的时空情境，不仅仅是在新闻机构里面，在新闻工作者朝九晚五或者更长一些的办公室时

间，同时也存在于机构之外、办公时间之余。正如 Zelizer（1993）所说，专业的情境并非新闻实践的全部，记者的新闻实践存在于多重的时空维度中，可以是在专业的新闻报导中，也可以是在新闻报导之余，可以在业务探讨的杂志、传记回忆录、职业讨论会、记者协会中，甚至是在记者之间非正式的业余社交活动中。通过在这些不同时空情境中的互动和实践，包括记者在内的新闻行动主体们形成一套共有论述和共同的解读公共事件的方式，从而形成一个新闻业的意义社群。

作为一个非正式的组织外的空间，凸凹吧是一个超越了专业和组织情境的另类新闻业诠释社群。这个社群，不是仅是地理上的、物质上的，更是文化上的，意义上的，主观建构的、象征性的诠释社群。而这个社群的存在，是由于包括记者、阅听人、新闻源等在内的社群成员之间进行的互动实践，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一套共有论述和意义系统。

因此，借助上述诠释社群的理论框架，本文带着以下问题来考察凸凹吧：

- （一）时空情境：凸凹吧存在于怎样的时空情境中，与新闻室的情境有何不同？
- （二）行动主体：凸凹吧里有哪些行动的主体？
- （三）话语实践：这些不同的行动主体之间进行着怎样的互动和话语实践？同时，在这些话语和实践的进行过程中，记者们建构一个怎样的新闻业？

参、凸凹吧概况和研究方法

凸凹吧创办于 2006 年 4 月。创办人北风曾经是资深的媒体人，也是知名的博客作者、网络观察员和媒体评论员。办凸凹吧的初衷，与他的媒体职业本无关系，因为在媒体工作之外，北风还是一个「驴友」，即旅游发烧友，户外活动的爱好者，他办这个酒吧本来想以户外活动为主题，以户外活动者为目标消费人群。但是逐渐地，他发现单靠「驴友」的消费不能支撑一个酒

吧的经营，反而到酒吧来的人当中，来自于他工作上的记者朋友远比来自于他业余兴趣方面的「驴友」多而且积极。而事实上，广州的媒体人也许早就在寻找这样一个合适的聚会场所。广州作为中国南方的媒体重镇，有着数以万计的媒体从业人员。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外地来的移民，在这个城市无亲无故，下班之后无处可去，正需要一个社交、聚会的场所。因此，当出现凸凹这样一个媒体同行开办的廉价酒吧，记者们就成群结队地来了。两方面的需求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凸凹吧顺势转变成了一个记者吧。每天晚上，都见当地的记者们三五成群地来到这个酒吧喝酒聊天，谈论的话题，大到国内政治、国际形势、媒体制度、新闻自由，小到工作的得意和不得意、编辑部的流言蜚语谁是谁非，等等。无形之中，凸凹吧成了一些编辑记者在新闻室之外的重要活动空间。作为记者吧的凸凹一度名声在外，不仅本地媒体人，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记者、公共知识分子，学者、律师、社会活动家等均见参与其中，其活跃状态一直持续了四年六个月，直到它在 2010 年 10 月间在广州亚运会召开前夕突遭关闭。

本文的分析资料主要来自在凸凹关闭之前进行的参与式观察。在 2010 年 1 月至 3 月之间，笔者曾对凸凹进行密集的田野观察，其间几乎每周都参与凸凹的聚会，每次的时间在 1.5 到 5 个小时不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分析资料是在凸凹关闭之后得来的。笔者原本打算在 2011 年对凸凹进行新一轮的参与式观察，但其时凸凹已成历史，因此，资料收集工作主要转向以访谈为主。从 2011 年的下半年以来，笔者以滚雪球式的方式寻访当年凸凹酒吧的参与者，一一进行深度访谈，访谈持续至 2012 年 8 月，共有 72 人接受访问。这些访问材料在本文中部分得以运用。

肆、凸凹吧时空情境和行动主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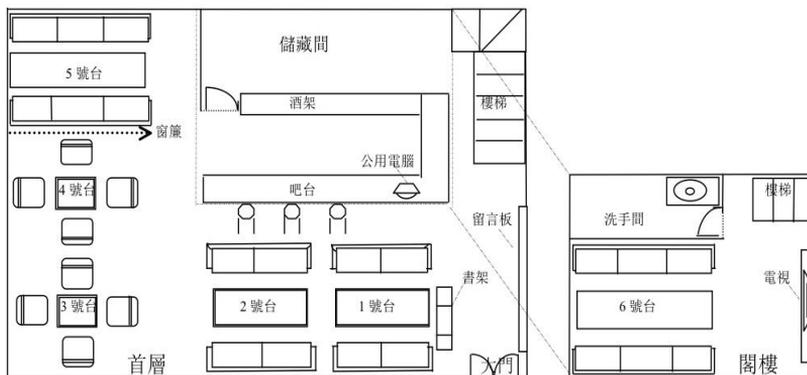
凸凹吧的物理形态是一个酒吧，这构成了它与新闻室空间基本的不同。凸凹吧的地理位置（见图一）位于广州市中心的天河区，在广州最繁忙的购物场所——天河城大厦和正佳广场的背后，一片被叫做「天河南」的街区里面。在广州的城区布局中，这里属于闹市区、商业区。作为广州市区内三大主要的酒吧区之一，这片街区聚集着数十家不同风格不同档位的酒吧，凸凹与它们一样，隐蔽在一片灯光昏暗、上了年纪的民宅群里。与通常来说明亮

而通透的新闻机构的办公环境，或者银行、律师楼、政府部门相比，这里显得低调而私密。而从时间上来说，凸凹吧存在于一个与新闻办公室情境几乎颠倒过来的情境中。白天的凸凹吧通常消失在被遮掩得严严实实的铁卷帘帘背后，只有在晚上 8 点之后开门迎客，它才作为一个空间而出现，这样的时间安排与朝九晚五的新闻机构办公时间完全错开。

图一：凸凹吧地理位置



图二：凸凹吧内部布局



凸凹的室内布局（见图二）可说极其简陋，比一般的酒吧更加朴素，甚至称得上寒碜。但与其他酒吧不同的是，它却处处透露着与新闻界的联系。推门进去，可见一个大约五六十个平方米的空间，呈一个不规则的「L」形，L的长边是一个用红砖搭起的吧台，和与吧台平行的是两圈藤条座椅（而不是更柔软舒服的皮沙发或布沙发），被称为主聚会区，大约可容纳十来个人落座。「L」的短边，是另外两圈同样是藤条编织的座椅，相对独立，各可就座五到六人。吧台上摆放着一台立式电脑，可以供人随时上网和查阅资料，经常停留的页面除了QQ、twitter、饭否¹等社交网站之外，还有各类中英文的新闻网站。酒水架上是有各种各样的啤酒、米酒、葡萄酒、茶、饮料等，标价从5元到30元（是一般酒吧价格的一半）。吧台旁边有一个书架，放着各种各样的报纸和杂志，甚至有几本以政治为主题的书籍，右边是一面非常醒目的被称作「留言区」的墙壁，上面嵌着一张照片，为当时外媒大力报导的热点新闻人物——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有一件白T恤，上绘寓意支援刘晓波的黄丝带，各种各样的留言和各色人等的签名，很多都是耳熟能详的城中记者、编辑的名字。这样的景象值得吾人特别关注，这是一个对时事政治和公共事件感兴趣的人经常光顾的地方。的确，尽管凸凹吧在装修布局上乏善可陈，但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在2006到2010年之间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在广州媒体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凸凹吧吸引媒体人的原因有很多，这其中地理的因素、经济的、社会的因素，也有职业的因素，言论环境的因素。最表面的原因，是因为凸凹的便利的地理位置和廉价的消费。如图一所示，凸凹距广州最大的地铁中转站之一「体育西」步行5分钟，交通非常方便。而广州的媒体机构绝大多数都分布在它方圆几公里范围内的员村、五羊新城、环市路一带，对很多记者来说，下班后从办公室到凸凹仅是三四站地铁或十几分钟的计程车距离。而且，凸凹的酒水比较低廉，不设最低消费，一般情况下人均消费不超过50元，这与绝大多数广州记者们月薪5,000至10,000元（Lin, 2010）的收入水

¹饭否为中国大陆首批提供微博客服务的网站之一，2007年成立，用户数量一度高达百万。

平相匹配。如同一位经常光顾凸凹的记者（I8²）所说：「它就是一个廉价的、随意的（酒吧），它不是那种新锐的、或者是商务人士的，就是适合文化人的。知识分子就是没甚么钱，比较穷一点的，到那里就像去路边的一个大排档一样的感觉，不用担心价钱。」此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很多中国城市一样，广州是一个移民城市，而记者是这个移民城市日渐增长的新移民大军中重要的一群。统计数据显示，广州的媒体从业人员 97% 拥有大学学历，47% 为单身未婚（Lin, 2010），并且超过一半以上为来自其他省份的非本地人口。他们在这个城市缺少传统的社交网络，在凸凹吧与同行之间的交往构成他们社交的重要部分。正如一位原籍西南一省份的记者（I22）如此解释他热衷于参加凸凹记者聚会的原因：「过去我们有邻里、有亲戚、有各种各样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了，来到广州，大家都是外地人，一种漂泊的状态，又都是单身，跟你接触最多，交际最多的，就是你的同事，这时候有凸凹这样的地方，大家自然就去得多。」此外，相对于现代社会的其他职业群体，如医生、律师等，记者的角色并非高度职业化，多多少少还带有一定的游侠式的浪漫气质，尤其是中国的记者，他们身上仍然深刻继承着中国士大夫知识阶层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论政」的传统和「报人报国」的情怀（李金铨，2008, 2011），这使得他们热衷于参与这类聚会场所。如 I8 所说：「基本上就是一帮人高兴，就去那儿聊天，说好听点叫指点江山纵横捭阖，说不好听点就是表达欲太强，（凸凹）满足了这样一些人旺盛的表达欲，就是有话要说，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人。」

然而，凸凹吧能将记者们聚集起来，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广州既压抑又开放的新闻从业环境。如本文开篇即提及的一样，作为一个言论自由尚未开放的国家，中国的新闻从业环境总体上是压抑的，新闻室的压抑气氛，将记者们倒逼到新闻工作之外的空间进行相对不受约束的交流和表达。如同凸凹吧的创办者北风所形容，他和他身边的媒体人日常的工作状态就像是：「一只飞进玻璃瓶的蚊子，看得见光明，却找不到出路」。而另一方面，在压抑的大氛围之下，广州的新闻从业环境又是相对宽松的。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

² 「I」为 interviewee 的缩写，「8」为访谈对象序列号，「I8」意为第 8 位访问对象。下同。

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和政治开明的历史传统，使得广州成为中国最为开放的媒体市场之一，也造就了广州相对活跃、多元的记者文化，广州的记者相较内陆省份的记者，心态更加开放、视野更加开阔，更愿意接纳和包容新的思潮、新的实践，这为记者吧的存在准备了条件。一位观察凸凹多年的广州学者如此评价：「广州这个地方，它的媒体很强势，它这个强势是不仅仅因为媒体本身，而是因为通常这帮媒体的人，不服软不服输。所以，这（凸凹）跟这个城市的性格有关，跟这个城市的记者的性格有关，这种激情，是别的地方没有的。」（I13）因此，在这样一个既压抑又开放的环境中，很多记者甚至投入比日常所从事的新闻工作更大的热情参与到这样一个机构之外的空间中。一位在党媒工作的编辑的说法很有代表性，他认为他在理念上毫不认同他所服务的媒体，「这只是我的一份工作，跟我一贯所追求的东西很大距离」，因此，「基本上，每天一回到办公室，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所有通讯工具打开，手机、MSN、QQ、邮箱，统统打开，等着看今天晚上哪些人去（凸凹），有什么活动。然后下了班，单位附近随便吃点东西，坐个地铁就去了。」（I12）

作为一个记者吧，凸凹最核心的参与者是广州本地的各类媒体记者，他们或为传统媒体工作，如报纸电视，或为新媒体工作，如网络新闻机构；他们可能是党管媒体的工作人员，也可能是市场化媒体的工作人员。他们中的很多人来凸凹的频率相当繁密，多的甚至是「只要是在广州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去」（I9）。但是，除本地媒体人之外，凸凹也是一些出差或者路过广州的外地记者经常光顾的场所。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时事杂志编辑说，凸凹是他在广州的必到之处，因为这里是见广州的同行最方便的地方：「每次到广州就有一些（媒体）朋友要聚会，聚会的时候约到哪里呢？（他们）自然就把我给带到那儿了，而且当时那个凸凹正好又比较活跃，很多同行去那里，在老朋友之外，每次还能认识到新的朋友。」（I28）与此同时，一些境外媒体的记者也经常来到凸凹，这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的媒体记者，也包括国外媒体机构的记者和他们的本土助手。由于在中国大陆的采访活动受限，这些境外记者来到凸凹，除了与中国同行交流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想通过凸凹了解中国和正在发生的新闻。笔者在对凸凹进行参与式观察的

过程中，曾多次相遇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的媒体记者，他们有的在广州驻站，有的是专门从临近的香港记者站赶来。其中一次是 2010 年的 3 月 23 日，适逢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谷歌因宣布退出中国，一位日本驻华记者为此专门来到凸凹了解「中国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以便为他即将发回日本的电讯报导增加内容。从凸凹吧其他参与者与他既热情又随意的招呼方式来看，他显然已是凸凹的老顾客了。

由此可见，凸凹作为一个记者吧，搭建的是一个跨媒体的交流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无论是来自本国媒体还是外国媒体、本地媒体还是外地媒体、党办媒体还是非党媒体、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的记者都被一视同仁地接纳。在这个空间里，记者之间的交流不再被局限于他们所从属的新闻机构、或者新闻部门，组织不再构成这个空间的限制，组织的边界在这个空间里几乎是不存在的。在笔者进行的深度访谈中，一位记者（I17）甚至说，他在凸凹认识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同行，有些原本是同一新闻机构的同事，在同一座办公楼里同进同出很多年，但是直到凸凹他们才互相认识。另外好几位记者也谈到，凸凹吸引他的地方在于，它使得一个跨媒体、跨部门的职业共同体成为可能。其中一位记者的说法非常精妙地将凸凹与新闻机构的空间做了一个对照：

因为大家本来交流很少，虽然同在一个报社，但是不同部门的人就互相不认识。比如我是国内新闻的，我跟广州新闻的，就完全不认识。跨部门的交流很少，跨报社的交流更少，一个一个的媒体单位，一个个的部门，因为机构的设置，其实把大家分得很厉害。只是有可能在网上大家有的时候交流一下，比如以前在博客上有互相关注，MSN 有互加好友，倒是有的，但是面对面的这种同声相求啊，这种氛围环境和理由很少。那你有一个凸凹这样的地方，大家同行啊，理念相近的人坐在一起聊聊天，大家其实可以忘掉你的单位忘掉你的部门，仅凭着理念和相同的气质走到一起，这样才有一个职业共同体的感觉。（I15）

在搭建一个跨媒体圈的同时，凸凹也在搭建一个所谓的泛媒体圈。除了记者这一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业行动主体，凸凹的参与者中还包括公共知识分子、社会活动者、NGO 工作者、维权律师、学生等人。他们与媒体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或是媒体的业余撰稿人，或是独立报导的公民记者，或是冀求媒体工作的实习生，或是积极的媒体阅听人和资讯提供者等，是所谓的「泛媒体圈」的组成者。但同时，他们又处于以记者为核心的新闻圈的边缘位置，对于他们来说，通往新闻机构的大门并不那么畅通，新闻室的场景并不那么透明，在通常的情况下，新闻业和新闻记者与他们仅在纸上或萤幕上相见，摆着一副「专业」的面孔显得有点神秘。而凸凹吧的存在，似乎为他们打开了新闻业的一扇后窗，将他们从新闻的「前台」(front-stage)带到新闻的「后台」(back-stage; Goffman, 1959)。对于他们来说，凸凹吧是他们可以亲眼目睹、亲手触摸的新闻业，而与媒体记者在凸凹酒吧的亲自交流，则使他们除下了对新闻业作为一个「专业」的神秘想象。如同一位本地的公共知识分子如此解释他频繁出入凸凹的原因：

因为我不知道媒体人平常在想什么，在说些什么，我只是看到文字，那文字代表着什么呢，文字背后有些什么东西，这些文章怎么来的呢？他们有一些什么样价值观，他们真实的一面是怎么样的呢，毕竟这个东西是媒体做出来给你看的，像社论这些东西，我就很想知道他们编辑个人是怎么想的。(I30)

如果说一个「跨媒体圈」的存在，使得记者的新闻业空间在凸凹吧得以在横向上进行扩展，那么这样一个「泛媒体圈」的存在，则代表着凸凹吧对新闻业空间进行的纵向上的扩展。前者将服务于不同媒体「组织」的记者带到同一个交流的平台，而后者使得一些传统上被排除在新闻的「专业」之外的社会行动主体得以进入新闻业的空间。因此，总体而言，作为一个新闻室之外的空间，凸凹可以说是打破了新闻业的「组织」限制和新闻的「专业」的限制，从而重构了一个半径在横向上和纵向上均得以扩大的新闻业空间，

将更加多元化的新闻业的行动主体接纳进来，使得他们在这个空间得以日常化的相遇，从而为一个诠释社群的形成成为可能。

不过这里须指出的是，凸凹吧作为一个酒吧，大门对所有的消费者都是开放的，因此凸凹吧的参与者并不限于上述「跨媒体圈」和「泛媒体圈」成员，在他们之外也包括很多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者，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在频繁进出凸凹的过程中受其影响最后变成了「泛媒体圈」成员，但也有很多是在将凸凹当作一个纯粹的酒吧空间使用。笔者在参与式观察过程中也留意到，时常有「陌生人」或单独或结伴「撞」进凸凹吧，与凸凹吧的记者群并不产生任何联系，据酒吧经理说，他们中很多人来过一次之后就不会来了，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凸凹吧环境简陋，对一般消费者吸引力不够，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其强大的「媒体人」气息中感觉受到排挤。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构成的对偶然性消费者的排斥，凸凹吧作为一个记者吧的特性得到加强。

与此同时不得不强调的是，「媒体人」内部也并非高度同质化，并非所有的记者都对凸凹吧感兴趣。最显然的是，城中各大媒体的总编或高层很少会出现在这里。无论是在参与式观察过程中还是在滚雪球式访谈中，笔者接触到的凸凹吧媒体人，职位很少高过主任一级。一个记者评价说：「领导可能是官大了就会觉得来这个地方不合适还是怎么的，或者怕这个话说多了就对自己的前程有影响，总之领导来的少。其实要是他们来的话，凸凹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I43）正如这位记者所认识到的，人和空间是一个相互塑造的过程，凸凹吧的形态影响着哪些记者有参与的热情哪些记者没有参与的热情，而参与者的气质特点又反过来塑造着凸凹吧的气质和特点。可以说，来到凸凹吧的记者无形之中其实是在进行着自我筛选。与职位高低相对应的是，记者所服务的媒体单位的属性、其个人的政治取向和职业认同等也构成了筛选的标准，总体来说，底层记者比高层的记者、市场媒体记者比党媒的记者、非党员身份的记者比党员身份的记者更有可能参与凸凹。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构成了凸凹吧行动主体的特性，同时划定了凸凹酒吧的边界所在，决定着凸凹吧的论述特征。

伍、凸凹吧的话语实践

作为一个摆脱了组织控制的新闻室之外的空间，凸凹吧使得新闻业的话语实践和意义建构能够在相对开放的、多元的情境下进行，从而形成一套迥异于新闻室的空间的、另类、非主流、甚至是对抗性的共有论述。凸凹吧里进行的另类的新闻话语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主题上：

一、新闻审查

在凸凹吧讨论新闻审查，是记者们建立另类话语的一种习惯性的方式。如果说新闻审查是新闻室的一种常态的话，那么，讨论新闻审查背后的东西则是凸凹吧里面的一种常态。在新闻室的情境之中，接受新闻审查和进行自我审查是成为一个「称职」的「专业」的记者必需的素质。一位记者（I63）说，他所在的新闻机构每年都进行所谓的「新闻从业人员职业素质教育」，记者们必须经过学习班的培训，了解政府的宣传意图，培训之后要经过考试，合格者才能领取记者证，获得正式的记者身份，因此对于新闻审查的机制，他们即使心里并不认同也必须在表面上接受下来。然而，在凸凹吧这样一个新闻室之外的情境中，记者对新闻审查的行为却可以明目张胆地表现出抗拒和不以为然。通常的情况是，一个记者做完一天的工作，来到凸凹吧里，谈谈今天自己的哪条稿子被编辑「枪毙」了，什么内容因为「敏感」而被要求删除了，或者明明知道哪里发生了恶性事件但是报馆不让去采访，等等。有一次和一群记者在凸凹吧聊天的时候，笔者留意到 A 报的一位记者接了一个电话，听她「嗯嗯啊啊」地好一阵之后通话才结束，放下电话她告诉大家，是她的主管打来的。原来，她那天刚采访了一个台湾政要，话题涉及到两岸关系，她的主管打来电话，叮嘱她政治问题不是儿戏，稿子写好后要传给他审一下，同时别忘了还要传给政府的相关部门把关。这位记者语气颇为不屑地说：「你说他是不是有病啊，他自己搞自我审查不算，还要主动送上门给政府来审查。真是气死我啦！」更有凸凹吧里的记者们建议她与其被审查，「不如挥刀自宫算了」。在这种另类话语的建构之中，记者们不光释放了新闻审

查所带来的压抑，而且获得了记者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摆脱控制的自由。其实，自由正是凸凹吧的最大诉求点。在凸凹吧的简介文字中，有这样一段话：「心有多宽，天就有多大！心灵渴望的是最大限度的自由……让每个人可以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表达、自由地生活。」

与对于自由的向往所相对的是，对于管制的不悦。因此，对于管制的不悦的表达也成为凸凹吧建构另类话语的策略性反应。不过，这种表达经常通过传播现实讽刺式的笑话来实现的。在笔者亲历的一次凸凹吧聚会中，一群记者谈起韩寒，一个在当时炙手可热的新生代作家。据说他也尝试办杂志，不过还没问世就被停止了。一个记者透露他知道的消息说：「你们知道吗？他们其实第一期已经在做了，封面都做好了，有人看到是一副漫画，一个裸体的人，一只手用草帽遮住身子下半部，另外一只手扛着一把枪，韩寒给起了个标题叫：挡中央，扛着枪。」说到这里，周围人大笑，赞许韩寒「太有才了」，因为听者都明白，「挡中央」是「党中央」的谐音，「扛着枪」影射政府对人民的控制甚至镇压。当自己无力改变政治管制的现实时，凸凹吧的记者们就通过此类笑话舒缓政治管制的压力，解构政治管制固有的严肃含义，以及对于这种解构性举措的欣赏和对于表达自由的神往。

为了得到更多的表达自由，来到凸凹吧的记者经常互相交流突破控制的技巧。在笔者进行参与式观察的那段时间，由于刚刚发生的「绿坝」事件，如何突破互联网审查成为凸凹吧里的热门话题。在中国境内，因为 GFW（Great Fire Wall）的存在，许多互联网资源是被禁止访问的，甚至包括 Twitter、Facebook 等社交网站，但是通过安装一些特殊的软体程式，是可以绕过 GFW 封锁访问部分网站的。凸凹吧里经常进行此类「翻墙」技术的交流。有一次，笔者表达了无法访问 Twitter 的困扰，一个记者说，「你把邮箱地址给我，我告诉你怎么上。」果然第二天，他发来一份长长的邮件，提供了他收集整理绕过 GFW 访问 Twitter 的「三十种方法」。后来笔者知道，来凸凹吧的记者几乎人人都会网路翻墙技术，像 twitter 这样的被禁网站对他们来说几乎是随进随出，这都拜赐于类似这样的交流。凸凹吧的吧台上那台立式电脑，虽然外表老旧，但是它与记者们在办公室里使用的配置更为先进的电脑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它代表着资讯的自由传播，而新闻机构提供给记

者们的电脑则代表着资讯的管制。甚至当一些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时，经常光顾凸凹吧的记者往往将这里的电脑作为自己的第一资讯来源。

与记者的职业更加密切相关的是，凸凹吧里关于突破控制的交流还体现在日常的新闻工作中如何把不能报导的话题变为可以报导的话题，比如：如何抢禁令、如何打擦边球、如何利用隐喻、如何转换角度等。一个相关的例子是关于所谓「群体性事件」的报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上访」、「罢工」、「游行」、「抗议」等都是被明令禁止在媒体上出现的字眼，但是另一方面，这类事件的发生频率却越来越高，如何报导群体性事件但又不触犯「宣传纪律」是许多记者感到头疼的问题。笔者在凸凹吧经常听到关于这一问题的交流和探讨。一位资深编辑提及，他的做法通常是，当这类事件发生时，无论其是否属于禁令范围，他都是先派记者去现场了解情况，把事实搞清楚，稿子写出来，然后再由编辑在后方进行加工处理，通过适当的「技巧」和「策略」的使用，比如不谈「罢工」而说「喝茶」，不谈「游行」而说「散步」，不谈「上访」而只讲上访背后的故事，从而达到既报导了事实又规避了禁令的效果。当然，这些「策略」的使用并不是每次都成功，很多时候也只是纸上谈兵，但是在凸凹吧的此类交流传递给参与其中的人的资讯是，当碰到障碍的时候，一个记者应该是主动去突破它，而不是退缩和回避。在关于新闻室的研究中，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一个记者如何在一系列的社会化过程中被组织「收编」，被主流价值「驯化」，而在凸凹吧，一个新闻室之外的空间里进行的这类以非正式交流为方式的记者社会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反抗」性的记者，而不是「规训」性的记者如何养成。

二、新闻背后的新闻

作为建构另类话语的场所，凸凹吧更为流行的是，提供新闻背后的新闻。当「正面新闻」支配着中国媒体日常新闻呈现的时候，凸凹吧里的新闻背后的新闻毋宁说是对这种日常呈现的解构。

由于新闻审查制度的存在，在新闻室的机构情境中，记者们无法完整地表达他们所了解的新闻事件的全貌，报纸上和电视萤幕上呈现的往往是经过

层层筛选和层层审查之后打上了「机构」和「专业」标签的「安全」的新闻产品。这种新闻时常给予记者一种职业的挫败感，使得他们乐于借助凸凹吧来宣泄，来对于同一事件进行另类解读，从而既抵消这种挫败感，同时又使得他们保有自己的职业感而不堕。因此，凸凹吧里经常可见一些刚刚外出采访回来的记者就某一个具体的新闻事件所做的「分享」——即新闻的再次传播。一个曾经做过这样的「分享」记者说，当时他被他所在的报馆派去采访一起拆迁纠纷，事件中村民以引火自焚的方式反抗政府对他的房屋进行强行拆除，但是他去采访不久，由于政府宣传部门认为此类强烈对抗式的拆迁纠纷可能造成「不良的社会效果」，于是下令禁止，包括他在内的所有媒体记者撤出当地，而他所在的报馆也不得不发对该事件的报导。他刚一回到广州，就有人建议他到凸凹「分享」一下他那些没有来得及报导出来的新闻：「在凸凹讲的东西肯定要更加贴近事实一点，那些村民强烈的对抗情绪，你在报纸上是不能说的，也不允许你说的，但是在凸凹就没有这种禁忌了。」这种在凸凹吧的再分享甚至是对于他们公开见报稿件的原有思路和主题的颠覆。在他们看来，如果说公开见报的新闻本质上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展示橱窗的话，那么，他们在凸凹吧里所建构的话语才是真正为他们所认同的，有关现实世界的真实呈现。而且，他们通过在凸凹吧的再分享，同时还会获得一种职业上的志同道合感。用一位被访谈对象的话来说，就是，「来到凹凸吧，因为这里提供了表达的平台，同时还有一批持有同样立场的人来这里互相取暖」。

三、职业模范

对所从事的行业的「职业模范」进行重构，是凸凹吧记者进行另类话语实践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凸凹吧的记者们对于国家和机构所定义的「职业模范」，即媒体机构的权力阶层或者官方奖励的编辑记者普遍感到不认同。在凸凹吧，时常能听到各种报馆高层的丑闻。有一次，B报的一位记者谈及她所在报馆的总编时说，「他这个人，谁也不喜欢，心胸狭隘，业务也不行，根本不懂甚么叫新闻」，而且，还与报馆的另一位高层「搞绯闻」。这些丑闻

背后的虚实倒在其次，关键是这些丑闻所传递出的，对于既有媒介权力建制的不同乃至否定。目前在中国大陆，越是媒体高层，越有可能「空降」自某相关政府宣传部门。在凸凹吧里，这些高层时而被记者们所诟病，或称他们官气十足，或称他们人浮于事。相反地，一些不被现有权力建制所认可的媒体人才往往会在凸凹吧里受到褒奖。C报的一位时事评论员可说是凸凹吧的「名人」之一。他是资深媒体人，曾经位居高层，在全国多个城市的报馆担任编委、副总编等职，但是多年来他的「仕途」止步不前，最近甚至倒退。尤其在他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政府的文章后，报馆免了他的高层职位，降至普通职员，使得他目前仅靠撰写评论为生。但是在凸凹吧，他却是很多记者眼中的职业榜样，个个尊称他为「老师」。

来到凸凹的记者都或多或少有着挑战建制、反抗权力的一面。H，前些年在一家官方背景的报纸做记者，几年下来，觉得很难按自己的意愿做事，只能想尽办法采取各种变通的方式，尽量「把真相说出来」，后来他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委曲求全」、「违背自己意愿和良知」的工作，就辞职了，现在他是一个自由撰稿人；Y，前些年在他的家乡当记者，因撰写了谴责地方公安滥用职权的文章，不能见容于地方当局，最后被迫丢了在当地报馆里稳定的工作，来到广州一家媒体当流浪记者；等等。这些故事在凸凹吧中流传，成为一种反抗式的话语实践，无形中影响人们对「什么样的记者才是好记者」的判断，让他们经历一个重新定义记者的角色的过程。所以，对于一些凸凹吧里的年轻后辈来说，来到凸凹吧无异于一个再社会化、再教育的过程。如一位刚来广州工作不久的网友在其博客中写道：

昨天晚上……这间恐怕是全市最独一无二的酒吧里，一如既往的高朋满座。说它独一无二，是因为这里来过巨多的学界、思想界、文艺界和媒介名人，比如袁伟时、艾晓明、鄢烈山、贾樟柯、笑蜀、梁文道...当然，还跟北风学习了很多东西，真的是受益匪浅。

欣喜之情尚在其次，观念和理念上的变化恐怕才是更本质性的。显然，基于一系列另类话语的实践和传播，年轻记者们在这里经历再教育过程中接受的「好记者」观与由国家和政党主导的正统的新闻学教育和社会化塑造下的「好记者」观有着根本的不同。

四、另类专业主义和新闻实践

记者在凸凹吧一方面批评报馆高层迷恋权力而无心专注做真正的新闻，另一方面对自己所在报馆宣扬的「新闻专业主义」则会感到不屑，认为这是媒体用来维护当权者利益的一个借口。笔者在凸凹吧里经历过一次记者之间就「邓玉娇案」展开的关于专业主义的讨论，起因是广州一家自我定位为「主流大报」的报纸发表了一篇关于邓玉娇案的调查报导。报导发表之后，引来社会的许多批评，人们就报导中对邓玉娇个人生活的负面内容感到不满。该报纸随即以「客观呈现事实」和「新闻专业主义」进行自我辩护。而在凸凹吧，记者们提起此事，普遍认为：在此案中，邓玉娇是手无寸铁的柔弱女子，在遭受腐败官员强暴时，奋力自卫，即便最后造成过失杀人的后果，也应受到法律的宽待，而该报坚持的「专业」的新闻呈现方式却抹杀了她对抗权力的勇敢形象，这是缺少社会关怀的表现，是维护权力阶层的表现，等等。凸凹吧的一名记者如此说道：

我并不是说不要新闻专业主义，而是不要这样的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不是某一张报纸想怎样定义就怎样定义的，失去了基本的良知，叫甚么专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我和 XX（该报报导邓玉娇案的记者）一见面就吵，我们（在各类新闻研讨会上）从西安吵到厦门，从厦门吵到香港，一路吵回广州，他到现在还不醒悟。（14）

不难看出，凸凹吧记者反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背后，实质上是反对社会精英群体对新闻事件的定义权，以及媒体打着专业主义的旗号与权力结盟的趋势。

凸凹吧的记者们在建构自己对于专业主义的别样理解的同时，还试图将这种理解带入他们在凸凹吧之外的新闻实践之中。体现这种努力的最明显案例之一是 2007 年对厦门 PX 事件的网络直播报导。该次直播报导主角之一的 D 报记者 I20（当时为自由撰稿人）说：「我们最初就是在凸凹吧里萌发出这个念头的」。厦门 PX 项目是一个本拟在厦门海沧区兴建的计划年产 80 万吨对二甲苯（PX）的化工厂的项目，但由于选址太邻近厦门市區，甫一公布即遭到当地市民抗议。消息传到广州，凸凹吧的记者们数次聚会对此展开热议。尤其当得悉厦门市民将于 6 月 1 日上街游行的资讯后，凸凹吧的吧主北风随即与 I20 商议以「公民记者」的身份用手机和网路相结合的方式直播厦门游行。北风头天晚上坐夜班车从广州出发，于当日凌晨到达厦门，加入游行的人群，利用手机短信进行即时报导，而 I20 则留在广州，负责接收北风的手机短信报导，将其转发到网络论坛，取名「厦门来信」进行系列发布。就这样利用手机和网路的接力，他们对该事件进行了全程现场报导。与传统媒体一片沈默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次源于凸凹吧的全程直播成为厦门 PX 事件中唯一对群众游行进行现场连续报导的新闻来源，以致有人评论这是一次「让传统媒体和传统记者惭愧」的公民报导。

类似的新闻实践还有很多，比如：2008 年对广州南沙化工厂项目的调查，2009 年对番禺垃圾焚烧事件的报导，2010 年对浙江乐清钱云会案的调查，等等，均是由凸凹吧的积极参与者发起的公民报导或公民调查。这些事件都是当时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令人瞩目的社会抗争事件，均涉及公民群体对政府权力的直接挑战和正面对抗。也因这个原因，这些事件都被官方定义为「敏感事件」，在事件的进行过程中实施严格的资讯管制，体制内媒体不得自由报导。在这种情境之下，凸凹吧的参与者们以「公民」或「公民记者」身份进行的，基于网络平台发布的报导和调查有效地突破了政府的新闻管制，如同在一面密不透风的墙上掏了一个洞，使得国内公众和外界社会得以窥见真相的一角，不仅弥补了体制内媒体在重大事件中的新闻缺失和体制内记者在

新闻管制面前的无能为力，同时也凭其草根的报导视角消解了政府权力控制下的「宣传」文本对于事件的讲述角度和话语的建构。

从这个角度来说，凸凹吧作为一个新闻室之外的空间，使记者得以从一个高度机构化的新闻室环境进入到一个自主组织的去机构化环境，摆脱组织的限制，甩掉传统记者的专业价值观和身份包袱，进行另类的新闻实践，从而使得不同于新闻室情境的新闻业话语和意义的重构成为可能。

陆、结语

从诠释社群的理论视角，通过对于凸凹吧的参与式观察及其相关参与者的深度访谈，本文试图探讨新闻室之外的空间对新闻这一行业所具有的社会意涵，描述记者们如何利用这一新闻室之外的空间建构另类专业话语，并解构新闻室之内的官方正式话语，继而影响着他们的新闻实践。本研究认为，作为一个新闻室之外的空间，凸凹吧的意义在于它为记者们搭建了一个组织外的跨媒体、跨群体的交流平台，使得一个打破组织区隔和专业界限的替代性新闻业共同体成为可能。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另类新闻话语和新闻实践得以进行，不仅迥异于新闻室内部空间的建构，而且构成对新闻室空间进行的话语和实践的直接挑战。具体而言，解构政治管制固有的严肃含义、交流突破控制的技巧、进行传播新闻背后的新闻、重构职业模范、重构职业身份认同、解构新闻专业主义、进行另类新闻实践等是凸凹吧记者们的常用话语建构策略。

通过对新闻室之外的空间的记者活动及新闻实践的考察，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新闻学的研究维度。传统的新闻学研究通常倾向于在新闻室的情境中考察新闻和记者，而很少关注新闻室之外的空间对这一行业的重要性，本文通过对后者的关注和探讨，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必要的补充。更为重要的是，透过这一视角，我们更加鲜明地看到，记者群体不仅是一个职业社群（professional community），更是一个意义社群、话语社群、和一个诠释社群。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凸凹吧是一个摆脱了「组织」和「机构」控制的新闻空间，但是在凸凹吧，权力和控制其实从未离场。自从厦门 PX 事件后，凸凹吧便进入政府管制的视野，时常遭断水断电致使沙龙、聚会等活动不得不中断或取消，而频繁出入凸凹吧的记者们也常常受到公安部门的问话和传讯，在多重压力下，凸凹吧在 2010 年广州亚运会召开前夕最终被遗憾地关闭，至今未恢复。

但是，凸凹吧作为一个过去的样本仍不失其价值与意义所在。在中国大陆，记者们尝试建立新闻室之外的空间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在记者聚会的小餐馆里、在咖啡厅里、在书吧里，乃至网路上，聊天群里，都有类似「凸凹吧」的新闻空间的存在。即使完全如凸凹吧这样的一个物理的、固定的、具有行动力的新闻室之外的空间短期也许难以被复制，但凸凹吧的启发意义犹存，故而对凸凹吧的研究意义犹存。

参考书目

- 李金铨（主编）（2008）。《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李金铨（2011）。〈民国时期的报人情怀与国家想象〉，《二十一世纪》，126: 52-73。
-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UK: Verso.
- Berkowitz, D., & TerKeust, J.V. (1999). Community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y: Rethinking the journalists-source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9(3), 125-136.
- Breed, W. (1955). 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 A functional analysis. *Social Forces*, 33, 329-355.
- Ettema, J. S., & Glasser, T. L. (1998). *Custodians of conscience: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nd public virtue*.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Fish, S. (2003).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ans, H. (2004).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NY: Doubleday Anchor.
- Hall, S. (1982).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 In M. Gurevitch, T. Bennett, J. Curran & J. Woollacott (Ed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pp.56-90). London, UK: Methuen.
- He, Z. (2000). Working with a dying ideology: Dissonance and its reduction in Chinese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1(2), 599-616.
- Lee C.C. (Ed.). (1990). *Voices of China*.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 Lee, C.C. (Ed.). (1994).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Boulder, CO: Westview.
- Lee, C.C., He, Z., & Huang, Y. (2006). “Chinese Party Publicity Inc.” conglomerated: the case of the Shenzhen Press Group.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8(4), 581-602.
- Lee, C.C., He, Z., & Huang, Y. (2007). Party-market corporatism, clientelism, and media in Shanghai. *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2(3), 21-42.
- Lin, F. (2010). A survey report on Chinese journalist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02, 421-434.
- Rheingold, H. (1993).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Schudson, M. (1978). *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New York, NY: Basic Books/Harper Colophon Books.
- Shoemaker, P. J., & Reese, S. D. (1991). *Mediating the message: Theories of influences on mass media content*. New York, NY: Longman.
- Tonnies, F. (1957). *Community and society* (C. P. Loomis, Trans.). New York, NY: Harper and Row.
-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Tumber, H. (ed.) (1999). *News: A reader*.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urkle, S. (1995).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 Wenger, E. (1998).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Learning, meaning and identi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R.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Zelizer, B. (1993).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0, 219-237.
- Zhao, Y.Z. (1998).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Zhao, Y.Z. (2008). *Communication in China*. Lanham, MA: Rowman & Littlefield.

Journalists as Alternative Interpretive Community: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an Extra-organizational Journalist Space in China

Haiyan Wang

ABSTRACT

Traditional journalism studies tend to take the approach of newsroom studies, while falling short of exploring the extra-organizational space.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is the latter, asking how an interpretive community of journalists is formed in the outside-newsroom social space. Based on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a journalist Bar in Guangzhou China,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space was tremendously attractive to the journalists who were faced by a highly suppressive newsroom culture in their daily work. In their day-in-and-day-out social interactions in the space, they constructed a set of discourses about journalism that is distinctively different from those promoted by the state and formal news organizations.

Keywords: Chinese media, discursive practice, extra-organizational space, interpretive community, professionalism, Tu' ao bar

* Haiyan Wa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in journalism studies at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e-mail: haiyan.wang2009@gmail.com

空间、科技、与声音： 新老工人阶级文化空间的比较研究

王洪喆、邱林川*

本文引用格式

王洪喆、邱林川（2015）。〈空间、科技、与声音：新老工人阶级文化空间的比较研究〉。《传播、文化与政治》，2:27-60。

投稿日期：2014 年 8 月 30 日；通过日期：2015 年 1 月 8 日。

* 作者王洪喆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e-mail: whz@pku.edu.cn。
邱林川为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e-mail: jacklqiu@cuhk.edu.hk

《摘要》

阶级形成的核心是文化转型。本文尝试通过空间、科技、和表征着认同的「声音(voice)」的变迁来理解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生活被表达、勾连和再生产的独特方式。论文选取了一定程度上可代表新老两代工人阶级文化的两个个案：鞍山和北京皮村。分别检视了实体空间、数位网络，和其中的声音。研究的实证资料，搜集自反复的实地考察，对当地主要参与者的访谈，对工人线下的文化活动的参与式观察，以及工人在线沟通模式的观察。在方法论上，本文尝试通过这种考察发展一个更精确的比较分析框架，以其为空间、技术与当代中国阶级变迁的理论勾连提供一个可能的视野。

关键词：工人阶级、工人文化宫、文化空间、阶级认同、阶级意识、传播科技、网络

壹、介绍

阶级形成的核心是文化转型。在当代的大转变（Pollanyi's Great Transformation）当中，文化转型不可避免地发生在城市化变迁、传播科技的扩散、和伴随而来的身份认同转变当中。在这一转变当中，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市场的扩散——是空间商品化、是科技与市场的相互嵌入、以及基于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均质化的「现代」主体的锻造；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社会的自我保护——是行动者对于空间的协商和改造、是科技的社会创新、还有自觉的身份政治实践。正是在这样的双向运动中，我们对于「阶级」的理解被赋予了新的意涵。

本文尝试通过空间、科技和代表着认同的「声音」的变迁来理解工人阶级生活被表达、勾连和再生产的独特方式，尤其是通过对表演艺术和展览的考察。不论是对于新工人还是老工人而言，这些文化的具体面向对于阶级身份和意识的形成都是必不可少的。本文始于三个假设：（一）「文化」始终是存在的，尽管其内容和形式因时间的流逝而不同；（二）不同时代的工人阶级群体有着不同的工人阶级文化，他们的异同需要被分析；（三）对文化的考察要落实到它的实体、技术和其中的「声音」，以及身处其中的工人阶级群体的社会结构。

我们对于阶级和阶级意识的理解追随 Thompson（1966）的文化建构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将生活经验和历史中真实的、正在形成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推到了台前。这是一次从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出离。经典传统假定了一个经济与权力结构之间近似决定论的关系，也由此假定了经济基础与阶级形成和阶级意识之间的决定性关系。这并不是马克思思想的本来面目，马克思认为，当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共享相似位置的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共同福祉不同于其他群体，阶级意识的生成和巩固随之发生，人们经由此过程文化地、政治地组织起来。毫无疑问，共同的阶级意识在不同工种工人中的生成，是阶级形成的基础。这个过程虽然建基于资本、国家、工人组织等结构性力量，但并不完全受限于此。

Thompson 的两个洞见与本研究最为相关：一是将中国当代工人阶级文化视作事实上产生在人与人关系之中的历史视角（ibid, p. 9）。我们由此可以将新

老工人阶级群体之间看似不相干的经验放在一起考察；而空间正是这些历史关系得以物质化为可见形式的舞台。二是赋予工人阶级抗争中的「成功者」和「失败者」以相同的重视程度。再次引用 Thompson 的杰作，「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我们需要从后代的自以为是中拯救出那些被看做『老掉牙』的失败者」（*ibid*, p. 12）。「他们的技艺和传统可能已经死去，但是，在他们曾经的经验中，他们的追求是不可磨灭的。」（*ibid*, pp. 12-13）

在工人阶级网络社会的概念框架中，工人群体的文化形构是一个核心过程（Qiu, 2009）。在这样的理论构想中，工人阶级的文化并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生活的再现或者现存工人阶级价值在时空上的反映。相反，它铺就了一条在信息社会里通往全新「认同的力量」（Castells, 1997）的道路。中国的新老工人阶级毫无疑问都包含在这一进程中。它为基于「信息中层」（*information have-less*; Cartier, Castells, & Qiu, 2005）的「网络劳工」（*network labor*; Qiu, 2010）的出现做好了准备。数位化网络技术，特别是像手机这样廉价的工人阶级信息传播技术（ICTs），已经进入了形构中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空间中。

进城打工者和国企下岗工人是构成这个「信息中层」的两个主要社会群体（Cartier et al., 2005; Qiu, 2009）。在社会科学领域，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科学，已有大量的比较研究，比如比较新老工人在面对新自由主义改革中的经济条件、抗争政治（Chan and Pun, 2010）、和反抗策略（Barboza & Bradsher, 2010, June 16）。其中最知名的研究应属李静君（Lee, 2007）的《抗法》（*Against the Law*）。不过此类的比较通常集中在生存策略、基本经济诉求、和主要政治结构上，对于工人们正在切身经历的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关注尚有不足。

另一方面，改革 30 年来的阶级体验，不论是对于老一代国企工人还是年轻的新工人而言，已产生出了大量的诗歌（Sun, 2010），文学作品，和影视剧目，如【外来妹】和【师傅】（孔书玉，2012）。这些新的文化现象已经引起了来自文学、美术、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很多学者的注意。杨宏海（2007）的《打工文学备忘录》就是一个典型。不过，这些人文学科研究很少尝试对老一代国企工人和新一代农民工的文化经验进行系统的比较性研究。在方法上，也很少会在文学研究和社会科学考察之间进行勾连。

本文是一个探索性质的研究，通过比较两个工人阶级文化空间变迁的案例——辽宁鞍山和北京皮村的新工人艺术节——我们试图提出一个比较性研究的框架，来填补上文提到的空白。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得出任何关于工人阶级文化在中国的现状仓促的结论或预测其未来的方向，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相反，我们仅希望做两方面的尝试：（一）在实证资料基础上链接北京和鞍山那看似不同的文化和技术体验；（二）在方法论上，制定一个更复杂的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看看它会指引我们向何处。

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探讨这两个工人阶级文化空间的异同：（一）这些表演艺术和展示活动得以展开的实体空间，以及这些空间如何为工人勾连他们独特的阶级身份提供了可能，（二）除了实体空间外，这些活动开展的传播科技和网络空间，不论是对新工人还是老工人而言。（三）「声音」——或者说是这些文化经验的实际内容、传递这些内容的文艺形式、以及使得这些声音在市场和地方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得以表达的行动机制、和建筑其上的身份认同。

两个供比较的田野案例选取，兼顾了毛和后毛时代中国工业化进程、工人阶级形成和文化组织形态的时代特性。鞍山又名「钢城」，东北副部级城市，社会主义中国曾经规模最大的工业联合企业「鞍钢」所在地。鞍钢和这里工人阶级的历史，可以上溯至 20 世纪早期的伪满洲昭和制钢所。1949 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因有比邻苏联的地缘优势和日据时代建立的工业基础，中国东北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得以展开的元空间，而钢城更是处于核心中的核心。苏联将二战期间从德国拆除的设备整修后，作为著名的 156 项投资项目援华，其中 55 项安装在东北，而这其中的一号工程就是鞍钢，鞍山一个城市获得了总共 89 亿投资中的 27 亿。伴随工业化的是东北的极速城市化：早在 1960 年，东三省非农业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在 40% 以上，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2 倍。目前东三省非农业人口所占的比重仍比全国高 20 个百分点。在社会主义时期，东北不仅是中国的重工业和城市中心，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工业」的重镇，其文体部门的生产代表着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的前沿。「从工人到艺术家，从工厂走向舞台」，这个话语所连接的历史事实正是一个系统的「劳动与文艺不分家」的文教和工业生产体系。

皮村座落在北京朝阳区远郊的金盏乡，二、三十年前还是农村。但随着后毛时代户籍制度的松动，特别是邓小平 1992 年南巡讲话以来，北京郊区如内地其他大城市一样，都出现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极速城市化，大量吸引原本居住在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结果出现一大批城市周边的村庄，即「城边村」。在此时代背景下，皮村是座较有代表性的典型村落。这里绝大多数居民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属，他们以在制造、服务、建筑、运输等行业出卖体力劳动谋生。少数拥有土地和北京户口的原住民则靠出租房屋和做生意为生。与鞍山不同，这里不是大城市，它近年来的城市化过程也不依赖于大规模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但它却是后毛时代难得一见的中国工人文化「重镇」，转折点是 2004 年「打工青年艺术团」搬入该村，在这里开办打工子弟学校并成立「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他们在这里组织工人乐队、做工人社区媒体、建打工博物馆和新工人剧场、举办「新工人文化艺术节」、「打工春晚」。他们提倡劳动文化价值，「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不但得到诸多媒体关注，更在劳工文化领域取得了全国乃至国际影响。

本研究的实证资料，搜集自反复的实地考察，对当地主要参与者的访谈，对工人线下的文化事件的参与式观察，和工人在线沟通模式的观察：例如通过对 QQ 这样一个在新老两代工人中都很流行的即时通讯服务的考察。鉴于此项研究的起步性质，经验证据只是举例说明之用，虽然我们期望进一步把这个项目发展成更全面的「扩展个案研究」(Burawoy, 2007)。

贰、实体空间

基础设施是文化得已形成的最基本物质条件，特别由于它可以更稳定地、定期地满足工人社区的文化需求。因此，作为「地方」而存在的那些建筑、广场、通道的建筑形式本身也成了文化和阶级意识的表达，而新老工人的身份认同也蕴含在其中。

在有形的结构背后，也有些无形的、也许更有趣的跟阶级形成有关的问题：谁建造了这些建筑物？在什么时间？出于什么目的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况下？谁拥有它们？谁管理它们？谁能够进入并从中受益？谁被拒绝进入和排除？建造他们的初衷和实际使用现状之间是否有不同？如果是这样，这不同又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本来就应该如此吗？还是应该有其他的可能？如何从物理空间的转变，包括它的布局、功能和管理的变革中，揭示有关阶级政治的规律？

鞍山被人所熟知是因它的钢铁厂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重工业建设中起到关键作用。如今，鞍山是一座典型的、李静君所说的中国东北「锈带」(rustbelt)上的老工业城市。在鞍山，工人阶级文化活动的参与者大都是中老年国企的离退休和下岗工人，他们在这个城市生活超过三十年，把城市视作工人的家园。

工人的文化空间，通常被命名为工人文化宫和工人俱乐部，大都由政府 在毛时代建造。它们大都是庞大宏伟的苏式建筑，位于交通便利的市中心，便于居住在城市工人社区中的工人访问。这种典型的文化空间之一是鞍钢工人文化宫。它始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依照苏联专家设计的蓝图建造完成。在毛时代，它内部拥有电影院、剧场、灯光球场、棋牌室、图书馆，以及承办各类工人补习班、会议、演剧活动。曾经，工人们只需交纳一年 2 元钱象征性的会费，就可以成为文化宫的会员，不受限制的享受内部所有的设施和参与活动。工人文化宫的空间规划和文化组织反应了毛时代典型的 空间实践，其构成了社会主义城市的集体文化和社会交往所必需的物质基础。

在物质基础之上是相应的「上层建筑」。在鞍钢工会的管理下，文化宫设计的初衷为「工人的学校和乐园」。这里不仅仅是工人娱乐的空间，同时也是工人进行自我教育和集体行动的场所。作为社会主义时代主体社群的主要文化与政治空间，工人俱乐部曾经行驶了多重职能：它作为经常性的社会动员的会场（集会报告），它也联系着集体感、单位制、健康的娱乐——联欢会、文艺演出、免费电影放映等社会主义的文化生活的主要形态，它也是社会主义的主流艺术样式——合唱、诗歌朗诵等——的演出空间，也是作为

群众文化的各类业余文体社团的活动场地和培训机构。(戴锦华, 2000, 页 280)

文化宫功能的转变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始于政府开始终止公共投入, 文化宫转入自负盈亏。在 90 年代, 为了生存, 鞍钢工人文化宫几乎被完全商业化。曾经做为工人的文化演出和排练的空间大部分出租给私人业主, 变成了游戏厅、旱冰场、台球厅、舞厅、卡拉 OK、以及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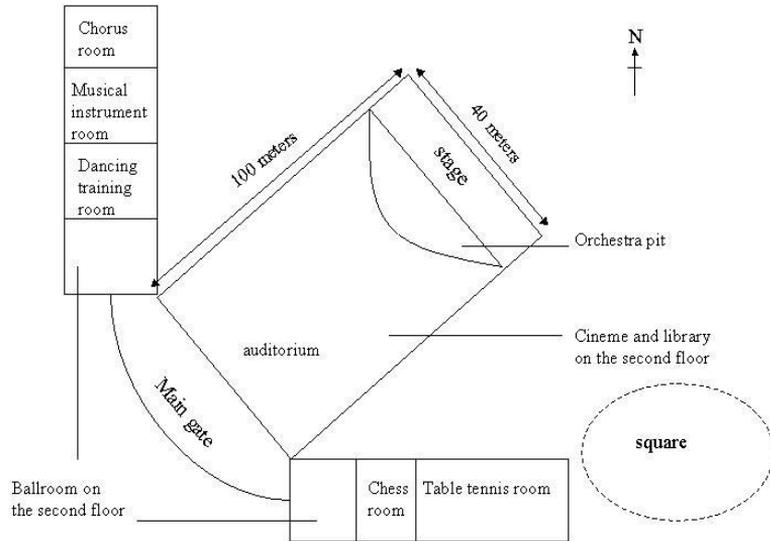
虽然经历了功能改造和商业化之后, 文化宫不再允许工人免费进入, 但它仍然为附近的工人提供了一个廉价的娱乐空间。然而, 自 2004 年以来, 即使是这个商业性的空间也不存在了。得益于中国钢铁产业的复兴, 鞍钢重新注资并收回了文化宫。然而, 收回并没有导致空间向毛时代的回归, 而是成为了鞍钢官方的艺术团演出和排练的场所。他们大都是由厂方雇佣的、从艺术院校毕业的专业舞蹈演员和音乐家, 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由本地的工人艺术团体组成。

现在追溯起来, 工人文化宫的空间变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 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空间; (二) 始于 90 年代初的商业娱乐空间, 和 (三) 自 2004 年以来被官方重新占领的空间。对于普通工人和他们的基层文化团体而言, 这三个阶段使他们逐步失去了进入文化宫的可能性。这个过程清楚地显示在工人自发的兴趣小组的变化中。

这些曾经可以自由进出于文化宫的兴趣小组, 现在都被这个空间排除了。这样的例子之一是一个 50 年代以来的一些钢铁工人组成的豫剧团。几十年来, 工人文化宫二楼的一个房间一直是他们定期排练的地方, 直到 90 年代初房间被改成商业舞厅。现在, 这些大多数七十多岁的退休工人, 依然坚持每周一次的聚会。他们从本地的一个街道办事处那借来了一间没有暖气的会议室进行定期排演。他们最发愁的事情是找不到排练场地和找不到真正的演出机会。

尽管从工人文化宫的主体空间中被排除出来, 许多工人仍然依靠和改造着这里唯一未被商业化的部分——文化宫外的广场。这个广场是附近工人社区目前在夜间唯一有灯光的自由空间。晚饭后, 工人们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汇集到这里, 自发地组织起他们喜爱的歌唱和广场舞等集体活动。

图一：鞍山市工人文化宫毛时代的平面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绘制

图二：鞍山市工人文化宫正门（2009 年 12 月）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拍摄

图三：夜晚文化宫广场上工人们自发组织的集体舞（2009 年 12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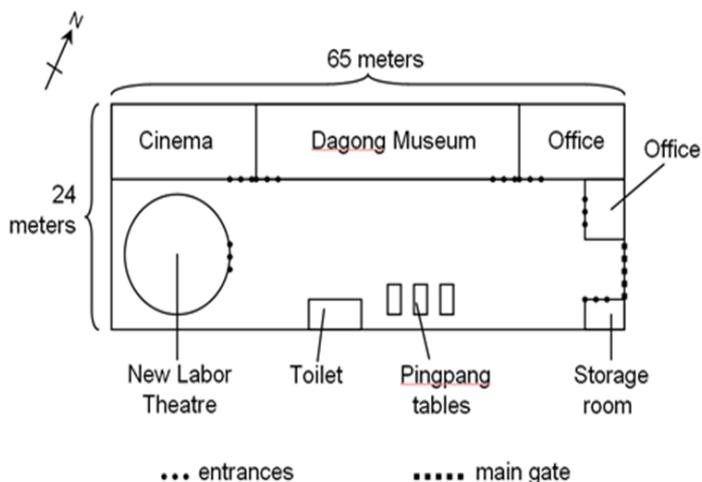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拍摄

相比鞍山，在皮村的文化空间要小得多，历史也更短。它是一个传统风格的四合院式建筑（见图四）。皮村位于北京朝阳的远郊区，恰好坐落在国家划定的文化产业园区（Hui, 2006）。在过去的十年中，它容纳了大约 2 万来自全国各地进城务工的青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附近从事服务业和制造业工作。有些人已婚，有子女，也有很多单身的年轻人，但很少看到北京当地人。皮村也是新工人艺术团的家，这个劳工 NGO 已经于 2009 年 1 月、2009 年 10 月、和 2010 年 9 月主办了三次新工人艺术节。

皮村距市中心差不多 50 公里，从朝阳区的中心商业区到达皮村需要 1 小时以上。新工人艺术团的文化空间，一开始北京本地农民计划把这里建成住宅，后来所有权被转让给当地的一家琉璃工厂。2007 年 8 月，新工人艺术团的几个核心成员（均为外来移工）把这个地方租了下来。当时这里只有一排房子，它们在随后被改建成了打工博物馆和劳工 NGO 的办公室。房子对面的院子里只有一片普通的泥土地。新工人艺术团的成员们花了八个月时间打通这些房间，把它们变成了一个贯通的、300 平米的打工博物馆，并于 2008 年的 5 月 1 日正式开放。随后，他们用部分来自朝阳区文化站的拨款买来水泥，铺平了原来大门到博物馆之间的泥地。不过博物馆后面的庭院依然是菜地，后来这片空间成了电影院和新工人剧场的所在地。他们又用了一年的时间把这块地建成了图四中的样子。全部的改建和装修工作都由新工人艺术团的成员自己完成，他们的理念是「自己搭台，自己唱戏」。

图四：北京皮村新工人艺术团四合院的平面图 (2010 年 10 月)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绘制

事实上，这个新工人剧场成了整片空间的点睛之处，因为它高出周围的建筑而且剧场的入口正对着四合院的大门。更重要的是，剧场是一个全新的，完全由新工人艺术团成员自己搭建的建筑物。

图五：改建完成之前的皮村新工人艺术团四合院的正门



资料来源：卜卫摄，2010 年 10 月

图六：第三节新工人文化艺术节期间的正门



资料来源：卜卫摄，2010年10月

这个院子免费开放给所有人，包括所有皮村的居民，也包括其他来访者。平日里，人们大都在下午和傍晚时分过来，那时候孩子们放了学，大人们也下了班。最常见的活动是打乒乓球和伴着新工人艺术团的原创音乐跳舞，各种表演排练也同时在院子里展开。每当新工人艺术节召开的日子里，小院更是从早到晚挤满了人。大部分的观众是住在皮村的打工者，本地户口的村民也会来，当然还有不少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访客。

博物馆的展览也是全天候开放，不过电影院和剧场只有在有活动的时候才打开（因为放着昂贵的设备）。博物馆不收门票，在博物馆和电影院里举行的展览和放映都是全部免费的，在新工人剧场看演出也不要钱。在博物馆边上的办公室里，人们可以购买纪念品、出版物、还有新工人艺术团和其他劳工 NGO 制作的试视听资料。不过，皮村居民很少买这些。大多数情况下，这点仅有的商品交易是为研究人员之类的外来访客「预留」的。

更受本地打工者欢迎的商品交换是皮村的二手服装市集，经常就在院子中间的空地上举行。二手集市由新工人艺术团的附属机构「同心互惠店」发

起组织。同心是一家社会企业，它从北京市内回收二手服饰，然后分发到位于皮村和附近的 10 个市集，以打工者可以负担的平价售卖。同心的业务在 2011 年运转颇为顺利，作为社会企业为皮村的打工者创造了超过 20 个稳定的全职工作。因此，皮村的工人阶级文化空间并没有排斥商业活动，相反，商业以草根社会企业的形式繁荣发展，不仅部分满足本地社区的日常需求，而且创造了自主的就业机会。

参、数位网络

赛博空间并不是空洞或扁平的世界，它的地理景观源自物质世界结构的上载过程（Zook, 2005）。基于低端信息技术的传播活动构成了新世纪工人阶级经验的一个独特和不可或缺的面向。在这些技术中，廉价手机和网吧最常见。当然，工人阶级的信息社会的全部内容要宽广得多，涵盖了硬件与软件、服务与内容、文化形构与集体行动网络等多个面向（Cartier et al., 2005; Qiu, 2009, 2010）。这个建立在数位媒体上的社会空间无疑是全新的，因为仅仅十多年前，这些工具对于普通工人来说还是过于昂贵且不易于掌握的。然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没有手机的工人，无论是新工人还是老工人、男性或是女性，下岗工人还是农民工，都或多或少地介入了某种形式的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working-class ICTs）。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对于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的快速扩散和工人对这些技术五花八门的创新应用而言，丘林川反对传统的技术决定论和媒介效果研究（例如，工人因易于被手机广告影响而购买手机），他试图采用一个更能动（agentic）的模型来提供更合理的、历史性的解释（Qiu, 2009）。源于后毛泽东时代的大转变，特别是 1992 年后伴随着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改革，工人阶级原有的基本社会服务都已被商业化和私有化。由此，人们不得不自力更生，依赖个体的社会网络去寻找有关就业、住房、教育和医疗保障的信息。国家和单位的退出带来了一个日益扩大的和生计相关的信息真空；与此同时，对于工人的闲暇生活和娱乐需求而言，印刷和广电媒介的退出也留下了一个同样重要的空白。因此，有赖于廉价的数位技术，中低端信息通信技术的出现也应被看作是对宏观社会变迁的一种集体的、能动的回应。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微观层面上以提供即时信息和娱乐功能为目的的这些信息手段的应用，是否可以被视为一种新的文化空间，并且为中观和宏观的阶级形成铺就了道路？如果是这样，在不同的工人阶级群体中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如果不是这样，又是什么阻碍了它的出现？正如杨国斌（Yang, 2007）对中国非政府组织的调查中发现，财力稍逊的草根组织更倾向于依靠网上通讯工具。这种对 NGO 组织的一般观察是否适用于鞍山和皮村的劳工 NGO 和工人社群呢？

从文化宫和工人俱乐部这样的社会主义文化空间被排除后，退休和下岗工人是如何重新组织他们的文化生活的？在一些案例中我们发现，作为信息中层网络社会的一个流行应用，QQ 群起到了重要作用。QQ 群是在中国低收入的信息中下阶层人群中流行的社会化网络应用（Koch et al., 2009）。「山岳人」，一个工人的登山俱乐部，就是这样一个以 QQ 群为依托的典型群体。十多年前，这个俱乐部最初由几个热爱登山和表演的鞍钢工人组成。在过去，他们依托工会来组织自己的活动。如今，在他们大多退休和下岗的同时，工会负责组织工人文化生活的职能也逐渐消失。不过，得益于新的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他们的登山和表演活动甚至比过去更加的繁荣。

现在，他们的活动大都通过叫做「山岳人户外运动队」的 QQ 群来组织。在群内现有的上百人中，不仅包括下岗工人，还有各行各业的成员，如退休政府公务员、工程师和个体户。其中的绝大多数是 40-60 岁的中老年人。有赖于平价手机、组装电脑、和当地低廉的网络服务年费，他们可以在家里访问 QQ 群，讨论并分享关于活动的想法。每次登山或演出之后，他们会把照片和视频上传到自己的 QQ 空间，然后在群组中共享给所有成员。

在鞍山，我们观察到，越来越多的中老年工人加入到了这样基于 QQ 群的民间自发的俱乐部中。不仅限于登山和表演，这些俱乐部涵盖了各种活动，如摄影、自行车、国画书法、诗歌等等。对于新成员来说，需要学习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使用 QQ 群和 QQ 空间。有些人甚至要从如何打开电脑电源开始学起。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俱乐部首先成了普及信息素养的重要渠道。很多人表示，在他们加入山岳人这样的 QQ 群并学会使用电脑上网以后，家里的电脑不再是他们年轻子女的专属设备，之前对于网络技术神秘感的敬畏

也消失了。「上网」对于他们来说，不再是望而生畏的高科技行为，而是真正地融入了工人的日常生活。在他们线下的登山和表演活动中，他们通常习惯于用线上的 ID 来彼此称呼，有些人甚至从来不知道其他成员的真实姓名。

有趣的是，这些 QQ 群带来的好处也不仅限于日常文化生活的组织。基于 QQ 群的线上和线下互动，山岳人的成员也从这个社交网络中获得了多样的社会和情感支持。例如，生病的成员会得到群里其他人医疗信息的建议，甚至治疗上的资助。如果有人的亲属去世，群里的其他人会以朋友的身份参加葬礼。此外，由于其成员跨越多个社会阶层，一些下岗人员也可以经由其他拥有更丰富社会资源的成员帮助获得新的就业机会。如果有成员因为工作和生意需要离开鞍山时，这个 QQ 群就成了使成员之间得以跨地域联系的空间。不仅如此，一些 QQ 群的活动已经超出了一个城市的范围，他们通过网络同省内其他城市的类似群体取得联系，如一些自行车俱乐部已经在组织一些跨地域的活动。

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鞍山的 QQ 群并不是没有边界的空间。尽管有内部的阶层多样性，山岳人小组成员几乎全部是鞍山市本地市民。城市中的新移民工人依然被排除在这个网络空间之外，尽管这些来自全国各地农村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了鞍山市各个服务行业的主要劳动力来源。

图七：「山岳人」成员的博客（2010年12月）



资料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18c5950100i4r5.html

图八：山岳人的QQ群（2010年12月）



资料来源：QQ 群组内部链接，作者自行截屏。

另一个有趣的个案是新浪秀 (sina show, show.sina.com.cn)，一个新浪旗下的视频聊天服务。我们发现，这一应用在很多鞍山的中年女性，特别是下岗和离退休工人女性中特别流行。使用廉价电荷耦合器件 (CCD) 的摄像头和麦克风，他们在电脑前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进行歌舞表演。在演出前，他们甚至需要化妆和排练，就像要参加在舞台上的正式演出一样。新浪秀聊天室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功能整合，结合即时的视频表演和在线聊天；同时，它的用户界面设计对于信息中层而言也是十分友好和易于使用的。在鞍山，廉价传播科技正在开始重新组织了工人的日常生活和娱乐。它使得工人的文化活动不仅在旧的空间解体后得以延续，更超出了传统的单位、阶层和城市的限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可能。然而，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工人的身份也变得模糊和暧昧起来。

第一次参加新工人艺术节的人可能会惊讶于看到大量皮村以外的参与者。经过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车程，从北京市中心到达皮村，我们会看到很多非本地人，他们来自全北京、全国、甚至世界各地。艺术节期间，观众们和舞台上的表演者们聚集到一起，在博物馆中举行展览，在电影院中展映纪录片，在剧院里演出音乐和戏剧，还有跟媒体有关的各类工作坊。这些人是如何得知这些信息，如何找到这个地方，又是如何合作组织这些活动的呢？

答案正是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尤其是网站、邮件列表、博客、和无处不在的手机。在皮村这个四合院里，面对面的口头交流依然重要。印刷和广播媒体则不适合跨越更大的空间距离。因此，中低端信息传播工具承载起一个传播的网络，使得新的虚拟文化空间超越了这个四合院的物理范围和皮村偏远的地理位置。

新工人艺术团在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后建立了他们的网站「大声唱」(www.dashengchang.prg.cn)，那时皮村的改建还没有完成。大声唱是这个工人 NGO 的主站，成为了连接这个劳工 NGO 各个子部分的中心，比如同心实验学校、同心互助商店、和流动的心声博客、以及皮村以外的 NGO 组织，如乐施会、城边村、和朝阳区文化中心 9 个剧场等。通过连接内部和外部的节点，大声唱网站成为一个交流信息以及音乐作品的中心平台。网站架构中一个特别部分叫做「活动讯息」，其中包括了每年的

新工人艺术节和其他的一些事件。同时，这个网站还支持手机的访问，以确保在工人中更广泛的信息传播。

除了网站和博客，邮件列表仍然是网上文化空间的中心支柱。几乎每个星期，我们都会收到来自新工人艺术团的邮件更新，通常包括了最近的活动信息和相关媒体报道。此外，他们也依靠 QQ 群进行联系。QQ 群在工人群体和劳工 NGO 中如此广泛的应用，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工人阶级的社会网络服务（working-class SNS）」。

另一个重要的应用是同心互惠商店的网站。如上文提及，作为一家社会企业，同心的主要活动是在线下售卖二手物品给皮村和周边社区。但在售出之前，同心需要首先从北京的捐助者处搜集到这些二手物品。搜集工作需要大量基于手机和网络数据库的协作，通过网站，捐助者可以方便提交提取地址和物品信息。数字平台因此成了线下社会企业得以运转不可或缺的要素。同时，同心也在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淘宝开设了网店，来售卖新工人艺术团的唱片和 T-shirt。

数位文化空间大大强化了新工人艺术团的信息推广能力，不仅是他们的活动、协作和作品的推广，而且为他们的集体创作提供了更实际的帮助。比如说，当 they 要制作新专辑时，他们会在网上征集歌曲（或者歌词、诗歌，此后再谱曲）。不过，限于带宽和网络可靠性的不足，数位工具并非万能。他们的信息传播技术仍然属于中低端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中国的电子监控系统也使得某些特定的内容并不适合通过电子邮件和 QQ 的传播。因此，对于关键的决策和创意内容的生产来说，面对面的讨论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肆、「声音」（voice）

在广义上，「声音」是渗透在文化空间中的现实存在，是被传递的内容、被应用的形式、和被勾连的身份。然而，透过 Couldry（2010）对这个名词的定义，我们可以更具体地理解「声音」。他说，声音不仅是一个表达和传播的过程，更重要的，声音是一种价值。换言之，「将声音视作一种价值意

意味着去识别人类通过自己的选择去组织生活和资源的不同方式，意味着将声音的价值付诸实践，去尊重并维系不同声音中多元相关的进程，而不是削弱甚至拒绝他们」(Couldry, 2010, p. 2)。

那么，在鞍山和皮村的文化空间中出现了何种声音，和谁的声音呢？又是以何种方式表达，透过什么样的文学和艺术手法？建立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正是文化空间和阶级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它是服务于阶级的形成还是加剧阶级的解体，是勾连了阶级意识还是解构了阶级意识？

在鞍山，对于社会主义的文化空间和背后无形的文化系统而言，其目的是通过将工人视作领导阶级和工厂的主人来勾连毛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在如今的鞍山，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些毛时代文化生活的残留物，比如上文提到的那些每晚在工人文化宫广场上各式各样的集体艺术形式（见图十二）。因此，虽然旧的文化系统瓦解了，文化空间也商业化了，但代表旧的阶级意识的声音却以某种方式存活了下来。不过，这种声音不再像过去那样直接讲述着日常生活和工人的劳动经验，相反，它掩盖了过去的阶级政治，却表达了一种更接近当下官方路线的草根价值。

甘建秋，一个 72 岁的退休工程师，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毛时代，甘曾是由鞍钢工会组织的工厂乐队的指挥。同时也为工人创作歌曲。那时，他要在每个周末负责组织在工人文化宫里的工人舞会，在舞会上他的工人乐团还会演奏他的原创作品。那些作品中最重要的是歌颂劳动和生产。退休后，甘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创作歌曲，甚至学会使用电脑和网络来传播他的作品。然而，他的歌曲主题有了很大变化。如「香港回归」、「2008 北京奥运」、「和谐社会」等主题会经常出现在他的歌词中。他还曾为当地街道办事处创作宣传计划生育的作品。

图九：甘建秋在他的家里演唱自己的原创歌曲 (2009年12月)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拍摄

另一个例子是前面提到的工人豫剧团。为什么中国的地方戏会成为在老工人中颇受欢迎的文化表达方式呢？自延安时期，毛的文化干部就制定了促进地方戏发展的文化政策，并试图以这种方式来实现自下而上的民间文化与自上而下的阶级意识的耦合。像甘早期的音乐一样，在毛时代，豫剧团表演的内容也大多是关于劳动和工业生产、工人阶级文化和日常生活经验。然而，在被社会主义的文化空间排除后，他们的表演却开始向传统回归，比如【杨八姐游春】这样的传统唱段，其中表达的是中国民间文化和价值的声音。

图十：排练中的工人豫剧团 (2009 年 12 月)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拍摄

山岳人登山群表现出来的声音更加复杂。在登山时他们演出的节目中，总是会涉及到关于工农的革命歌曲和舞蹈，这些歌舞大都来自于他们年轻时代的革命样板戏和电影。然而，这些歌舞的价值与旧的阶级意识已经脱离了关系。相反，他们把自己看做是一个追求健康生活和自娱自乐的团体。看来，他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工人阶级的声音，却发现一个公民的声音。

图十一：「山岳人」的新年晚会 (2010 年 12 月)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拍摄

图十二：夜晚一群四五十岁的女工自发聚集在工人文化宫的广场，
在零下 20 度的户外学唱一首苏联歌曲 (2009 年 12 月)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拍摄

不像鞍山，皮村的文化空间从物理上意义上来说是十分有限，甚至简陋的。但它却通过数字网络得到了充分放大，工人阶级的声音被最大化表达出来，成为了一种行动、一种集体参与的过程、和一种工人的核心价值。这种价值充分体现在打工艺术团的座右铭里：「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不过，在一个具体的文化语境里，工人阶级声音和意识的实体化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直接的过程。考虑到中国新工人的内部多样性，以及工人和其他社会阶层、权力机构、市场之间的复杂关系，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声音在短期内较难出现。毕竟，具有多元的声音，本身就是「声音作为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Couldry, 2010）。那么，在皮村的案例中，多元的声音在哪呢？

「打工博物馆」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空间，因为它里面呈现了过去 30 年间中国打工者阶层的生活经验和历史命运。它由五个展厅组成：（一）综合展厅，展出了自 1978 年以来的流动人口必须随身携带的各种证件，包括现在臭名昭著的暂住证的各地版本；（二）公益团体展厅，展示了 20 多个全国性的非营利组织的宣传刊物，它们的工作遍及劳动、性别、儿童、工伤、打工文学等问题；（三）儿童展厅，展示各地有关农民工子女，打工子弟学校的教育政策文献，和打工子弟的各种物件；（四）女工展厅，展现打工妹的工作状况和国家政策，以及七个女工的生命故事；（五）实物展厅，展出了工人的工作服，工作用具，由工人拍摄的照片，以及显示农民工居住条件的廉租房。除了上述大部分永久性展览外，博物馆也会不定期举办主题展览，比如其中一个在博物馆外墙上悬挂的由农民工子女们拍摄的照片展。

图十三：打工博物馆内的展品 (2009 年 10 月)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拍摄

显然，这个打工博物馆试图反映出新工人阶级多元的声音，这种多元跨越了专业、性别、年龄、历史时期和地理区隔。它同时采用了多元的方法来展示，从器物到印刷品，到工人自己创造的音像制品。比展出的物品更为重要的，是工人 NGO 的成员之间关于博物馆建设的讨论过程，涉及到了博物馆结构的安排，展品的摆放，勾连什么样的工人阶级意识，以及如何勾连。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打工艺术团与其他工人 NGO 一起组织的新工人艺术节上。在这个艺术节上，各式各样的活动在新工人剧院、电影院、和大院中举行。为了把这些多样的活动组织在一起，他们首先要定下一个总的主题。2009 年 1 月，第一届的主题是「打工三十年」；2009 年 10 月第二届的主题是「新工人」，也是从这届开始，最初的「打工艺术节」被更名为「新工人艺术节」；2010 年 9 月的第三届，主题是「尊严」。围绕着这些总的主题，工人们进行各式各样的演出，包括工人乐队、舞蹈、诗歌朗诵、民间戏曲、电影放映、甚至还有一场「工装秀」，工人们挪用了时装走秀的形式，在舞台

作，特别是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卜卫教授和她的学生。在合作中，他们组织了自己的新闻发布会，协商他们的媒体策略，新工人艺术团总干事孙恒还成为了整个活动的新闻发言人（卜卫，2009）。孙恒也负责处理国际事务以及同当地的政府部门交涉，使得艺术节的活动能够得到官方承认。

这些协调和努力的结果，使得新工人艺术节获得了同时来自政府和商业媒体的关注，如官方的《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市场性的《南方都市报》、凤凰卫视等。值得一提的是，艺术节同时也遭到了不少批评。一些持更激进立场的劳工运动者认为这些主流媒体上的曝光使得新工人艺术节跟官方「走得太近」。他们同时批评新工人艺术团和它的参与者们脱离了劳资冲突的直接抗争，而仅仅做些不痛不痒的文艺。这再次说明，「声音」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是当它涉及到整个新工人阶级，而不仅是个体劳动者。

伍、讨论：迈向一个更精确的比较框架

本文分别对鞍山和皮村两个工人阶级文化空间的个案进行了分析。我们检视了实体空间、数位网络，和其中的「声音」。限于研究的探索性质，文中的经验材料主要用于呈现问题，尽管我们期待在未来将这项研究发展成一个更加丰满的「拓展个案」（*extended case studies*; Burawoy, 2007）。

在鞍山，工人文化宫拥有巨大的规模，有可以追溯到 50 年代的久远历史。其空间转型，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毛泽东时代到 90 年代，再到 2004 年左右，直至当下。在这个转型的历史中，文化宫经历了再封建化，变得越来越封闭，如今，作为一个演出的舞台，它仅仅开放给「专业人士」，作为一个集会场所，仅开放给技术革新者物质奖励。不过，在这些设施对工人关闭之后，鞍山的工人们也找到了新的方式去展开他们自己的文化生活，不论是在文化宫周围的广场上，还是在网上的 QQ 群和聊天室里。然而，渗透在这些文化活动中的声音，却不再是工人阶级的价值。毛时代歌曲的演唱，更像是对于过去时代的怀旧，而与当下的现实无关。传统戏剧、爱国主义、工人和非工人共同构成的网上群组的社会支持，排斥了新工人的参与——在鞍

山，我们看到的更接近一个典型的「市民」(civic)的公共城市空间，而不是工人阶级的空间。

在北京皮村，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小和更简陋的院落。它只存在了几年，且位于距市中心很远的郊外。不过，这个小空间却更加的开放，访问者不仅来自附近的打工者社区，也来自北京，全中国，和世界各地。新工人艺术团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建起了自己的博物馆、电影院和剧院，又透过网站、博客和 QQ 将这个偏远的小庭院拓展开去。皮村中的声音与鞍山有着天壤之别。他们表现出一种非常自觉地勾连自己工人阶级身份的努力，他们从工友的视角出发，记录着工人对于当下生活经验的表达。这些声音与毛时代和当代的主流文化都很不同。他们反映了当下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打工者的日常生活经验、苦难、和梦想，从手工业者、建筑工人、到家政服务。最重要的是，劳工 NGO 在帮助工人阶级表达阶级地位的认识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新工人艺术节、打工博物馆中的展览，和新工人艺术团的多张专辑——这些都帮助尚在形成中的中国新工人阶级发出了他们自己的声音。

诚然，对于这两个案例的复杂比较分析而言，只采用物理空间、数位网络、和声音肯定是不足的。此项比较研究并不试图完成对中国工人阶级文化空间的全景检视，鉴于中国广阔地域的差异性和快速社会变迁，两个案例的选取带有不可避免的外部有效性限制。鞍山是拥有大量老国企工人的社会主义重工业城市，相比于欠发达的非工业城市具有更加深厚的毛时代城市建设遗产和单位体系；皮村是典型的后毛时代城市边缘的移工聚居地，流动人口社区具备了一定的居住和家庭稳定性，这与南中国沿海工业区的高度流动性体验又有所不同。不过，在苏州、重庆、深圳等地的工业区中，工人的文化空间和文艺团体也在冒生中，且与北京皮村形成了跨地域的全国性移工文艺网络。

在案例本身的外部有效性和拓展性之外，我们的目的是迈向一个更精确的比较框架，不仅可以强化现有关于中国工人阶级形成与工人文化的研究，也可在未来发挥更大的理论和方法论潜力。从本文的经验证据和探讨来看，这一框架可能进一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比较和讨论：

首先，不同的文化空间中是否反映出了不同的阶级意识？又是如何反映的？鞍山的工人阶级文化是历史的残片，是旧的生产关系瓦解后，文化的「出走」(exodus)。这些残余中混合了传统文化（如豫剧）和当代主流文化的碎片，其结果是对独特阶级身份的淡化。然而，我们也不应就此对社会主义的老工人盖棺定论。通过盗猎商业空间、改造物理空间的用途、开拓自己的网上空间，并演出自己喜欢的节目——即使这些节目是相当主流的。在培育出了新的市民文化的同时，这些活动也延续了社会主义城市生活的集体意识和共同感，这也可能成为未来阶级意识回归的基础。正如邢国欣(Xing, 2011)在郑州工人文化宫观察到的政治性工人组织，可以与本文所考察的文化活动形成相互验证。邢在对河南省郑州市工人文化宫外围的田野调查中发现，文化宫及其周边广场在服务工人文娱活动的同时，也构成一个冒起中的「无产阶级公共领域」(proletarian public sphere; Xing, 2011, p. 14)。在2011年10月，郑州市出现了中国大陆罕见的支持「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的抗议活动，正是由长期在工人文化宫周边公园活动的中老年工人团体所组织，而这一事件中体现出的跨国团结，又无疑是借助了网络空间和实体空间的连结。文化宫作为社会主义残留的工人文化空间，依然容纳着政治性的阶级意识，为老工人的集体行动和跨地域团结提供了可能。这提示我们，旧的阶级力量尚未黯然退场，依然可以在城市空间纹理和传播科技的社会创新中寻找。

皮村大院正好与鞍山相反。新工人艺术团的成员在有意识地推进新工人阶级的文化，例如，他们将打工艺术节重命名为新工人艺术节。他们在不同的形式中注入了这种始终如一的坚持（例如，展览和演出、音乐和戏剧），同时触及到了广泛的议题。

有趣的是，沿着这一维度比较，鞍山和皮村之间也存在某种相似之处。一方面，双方都不同程度地回归到中国传统音乐作为表达和创作灵感的来源。另一方面，双方也都反映出中国城市新公民文化形成的趋势，都会经常使用诸如「公民」、「公民权利」、「公民参与」等词语。乍看之下，传统文化和公民身份应该削弱独特的阶级意识。然而，正如皮村的案例中所显示的那样，在传统文化和新公民运动中拥有丰富的可能性，可以为出现更具包容性

的阶级认同论述做准备。这正与 Thompson 对于阶级的认识是一致的，阶级的实质并不是预先确定的，而是只能在不断更新的历史经验中生成。

第二，在文化空间的组织中，地方权力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虽然尚未充分地深入这一问题，但我们对空间管制的讨论已经触及了地方权力在其中的参与。在鞍山，地方政府是文化宫最初的建设者，其于 90 年代早期到 2004 年间的退出可以被解释为空间的商业化，然而现在，鞍钢仍然垄断着这个空间。对于像甘建秋或豫剧团的老工人来说，他们某种程度上建立起与基层国家机构，特别是街道办事处关系。另一方面，皮村与朝阳区文化站建立了联系，从文化站那里得到了最初院落改建的部分经费。地方官员也会经常出席皮村的文化活动并发表讲话，尽管他们几乎不会留下观看演出或参与工人的文化活动。这种联系并没有限制新工人艺术团的自主性，事实上，它也从北京其他各种官方的联系中受惠，包括各部委和中央党校。官方媒体的报道是这其中另一点重要资源。

然而，据此认为地方政府对工人文化活动全力支持还为时尚早，需要问的是，国家资源的退出和介入一定是草根的工人文化空间是否能够存续的必要条件吗？在鞍山，历史清楚地显示自 1980 年代，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系统性地退出了对工人自主的文艺组织的支持。在 2004 年以后，尽管国企收回了工人文化宫的所有权，但将其规制成一个封建化的公共领域，从而将工人的文化活动边缘化，排出到广场和网络空间。

皮村的案例更具复杂性，需要进一步梳理。一种观点认为，国家想将朝阳区打造成国际文化产业枢纽，这个政策的衍生效应解释了地方政府对于皮村和新工人艺术团的善待。一个更具批判性的解释是，许可新工人的文化空间在皮村冒起，是国家用来监测和治理流动人口文化表达的新策略。目前的经验观察尚不足以支撑或拒绝任一解释。从田野和访谈中体认到，地方治理系统本身存在很多内部冲突。文化部门的官僚给予更多支持时，土地和消防部门同时在威胁关停新工人艺术团的文化空间。在地方权力的治理结构中，消防和土地部门的影响力并不低于文化部门，甚至更高。考虑到地方政治的生态，一个更有效的解释是，新工人艺术团策略性地巩固与特定国家部门和媒体的关系，以保护自身免受那些反对部门的滋扰。从外部来看，这种关系

更像是一个主从关系，但内部人士将其看作在治理机构间谋求合法性的必要行动，这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文化活动的自主性。

第三，劳动与文化表达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鞍山工人群体的特征是这二者的分离，因为参与者已处在他们的晚年，大都退休或者下岗，已经离开劳动过程。因此，对于鞍山的退休工人而言，他们很容易从退休的公务员、专业人士和私营业者那里找到彼此之间的共性。毕竟，他们都是退休人员。这个重要的与劳动过程的分离解释了鞍山工人模糊的身份认同。同时，这也助于解释毛时代文化残余的持久性。阶级认同不尽在共同的劳动过程中，也建基在共同的日常生活方式和城市文化经验中。

在皮村，我们观察到的恰恰相反。分离仍然某种程度上存在，特别是当工人成为全职 NGO 工作人员时。尽管如此，分离的程度要低得多。他们以前的工作本来就是在坐落在附近工人社区的服务业和轻工业部门。而且，新工人艺术团的成员也在有意识的避免这种分离，他们将生产一线的工友视作新工人艺术节的积极参与者，同时他们也会亲自参与体力劳动，比如新工人剧场的建设。最重要的是，新工人艺术团并不是一个自娱自乐的孤立组织。它连接了许多劳工 NGO 和中国各地的工人文艺团体，他们的成员遍及各种劳动形式中，从中产生了丰富的生活经验，最终汇聚为强大的文化表达。

最后，回到比较性拓展案例的理论潜力上来，两个空间个案的代表性质有着显著的差别。鞍山工人文化宫所代表的工人文化空间，曾经遍布这个国家的工业城市，植根其上的工人文化形成于社会主义城市日常生活的深厚传统和惯习，是工人社区的有机体。此后，文化宫所经历的商业化和再封建，也是后社会主义城市转型的普遍经验，伴随空间转型的是工人阶级实存和身份认同的双重瓦解。尽管他们的机体和文化组织在生成新的领域，但社会主义阶级意识的失语却不可避免。而皮村的个案恰恰相反，相比于中国移工社区文化空间和组织的普遍缺失，新工人艺术团的空间和文艺实践独具特色，不仅结成了跨地域和媒介的工人文化网络，而且爆发出强烈的阶级身份诉求——通过博物馆、唱片、工人艺术节、网站等多样的文化产品和实践，不断召唤一个「新工人」阶级的出现。然而，艺术团对在地工人社区文化和集体感的培植依然面临重重困难，群众基础的培植被流动性打散，尚未形成一种

有机化、日常化的阶级文化经验，其性质更接近由 NGO 驱动的倡导性组织。因此，虽然皮村的文化空间有着「过剩」的阶级符号和话语，却缺少一个与之对应的阶级实存，即过剩的能指却不指向相应的所指；而遍布全国工业城市的工人文化宫和老工人文化组织，却面临着所指丰富，而能指供给不足，甚至趋于消散的境地。

那么，阶级文化的能指和所指如何接合？新旧工人发出的声音到底有谁在「倾听」？新老工人的文化空间是否会随着时间壮大？它们将如何进一步发展，以及如何纳入或排斥其他社会阶层的成员？如何跨越不同行业劳动者之间的鸿沟，如何勾连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愿景？属于新旧两代工人阶级的文化空间会否最终汇聚？或者借用汪晖（2014）的提示，新旧两代工人阶级的「阶级命运」是否能上升为一个普遍性政治课题？回答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从这篇论文出发，在经验材料、方法和理论等方面进一步发展本文提出的比较框架。

参考书目

- 卜卫（2010）。〈民族志教学：以第一届打工文化艺术节的参与式传播为例〉，《新闻学研究》，102: 229-251。
- 戴锦华 编（2000）。《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孔书玉（2012）。〈下岗女工、苦情戏及中国电视剧的情感空间〉，《传播与社会学刊》，19: 31-57。
- 汪晖（2014）。〈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开放时代》，6: 49-70。
- 杨宏海（2007）。《打工文学备忘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Barboza, D., & Bradsher, K. (2010, June 16). In China, labor movement enabled by technology. *The New York Times*, p. B1.
- Burawoy, M. (2007).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artier, C., Castells, M., & Qiu, J.L. (2005).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equality,

- mobility and translocal networks in Chinese citie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40(2), 9-34.
- Castells, M. (1997). *The power of identity*. Oxford, UK: Blackwell.
- Chan, J., & Pun, N. (2010). Suicide as protest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Foxconn, global capital, and the state.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Retrieved from <http://japanfocus.org/-Jenny-Chan/3408>
- Couldry, N. (2010). *Why voice matters: Culture and politics after neoliberalism*. London UK: Sage.
- Koch, P.T., Koch, B.J., Huang, K., & Chen, W. (2009).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QQ user: Instant messaging in China. In G. Goggin & M. McLelland (eds.), *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et studies: Beyond anglophone paradigms* (pp. 265-284). New York, NY: Routledge.
- Lee, C.K. (2007).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sunbelt and rustbel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Qiu, J.L. (2009). *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 urban Chin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Qiu, J.L. (2010). Network labor and non-elite knowledge workers in China. *Work, Organization, Labor and Globalization*, 4(2), 80-95.
- Sun, W. (2010). Narrating translocality: Dagong poetry and the subaltern imagination. *Mobilities*, 5(3), 291-309.
- Thompson, E.P. (1966).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 Yang, G. (2007). How do Chinese civic associations respond to the Internet: Findings from a survey. *The China Quarterly*, 189, 122-143.
- Xing, G. (2011). Urban workers' leisure culture and the "public sphere": A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ers' cultural palace in reform-era China. *Critical Sociology*, 37(6), 817-835.
- Zook, M. (2005). *The geography of the Internet industry: Venture capital, dot-coms, and local knowledge*. Oxford, UK: Blackwell.

Working-class cultural spaces: Comparing the old and the new

Hongzhe Wang & Jack Linchuan Qiu*

ABSTRACT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s central to class formation. By culture, which in this paper is related to space, technology, and voice, we understand the distinctive ways of expressing, articulating, and reproducing working-class life that are essential to the class identit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of China's working classes, old and new. This paper analyzes two workers' cultural spaces, in Anshan and Beijing's Pi Village, respectively, with examinations of the physical space, the digital networked space, and the voices therein. Empirical data are gathered through repeated site visits, interviews with key local actor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workers' cultural events (offline), and observation of workers' online communication patterns. Methodologically, this paper tries to develop a more refined comparative framework, which offer a revision for the theoretical articulation among space, technology, and class formation in China.

Keywords: class consciousness, class formation, cultural palace, ICTs, network, working-class

* Hongzhe Wang i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E-mail: whz@pku.edu.cn

* Jack Linchuan Qiu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E-mail: jackliu@cuhk.edu.hk

中国独立电影创作的场域分析，1990-2013

邱海棠*

本文引用格式

邱海棠（2015）。〈中国独立电影创作的场域分析，1990-2013〉。《传播、文化与政治》，2:61-98。

投稿日期：2014 年 6 月 6 日；通过日期：2014 年 10 月 26 日。

* 作者邱海棠为国立交通大学传播研究所硕士，任职传播机构。e-mail: begoniakoo@163.com。

《摘要》

一批无法或不愿意进入中国主流电影场域的创作者，当国家只允许电影厂拍片时，他们选择向西方获取资源以独立制片；当国家鼓励商业电影推广积极形象时，他们坚持写实主义；当国家在防范网络言论失去管控时，独立电影在国内已经从线上、线下聚集了渴望另类表达的观众群。中国独立电影的发展，并非创作者们英雄式的反抗，也不单纯因国内社会转型催生，而是一种行动者的主观策略与客观场域条件之间的互动结果。

关键词：中国独立电影、另类观众、海外资源、国家检查、场域分析、
写实主义

壹、前言

1990年张元导演自筹资金，在剧本未送审、影片未经批准的情况下自行拍摄了电影【妈妈】，并将其送往国外影展。1949年以来中国的电影，第一次出现了以「独立」为名的类型，也是第一次站到了官方掌控的「体制」之外。此后，王小帅、娄烨、贾樟柯、李杨等越来越多导演以独立电影起家，创作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作品，并在国际上屡获嘉奖。这些电影在制作上挣脱商业和政治桎梏，以私人资金进行独立制片；在内容上竭力从草根的、边缘的角度描绘个人内心世界或社会问题；在艺术表现上重视纪实性与艺术性，而非中国传统以来偏向戏剧与寓言式的电影美学。

Y. Zhang（2007）曾总结，1990年代初中国电影基本上只有政府资助的用以宣传的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以及娱乐片或商业片这三类电影。时至今日，这样的局势并没有发生太大改变，而独立电影的存在，正是主流电影沉闷格局下最令人期待的一种另类。在第一本关于中国独立电影创作者的传记《我的摄影机不撒谎》（程青松、黄鸥，2010）中，这个群体为自己的电影定下了「力求真实」的集体宣言，在此之下又各自进行着不同层次的尝试，例如娄烨的文艺爱情故事，王小帅的青年回忆，贾樟柯的故乡变迁史等等。可以说，独立电影创作者们似乎正努力实践着区别于当代中国电影主流的创作策略。

然而，不论是这些电影人还是电影本身，「独立」带来突破与变革希望的同时，还有一种漂泊与投机的尴尬。因为中国特殊的电影政策，这些不在官方掌控下的独立电影大多无法与国内观众见面而成为「禁片」，只能利用国际电影节获得放映与名气。因此也有人质疑，这些「禁片」所彰显的「与官方对抗」意涵，逐渐成为中国地下电影转战海外的重要资本（彭侃，2011）；同时，大多独立电影都遭遇了摄影粗粝、表演生硬、模仿严重、题材过于单一等方面的诟病。随着2003年电影当局的招安，也有越来越多的独立电影创作者利用地下时期积累的名气走进体制，拍摄商业影片或电视剧，让独立电影似乎成为年轻电影人走向商业化的一个跳板。

基于以上论述，笔者希透过中国独立电影的场域分析，了解中国独立电

影的创作者如何进行实践？他们的电影在中国电影场域中处于什么位置，有什么意义？变革的社会中，哪些力量在推动或阻碍中国独立电影的发展？独立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的另一种可能，发展之路何去何从？

贰、「独立电影」在中国

这些脱离官方制作体系而存在的电影，早期并未被统一称为「独立电影」。

根据彭侃（2011）的整理，西方学者对中国这类电影的研究中，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采对峙的意识形态将其命名为「地下电影」和「异议电影」，即中国进步人士用以「突破集权禁锢」的文化武器，例如 Rayns (1996) 曾表示，当【北京杂种】与【邮差】被越多人看，就越能够成为在中国争取真正的表达自由的筹码。第二类研究则主要将中国这类电影当作对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中国特殊景观的客观反映 (Lin, 2002)，如 Pickowicz (2006) 以「后社会主义」将中国地下电影中碎片化、断裂化的缺陷，归咎于现代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过度纠正；Z. Zhang (2007) 使用「都世一代」描写中国 90 年代后受到城市化影响的青年电影人，试图归纳「多样化的体制、社会与美学身份及它们与中国当代电影文化和转型期社会的关系」(Z. Zhang, 2007, p. 4)，S.H. Lu (2007) 将这类电影看做是一种对被破坏的传统家庭结构和社区空间的感伤与怀旧，Braester (2007) 分析拆迁和都市化进程如何造成人们身体漂移的伤痕与城市身体的伤疤。第三类研究主要从电影人与体制和西方文化力量的辩证关系中出发，为独立电影人的创作内容及风格归因，包括 Y. Zhang (2006) 将中国独立电影人的「真实」宣言视为区隔于中国国家主义、英雄主义的主流论述的策略性定位；Lin (2010) 则强调当代艺术界的政治异议份子与体制之间的尴尬对立——他们既想当反对者，又不得不进入体制。

回望中国，大多早期研究的视角采用了中国电影界习惯的代际划分，将新兴起的独立导演归结为一群与第五代、第四代截然不同的第六代导演，探讨此类电影的文本特征，例如韩小磊 (1995) 曾总结「第四代叙事电影，第

五代是语言电影，第六代就是状态电影、个人电影，常常没有故事，只有情绪」；陈旭光（2002）将第六代的精神特征总结为主体性、现代性以及先锋性等等。尽管后来有学者开始反思这种代际划分的准确性（石川，2003；戴锦华，1996），但这些研究的落脚点依旧是分类和比较，缺乏针对中国电影在实践上的连续性进行探讨。第二类研究则从社会背景、体制以及第五代影响上为独立电影人的选择找寻「时代原因」，例如戴锦华（1996）认为第六代导演并非主动对官方体系的颠覆，而是在跨国资本独爱第五代的状况下被「逼上梁山」后的无奈举措。还有很多学者试图从全球化、中国社会的权力集中化、资本主义化、现代化进程等面向，为中国新生代导演的题材与风格寻找原因（孙绍谊，2004；陈旭光，2002；黄式宪，2003；郑洞天，2003）。第三类研究，则着重于探讨「西方因素」对中国独立电影的强势影响，例如早期的独立电影就被学者指控为「文化的预谋」，认为这些电影中的中国景象是将主体位置拱手奉予西方之后对自身位置的想象，而非真实（赵宁宇，1995）；马然（2009）提出「电影节电影」概念，指出一些年轻的电影作者透过模仿特定的美学特征或者重复敏感题材来赢得国际电影市场的通行证。还有些中国研究则专注于为第六代走入市场出谋划策（井延凤，2010；高力，2001；杨忠贵，2008；翟建农，2000；郑洁，2003），但这些文章基本上只从经济利益出发，谈论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之路，对影片的文化价值与创作者实践等部份是避而不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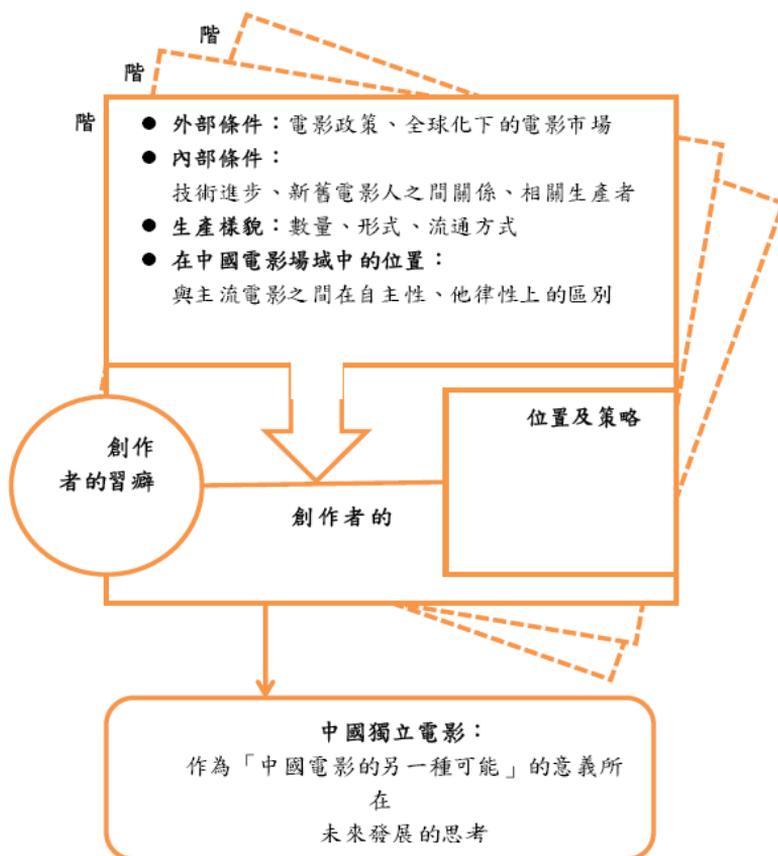
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学者的研究倾向于将中国独立电影看作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一种产物，或者是对中国当代「真相」的一种纪录，忽略了每个电影创作者的主观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真正而具体的中国电影脉络，呈现出了西方学者的特定想象。而中国学者的代际研究则习惯将中国电影导演以群代进行区分，重视一批创作者各自的特色，忽略不同群体之间在生产实践以及文本风格上的连续性，对中国电影的出路也仅寄托在「市场化」上，无视这些电影的特殊性对中国电影整体发展的意义。「独立电影」概念起源于西方，被寄托为是另类而有希望突破主流的电影模式（Kleinhans, 1998），但在不同地区、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下，独立的定义并不同（Levy, 1999）。美国的独立电影通常是指独立于其国内最大的商业电影制作体系好莱坞。然

而，在大公司权力垄断的「片场时代」，小公司和低成本制作的「贫民街」(Poverty Row Studio) 电影 (Dixon, 1986) 就被称为独立电影；而在大公司式微的新好莱坞时期，许多由片厂支持的主流影片也常被人们归为独立一类 (Tzioumakis, 2006)。因此，美国独立电影的定义一直随着它与主流好莱坞之间的张力而变迁，「独立」只是被人们用来区隔于那些强调特效或卡司强大的类型片，实验性、先锋性、文艺电影、有政治色彩的、低成本剥削电影等等元素都被溶于其中 (King, Molloy, & Tzioumakis, 2012)。而在欧洲，由于好莱坞对欧洲市场的全面侵占，几乎所有的欧洲人制作的电影在某个意义上都可以称为独立电影 (Plotkin, 2013)，因此他们用「艺术电影」来定义那些区别于好莱坞经典叙事逻辑的另类影片。同时，独立也可以是政治意义上的反抗。1970 与 1980 年代，德国的独立电影与录影带工作坊就建立了全国性的网络，以电影表达当时新左派思潮的诉求，例如工人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反核运动等 (Brunow, 2012)。1980 年代的韩国独立电影，就属于强烈反对政府压制，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类型 (Park, 2009)。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独立电影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脉络下所呈现的意涵并不相同。要从「中国电影另一种可能」这一问题意识出发，必须采用「独立电影」的概念，将之放置于中国的特殊脉络上，才能明确创作者采取独立姿态促因又是什么，而它与主流之间的斗争又是如何进行的，从而揭示这些电影之于中国电影的意义。

本研究主要透过文献整理搜集，以中国独立电影不同阶段的创作者及其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辅以中国政治体制、电影制度、社会文化变迁、历代电影史等相关资料，从而回答此前提出的问题意识。论文的研究架构如图一所示。研究过程中，为了解目前仍未成名的学生导演，以及近年来才兴起的国内民间影展的运作情况，笔者补充进行了三次访谈，对象分别为导演张内咸 (2013 年 11 月 22 日)，导演杨潇 (2013 年 11 月 24 日) 以及纪录片导演兼中国年度独立影像展编辑部志愿者孙浩然 (2013 年 11 月 27 日)。

图一：研究架构



参、中国独立电影场域的变迁

从1990年张元的【妈妈】至今，中国独立电影已经走过了十三个年头。与同时期的其他文化产物相比，独立电影还活着已是个奇迹；但与同胞兄弟商业电影相比，它又实在活得不怎么样。曾于国际电影节中惊艳四座，也在国内独立影展上被黯然断电，承接八十年代启蒙余温的精英色彩逐渐消退，

数位影像与网路传播成为主要战场，从「地下」到「独立」，从纪实到荒诞，中国独立电影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

一、出生在「地下」：1990-1999

现代中国的第一部独立电影【妈妈】诞生在 1990 年，历史的车辙在这一年悄悄转了个小弯，刚从八十年代万象革新中走来的中国，却因 1989 年天安门事件而停止了政治改革，但在经济领域，邓小平 1992 年的南巡讲话则确认了经济改革之路将继续进行。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成了国际贸易与跨国资本投入的新兴地，国内传媒与大众文化发展也使中国能够快速地融入全球化过程。文化消费化、阶层化、大众传媒化，审美观的范俗化以及价值分殊化等，构成了当时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表征（罗晓南，1996），也催生了年轻人们关注自我，关注现实的表达欲望。

从 1949 年到 1993 年，中国当局一直实行仿照前苏联建立的电影生产体制，即「电影生产和发行放映政企合一、按指令性计划指标生产和发行放映电影」（毛羽，2002）。「电影规划和生产的主旋律化，正面宣传为主，鼓励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淡化海外境外节目，保护国产电影的市场份额，加强对电影剧本的审批，制定电影审查制度等，都是国家政权加强电影调控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尹鸿，2001，页 24）。1993 年电影体制才初步改革，逐渐向跨国资本和民间资本开放电影制作和发行权（毛羽，2002），但电影制作权基本被控制在少数国有电影厂的手中，放映权更是必须通过电影审查机构的把关之后才能获得。而电影审查的标准含糊，过程不公开，又让权力对电影内容的控制更为直接与迅速，降低了中国电影创作的自主性。

在这样严格的把控之下，当时中国电影生产场域其实拥有着很高的门槛，没有从专业的电影学院毕业，就难以被分配入电影制片厂工作，也没有拍摄电影的许可证，更无缘之后的审查与放映。

然而，从第五代导演以「张艺谋模式」（T. Lu, 2007）在国际上打响名堂之后，中国「非主旋律」的影片就在国际电影节中得到极大的「礼遇」。

几乎送出国参展的独立电影都能够在国际电影节上斩获殊荣，评论家们的赞美却较少针对电影本身的艺术价值，更多在于「道德」上的支持。「欧美电影节对于电影作品的评价往往不能摆脱渴望进步、民主、正义以及人权的价值判断；而这些判断标准也经常有鉴于当下热议的多元文化主义和政治正确性等主题而做出修改」（马然，2009，页 120）。这样的选片倾向，一方面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内容呈现，在 80 年代末导致了中国民俗电影出现「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国际的」的奇观式思维模式（张英进，2004）；另一方面，国际电影节也影响和培养了西方艺术电影观众的观赏喜好，让他们更加期待透过电影想象性地经历异国人的生活（Nichols, 1994）。

国际电影节能够为中国独立电影创作者提供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以及象征资本。社会资本是指当电影导演在国外接触到的各方面人物能够为导演带来更多资源。经济资本是指，国际电影节提供的奖金或者，一些电影基金所提供的影片拍摄、制作资金等，这对于当时在国内难以获得国家制片厂投资的电影人来说也是资金来源的重要方式。而象征资本就是指在国外获奖之后，所赢得的国际声誉既能推动影片在国外的放映发行，也能将名气带回国内，为下一部影片的投资带来机会。

1990 至 2000，大约有二十多部独立剧情片诞生。这些影片大多由电影学院的新晋毕业生，或者从国外回来、不满国内电影现状的电影青年拍摄而成。而影片的共同特点则未受政府或者政府控制的电影厂资助，由导演或制片人独立集资拍摄而成的影片，大多未通过或未送审查，不能在国内公共电影院公映。综合上述背景，新一代导演在 1990 年代初面临的状况是，国内的制片厂中难以找到拍片机会，而国外却有观众、有资金在等着他们。

二、集体的成长：2000-2007

自从 1994 年中国开放每年 10 部进口大片以来，国产电影从数量到票房都出现大幅下降（李正光，2009）。中国当局开始了以市场为基础的电影产业模式转型。政策方面，2003 年电影总局发布系列法令规定，除重大革命历

史题材、特殊题材、国家资助影片、合拍片四类之外的影片不必再向电影局申报剧本，只要提交不少于 1000 字的剧情梗概、片名、片种、题材即可；中国电影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得到实现，同时也允许了允许外资参股，同境内国有电影制片单位合资成立电影制片公司¹；产业结构上，中国的传统电影厂改组成几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电影集团。同时，国家对于曾经的「禁片」导演也有所松绑。2003 年 11 月，电影局在北京电影学院召开与以第六代导演为主的独立影人²座谈会，会议中官方一改以往「严厉惩处」而将会议定位为「既往不咎」，表示期待「大家能坐下来谈谈」。何建军、贾樟柯等七位独立电影人³甚至提出了取消电影审查制度的倡议。

2000 年，中国社会开始出现手持摄影技术与 VCD、DVD，这些器材在资金与技术上都降低了年轻人与业余爱好者进入独立电影场域的门槛，也为无法公映的独立电影在地下流通开了另一扇窗。同时，网路在 2000 年之后的逐渐普及，也让以往只能能够在大学礼堂或知识份子聚会中放映讨论的独立电影，透过网路可以接触到社会各个阶层。

这个阶段中，中国独立电影同样受到了国际电影节的欢迎，但此时国际影评人对于中国电影的认识逐渐有了回归理性的趋势。例如，Pickowicz（2006）将中国独立电影与国家的关系定义为「共舞」而非「对立」，因为他发现大多独立电影不直接批评政府，而是通过自我审查，在不断地探索政府所默许的边界。同时他也意识到独立电影人会通过以「小偷」或「妓女」等稍敏感的题材，再为自己冠上「禁片」名头以换取在国际电影节上的关注与资助。可以说，这个时期国际学者对中国独立电影的价值指认，逐渐脱离了上一阶段单纯而充满意识形态对立意味的「反体制斗士」，而进入「转型社会的真实记录」。在 Z. Zhang（2007）的论文集中，西方学者们认为这批

¹ 2000 年，國家廣電總局與文化部聯合下發了《關於進一步深化電影業改革的若干意見》，提出組建電影集團和實現股份制改革，使製片、發行、放映一體化，並倡議建立以院線為主的供片機制，對進口影片的供片政策也進行了調整。

² 當時參加會議的獨立導演們來得很全，包括賈樟柯、王小帥、婁燁、何建軍、章明、王超、崔子恩等已成名的創作者，同時還有一大批參與到獨立製片行列的後來者，如張亞璿、劉建斌、烏迪、睢安奇、李玉、耐安、呂樂等（李正光，2009）。

³ 何建軍、睢安奇、賈樟柯、婁燁、王小帥、張獻民、張亞璿

电影人采用了高度纪实美学来还原现实与情绪的原质状态，将自己放置于「见证」(witness)的位置。而这种「真实记录」的指认，则让这个阶段的中国独立电影开始呈现出更多的纪实风格。

在上述力量影响下，2000年之后的中国独立电影场域出现了创作者数量增加、去精英化和社团化三个趋势。设备平民化令独立电影场域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手持DV拍摄低成本录像的创作者。创作者增加导致作品质量参差不齐，让原本充满精英色彩的独立电影加入了更多的业余成分，带动了中国第一个独立电影社团「实践社」在2000年成立，并在此年开展全国五地巡展，所到之处独立电影的力量都得到了整合（王小鲁，2010年6月25日）。此后，朱日坤在2001年末创立现象工作室与现象网，前者主要辅助独立电影出版DVD、举办相关放映活动，后者则成为中国接触独立电影的主要入口网站，被网友们誉为「中国独立电影大本营」。

三、影展掌门人：2007-2013

2007年开始，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全球化得到了加速，政府为在国际上维护形象而开始实现部分资讯公开，同时亦担忧日益开放的网络会加速西方言论对国内民众的影响，因此各种网络审查与查封开始愈加严格。2009年，原本十分活跃的现象网突然被暂停访问，直至，影展等实体活动也常常遭到打压，不少民间独立影展直接被下令停办，独立电影的地下色彩再度浓厚起来。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的主要策展人张献民在对《纽约时报》的撰稿中提到：

不同行政部门向组委会提出了一些要求，举例如下：1、不要有国际来宾。我们认可了不向任何国际来宾发送请柬，乃至不向有兴趣了解的人士发送通告，但我们无法阻止国际人士入场。2、不要公开宣告影展的消息。3、不要做任何公开展映，也不要举办论坛。4、提供影展筹备的材料，比如所有报名影片的备份（张献民，2013年5月16日）。

除了政治打压，电影产业市场化的加剧也对独立电影产生了不小打击。中国电影 2009 年之后整体票房收入节节高升，电影投资热；二小成本影片异军突起，不少投资方青睐。迅速市场化之后，原本政府严格控制的中国电影逐渐转化，中国电影集团与华谊兄弟传媒集团、博纳影业、光线影业、星美传媒集团、乐视影业、小马奔腾、DMG 娱乐传媒集团等七大民营集团垄断电影制片市场（白瀛、周玮，2013 年 11 月 29 日）。资本对票房的追逐，以及小成本商业片的走俏，令独立电影的人才、资金来源和市场不断被侵占，但独立剧情片的数量却跌至谷底（现象工作室，2010 年 5 月 31 日）。原因可能是独立剧情片的创作者相对比较专业，而在中国电影市场的急剧增长趋势下，他们也更容易走向商业化的主流电影场域中。另一个明显变化则是独立电影的内容风格，原本以「纪实」为绝对主流，现在开始出现「抽象」与「荒诞」的风格（张献民，2012 年 4 月 13 日）。影响中国独立电影的力量，逐渐从国际电影节上，转移至中国国内的民间影展。

〈表一〉整理了 2003 年以来较有代表性的影子，显示独立影像展的发展趋势：首先是地域上的扩散，从传统电影人发源地北京，扩散到南京、大连、西安和杭州等二线城市；其次，各地影展的分工与特色都相对明确；第三，除了北京的策展人依旧坚持和官方「死磕」以外，不少影展懂得和官方巧妙周旋，地方政府的文化扩张需求同样也是促进影展发展的一股力量。

表一：中国民间较具代表性的独立影展列表（2003-2012）

城市	成立时间	影展名称	领军人	影展介绍
南京	2003	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	曹恺 张献民	纪录片与剧情片都有，影响力较大，操作方式比较温和，与南京大学有合作。2012年被“因故延期”，2013年恢复。
北京	2003	中国纪录片交流周	朱日坤	由宋庄美术馆、现象工作室主办，纪录片为主，也注重学术交流的研讨会。
大理	2003	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张献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支持，国内创办最早的公益性纪录电影双年展，活动包括展映、竞赛与研讨。2013年被“暂停举办”。
北京	2006	北京独立电影展	栗宪庭	栗宪庭电影基金主办，影片包涵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实验片等。无任何官方背景，与政府对抗强硬。2012年遭遇拉闸停电，2014年组织者宣称被责令停办。
重庆	2007	重庆民间映画交流展	郑正（四川师范大学电影学教师）	注重重庆本土特色和平民化，有向大众募集资金的「联合制片人计划」。
杭州	2009	杭州亚洲青年影展	浙江大学	已经教育部批准，面向全亚洲的青年导演，以短片为主。
西安	2012	西安亚洲民间影像年度展	陕西文化投资控股集团	面向亚洲，参与地区包括韩国、伊朗、台湾等，由当地政府牵线完成。但在2013年开始被更上级的单位命令停办。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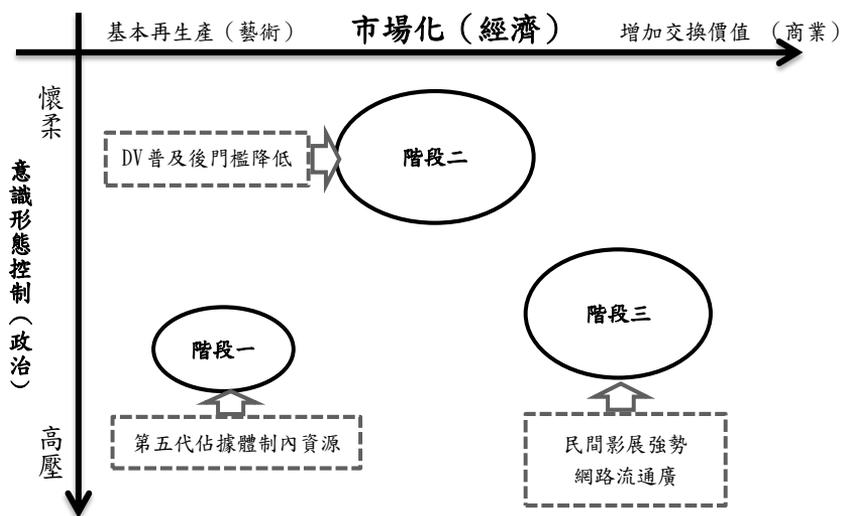
除了影展，中国境内也开始出现一些独立电影提供资金和人才支援的机构。其中大多支持纪录片，而支持独立剧情片的则集中在两家公司。一是由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主持的天画画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实行签约导演

制度，有对新导演的发掘、支持、培养、推广体系，同时举办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和 ISAAS（艺术空间独立放映联盟）和「齐放」（独立电影民间放映联盟）等活动。另一家公司则是贾樟柯导演与其多年搭档周强、余力为在 2006 年创立的「星河星汇」，同样从事投资与制作新导演电影。2013 年的第 37 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中，中国大陆部分入围新片不足二十部，几乎被这两家公司「垄断」，前者入围了四部影片，后者则有六部。可以说，独立电影场域中曾经由电影人单打独斗创国际的惯有模式已经慢慢转向为由国内民间独立影展策展人制定游戏规则的新模式。

四、小结

中国独立电影场域所面临的外部条件可以分为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互相牵制也互相影响。如图二所示，中国独立电影诞生之初，经济发展为电影创作者的独立制片提供了经济基础，保守政治力量断绝了新创作者进入体制内制作电影的可能，国际影展却将他们带入海外的艺术电影流通市场，中国独立电影场域在这种推拉之下产生。2000 年之后，随着电影市场化的加深，全球化对中国电影的侵蚀，以及早期独立电影人象征资本的巩固，对电影控管的政治力量由高压走向怀柔，部分独立电影开始融入国内市场，而 DV 等新技术的推动令独立电影场域呈现扩大化趋势。2007 年左右，在民间影展等文化中介机构以及网路传播的带动下，独立电影壮大，但也触发了政治力量的反扑，独立电影向商业化倾斜，独立剧情片数量开始减少，内容与风格则增添了更多实验影像、网路幽默、荒诞悬疑等元素。

图二：1990-2013 中国独立电影的外部条件变迁



肆、创作者的位置分析

一、《壹周刊》定位：偏重私领域软新闻的「周报式小报」

文化生产场域中，创作者们依靠文学艺术作品、政治行为、宣言以及互相之间的争辩（polemics），以获得足够资本（即他人公认），从而在场域中占据有利位置（Bourdieu, 1993）。因此他们之间是相互竞争的（Webb, Schirato, & Danaher, 2002）。竞争方式的选择，即位置占据的策略，创作者则会根据自己的现有资本和倾向，判断位置和可能性空间与作品和自身的相符程度来选择。作品是斗争策略和创作者倾向结合下的产物，因此一部电影的形成不应全盘归结于创作者本身，也不能简单断定社会变迁就催生了某一类电影，创作者们被认可的权威是来自文化生产场域的内部逻辑与结构。在

上文对独立电影分期的基础上，本文选择了每个时期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位创作者，从他们的成长背景、创作条件、影片内容与风格与电影生涯发展等方面，了解创作者如何根据场域条件与限制，制定策略完成自己的位置占据。

一、王小帅

王小帅出生在文革时期（1966 年），父母是下乡知识青年。王从小学习西方美术，1985 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身上有着挥之不去的精英色彩。1989 年毕业时王小帅因期待能在小厂中获得像张艺谋在西安电影厂中一样的优待，选择被分配到规模很小的福建电影制片厂（王小鲁，2012 年 2 月 1 日），但 3 年都没有获得拍片机会。焦心的王小帅 1992 年回到北京，选择自己筹钱、借机器拍片。

当时他的经济资本与象征资本一穷二白，仅能倚靠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和北京电影学院的微量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王小帅向电影学院转战经商的同学处借来几万块人民币，租来摄影机，胶片厂赞助了 35mm 乐凯黑白正负片，另请同学喻红与刘小东夫妇出演自己的故事；其他工作人员也都是自己的同学（程青松、黄鸥，2010）。影片完成后，王小帅在西方策展人 Tony Rayns 与香港影评人舒琪的帮助下，将影片送到国外几个电影节中，最后获得许多奖项，以及足以回收成本的奖金。而回到国内，本想向领导邀功的王小帅却被「禁映」。当时，这种藉由国际影展获取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与象征资本，再转化为下一部影片所需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实践方式，也成为早期中国独立电影唯一的出路。

有着艺术家敏感的王小帅，很注重将这种对人物内心的洞察，放到电影中成为自己的特色，这是他用以区别于同时代其他影片的标签。这种缓慢而克制，从王小帅从开拍电影至今，几乎没有太大变化。

电影里不能说自己，要么娱乐观众，要么得说工农兵的事。但我觉得所有人都不能正视自己，反而是创作理念上的一个大漏洞，不看自己的内心，便不能把自己的内心在作品中相应地投射（李东然，2012 年 4 月 23 日）。

随着王小帅扬名国际名声的壮大，以及国内电影市场的改革，他开始受邀进入体制内工作，所拍影片开始上映，甚至得到过影视集团大量投资，但王小帅坚持不在影片中添加大量商业元素，视角与格局也多从导演个人内心出发，因而票房未有起色，他所吸引的电影投资也很不稳定，即使在中国电影投资市场开始膨胀的近几年，王小帅依旧只能依靠自己的资产抵押筹措，算是早期独立电影人少数将「独立」色彩坚持至今的导演。对王小帅影响较大的力量也从早期的政治打压，转化为市场困境。

二、贾樟柯

贾樟柯是中国独立电影场域第一阶段后期的代表人物，也是独立电影导演中最成功的一位。受到王小帅等学长的影响，贾樟柯从学生短片就开始了独立制片与积极出国参展，第一部【小武】影片就获得了香港胡同制作公司30万人民币投资。【小武】在国际上大获成功后，贾樟柯又与日本导演北野武新成立的公司合作，在山西拍摄了【月台】与【任逍遥】，完成了自己的故乡三部曲。

2003年，贾樟柯被国家电影局正式恢复导演身份，并在上海制片厂的支持下，以1200万元人民币拍摄了自己第一部地上化影片【世界】。此后，贾樟柯的电影开始得以在国内上映，但票房甚微，他的收入仍旧来自国际版权销售。2006年，贾樟柯和长期搭档的制片人周强、摄影师余力为创办电影制作公司「西河星汇」，2012年6月再与一家投资公司共同创办电影投资公司「意汇传媒」。同时，贾樟柯在2010年开始旨在助推新导演成长的「添翼计画」，自己投资并监制「计画」中影片，其中【Hello! 树先生】（韩杰，2011），【记忆望着我】（宋方，2012）、【陌生】（权聆，2013）等影片都得到了国际影展的肯定。

贾樟柯早期作品【小武】是其故乡三部曲的代表作。从风格上看，影片的纪实性、长镜头与流行音乐，都是贾樟柯最出名的个人标记；从主题上看，【小武】主要记录下乡镇青年经历中国的社会转型时的迷茫与挣扎，也就是

环境的变化及其所带来的人际关系变化，当时中国电影中从未有人提及。2004 年进入体制后，贾樟柯推出【世界】，关注对象从家乡山西变成了首都北京，影片制作上则加入了宽银幕、电子风格的配乐、Flash 动画、大篇幅的歌舞等商业元素。2006 年的【三峡好人】以拆迁建大坝的动荡三峡作为题材，体现了贾樟柯的电影技巧与个人标签，并在记录中国社会变迁的同时，以几个超现实主义的镜头，为独立电影中绝对主流的纪实性，带入了一丝荒诞意味。2013 年的新作【天注定】，则以「现代武侠片」的类型片定义，包装了 4 个充满暴力的现实社会案件，并在叙事技巧上更加直接。

在主旋律与艺术片都产生了商业导向的 90 年代后期，贾樟柯的策略就是反其道而行，先不管国内市场，以国外艺术电影市场为各项资金来源以及放映发行的主要地区，以「纪实性」突出电影在美学与社会意义上的价值，不仅与主流影片之间形成对立，与第五代艺术片之间拉开距离，同时也在王小帅等人的「自我观照」式影像之上，融入更多的社会记录与关怀。解禁之后，贾樟柯已在国外电影节累积了不少象征资本与经济资本，策略也有相应调整，既依靠体制内的电影厂投资，让影片顺利登陆国内大银幕，也依靠更为成熟的组织化投资方式，以艺术片形式在国外稳定地赚钱。这种策略之下，贾樟柯的关注面开始从自己的家乡离开，转而投向整个中国的社会变迁，既符合国际观众对中国社会变迁记录的期待，也能够完成王小帅在第五代导演之后「大师级」的定位。2007 年之后，贾樟柯逐渐获得国际级导演的地位，他开始在影片内容与风格上出现变化，不断往更加商业化方向调整，例如暴力十足的【天注定】，他的商业策略是以自己的投资公司吸引国内外资金，通过培养新的独立导演，开拓电影版图。

总结贾樟柯的电影实践，或许可以说，相对于同时其进入独立电影场域的王小帅，贾樟柯似乎更能够在外在条件和自身创作理念之间找到位置平衡以及生存策略。

三、李杨

迈入 2000 年之后，来自不同背景、性别的创作者纷纷加入了独立电影大军。留学归国的电影人李杨就极有代表性，1959 年出生的他在文革中痛失父亲，又 1980 年代末期的“出国热”中赴德国留学，在年龄、背景与创作理念上都与当时主流的年轻创作者不同。

第一部影片开拍前的李杨，经济上的处境比王小帅等毕业生好些，但他的电影并没有制作公司投资，全部靠自己筹钱拍摄。影片完成后，不知道中国电影还有审查环节的李杨，直接将它送到了国外参加影展，终获得三十多个国际奖项，同时通过美国公司行销推广，以西方艺术片的市场作业方式获得了投资回报。而第一部影片的违规操作，让李杨一度成为禁止在中国拍摄的导演。2007 年他的第二部影片【盲山】积极送审，最后得以上映。

至 2014 年，李杨仅推出了【盲井】与【盲山】两部剧情长片，题材与风格相似，都以纪实美学手法强调完全真实的生活质感，同时又讲述了极富戏剧冲突的故事，在节奏中凸显强烈的压迫性。相较于电影的艺术性，李杨的策略更注重社会批判，这来自于他在经历文革中家庭惨剧后，对社会改造萌生了强烈使命感；同时，他十多年来对欧洲电影文化中的浸染，以及青年时代长期的戏剧训练，对他的电影理念也有强烈的深化作用。

当时，中国的独立电影主要靠海外发迹，有些年轻人为了在国外获奖，喜欢模仿已成名独立导演，以故作沉闷的镜头语言凸显作品的叛逆性，而李杨的电影从头到尾就是老老实实地讲了一个故事，情节流畅、高潮迭起，以粗砺现实打动人心。可以说，相对于更贴近青年文化的王小帅、贾樟柯等人，李杨在电影创作理念中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他的位置占据策略是用充满戏剧性的叙事手法揭露社会底层最为黑暗的现实，达到社会批判的目的。在电影推广上，他则一直依赖海外所累积的社会资本与象征资本，尽管能够在国内上映，但他与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仍然疏远，而经济资本的累积依然十分有限。

四、刘伽茵

1981 年出生的刘伽茵是女性、年轻、艺术至上与边缘化的重要代表。她

在北京一个皮具手工业者家庭长大，经济拮据的父母坚持无条件支持女儿的电影梦，这为刘伽茵带来了深深的感动与勇气，也影响了她的作品倾向。

刘伽茵的第一部剧情长片是她的毕业作品【牛皮】（2004年），影片的投资只靠刘伽茵自己写剧本挣来的钱；制作上，整部影片只有刘伽茵自己一个工作人员，拍摄的机器就用刘伽茵自己买的 SONY-PD150，录音设备是从学校租来的，而影片的演员则是刘伽茵的父母与她自己，演出内容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然而，【牛皮】并非纪录片，而是一部计算精良的剧情片。全片只有 23 个固定镜头，时长 110 分钟，所有故事就是刘伽茵家中的日常生活片段，常常呈现为历时非常久的空镜头，没有任何戏剧性的冲突，如同观看家庭监控摄像一般。

【牛皮】完成后，刘伽茵以它申请了国际电影节，并获得了第 55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单元费比西奖等多个国际奖项，在温哥华获得了 5000 元的奖金，发行商也纷纷前来找到刘伽茵，甚至也有人主动想要投资她的电影。但刘伽茵只说「我也不需要那么多钱拍电影，我花不了。」（刘伽茵，2005；引自第一财经日报，2005 年 3 月 16 日）

拍电影有两种，一种是你看别人、看社会，还有一种是反过来看自己。绝大多数创作都是向外看，这也跟电影创作的力量表达有关，很多人认为电影的力量在外面，但是对我来说，我是向内的，先看自己，再从自己往外看。（刘伽茵，2009）

刘伽茵在中国独立电影场域中占据了一个极其显著而特殊的位置，在大多数多少带有社会与个人反思意味的独立电影中，她以完全个人制作为策略，不靠任何人协助，以当下生活记录为题材，精密计算拍摄过程，最后用极其低廉的成本完成拍摄，生成带有实验风格、形式极简、内容个人化的作品，再送往国际电影节，寻求海外发行放映，逐渐累积经济与象征资本。刘伽茵的资本累积形式与大多数独立创作者相同，必须依靠国际影展令电影获得曝光；但她的影像风格却并没有模仿前期在国际影展上获得成功的作品，将关照向外面对社会，而是回过头来向内审视，以最自身家庭作为题材。由

于反其道，她在场域中很快占据了艺术价值很高的位置。

五、郝杰

2007年之后，网络成为独立电影流通的主要方式，民间独立影展开始拥有更强的话语权，而市场对小成本影片的青睐，也让新晋独立电影有了更多的商业色彩。这个时期开始拍片的郝杰，就主要依靠网络与民间投资发展起来。

不同于许多在城市长大的八零后独立电影人，1981年出生的郝杰成长于河北张家口附近的农村，在河北大学学习美术专业，对电影的学习主要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旁听」。毕业后他做过四年多的影视编导，直到与领导理念不同而被开除后，才开始拍自己的电影（吕美静，2011年12月11日）。

为了给第一部影片【光棍儿】顺利注资，郝杰的投资人促成了中国独立电影最重要的制作公司之一「天画画天」的成立。郝杰以自己的团队独立拍摄，演员多是本色演出的农民，影片获得多个国际电影节的奖项，没有申请上映，却红遍了中国的网络。郝杰的第二部影片【美姐】因此获得一家文化投资公司的150万元投入，同时拥有了专业的制片人。但习惯于商业电影的制片方从拍摄时间、成本分配到海报营销都与郝杰产生巨大分歧。最后，影片得以上映，但票房惨淡，反而是海外的发行更加顺利。

郝杰的电影坚持将镜头对准他生长的农村，用幽默的语言、真实甚至带有裸露的画面来描绘农村中大胆的男女关系。但在影片风格上，郝杰用了更多花哨的元素，而非上个时期独立电影一贯的写实风格。

我就是草根为了拍电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然后我认为我的片子是可以又好看，又有一些所谓的艺术价值的，比如说我觉得如果是【光棍儿】上院线的话，你觉得会没有票房吗？（郝杰，2013；引自凤凰网，2013）

郝杰的策略是在国内寻求投资，以网络传播累积象征资本，依靠国内民间独立影展的社会资本，创作少有人关注的农村题材，并以喜剧方式赢得更

广市场。相较于其他单打独斗的新晋独立电影人，郝杰很成功地倚靠逐渐掌握了此时独立电影场域话语权的张献民等策展人，在资金与宣传、发行上具有较大优势，他抓住了敏感题材中最没有政治威胁却能够吸引观众的「性」，以及独立电影中少有人顾及的「农村」议题，既能够完成独立电影边缘性的标榜，也有利于这个时代的网路传播，因此他在近来独立电影场域中，处于各方面资源都利用得较好的优势位置。

六、张内咸

同时期的张内咸走的也是单干路线，但他没有依靠成熟的独立电影机构协助，而是自己集资，坚持在网路上公开发布，始终游离于场域内核心人物，这也是该时期极具代表性的做法。

1986 年出生的张内咸是在都市长大的典型八零后叛逆青年，大学时因感到教育体制的禁锢而辍学，在社会混迹一年后重考到中国传媒大学。张内咸的作品都是 DV 创作，第一部影片【待业青年】是大学里的作业，靠同学协作完成，第二、三部影片都来自朋友的资助，独立完成。影片完成后，他并没有发行或送上院线的企图，而多以网路传播。其中，作为学生作品的【待业青年】被放在网络上自由观看，引发了大规模关注讨论与媒体传播。第二部影片开始，他加大了网络宣传力度，开始采用诸如「AV」等词汇吸引眼球，与商业视频网站洽谈网络授权，同时参与了全国不同组织的线下放映会，以此收回成本。

【待业青年】以半记录半剧情的方式，透过对辍学青年的采访探讨教育体制与青年的迷茫。第二部影片【草莓百分百】改编自日本漫画，同样在剧情片中加入了人物采访，刻苦年轻人的妄想和躁动（张内咸，2011；引自中国青年观察，2011 年 8 月 11 日）。第三部影片【那些五脊六兽的日子】则充满了一种来自北京地下文化的浓厚痞气，画面色彩鲜艳，人物造型夸张，显得奇幻而荒诞，批判讽刺的同时又跌宕起伏。

过去很多人拍纪录片是把镜头对准边缘人物，通过边缘人物找出与普通人身上不同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去边缘人物身上找到一些跟普通人相同的地方，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张内咸，2011；引自中国青年观察，2011年8月11日）

不同于主流独立创作者，张内咸没有电影学院的社会资本，也没有影展加持的象征资本，难以获得国内外资金，主要靠北京地缘的社会资本进行创作，处于独立电影场域中较为边缘的位置。

七、小结

以上六种创作轨迹，是整个中国独立电影场域发展的缩影，体现了场域条件变化下不同位置的创作者在策略制定上的不同选择。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中国独立电影场域中存在的几种重要实践模式进行总结（图三）。需强调的是，本文列出的是已存在的实践模式，但每个创作者的策略与位置都会因环境变化而随着自身的资本与位置在不停改变，因此上述六位创作者亦难以被固定为某一种模式的实践者。

图三：中国独立电影实践模式



积极拓展型的创作者在场域中占据主流，他们电影当作第一职业，即使

只能靠自筹资金、独立制片，甚至不能在国内上映，他们依然积极寻求各方面资源，在各种面向上推广电影，为自己累积资本，以成为某种类型上具有影响力的大导演为主要目标。这类创作者中，贾樟柯、娄烨等导演走的是「国际合制」路线，将作品的发行主要放在国际上，由国外制片人 or 电影公司推广，或者联合制片的方式将影片风险分摊到多家制作公司中，保障电影的艺术性和资金来源，同时在国内舆论中占据高点。而张元等另一部分创作者，则选择在成名后回到体制内拍片，获得国家稳定的资金来源和上映保障，但牺牲影片内容的自主性，脱离了独立电影场域。上述两种路线必须成功积累大量社会资本与象征资本才能进行，但场域中大多数创作者必须先自筹资金或者向国内影视公司寻求投资，以个体户的方式进行电影实践，再送影片到国际电影节中寻求机会。这是大多独立导演的必经之路。

个人表达型的创作者大多有着导演之外的固定工作，以电影学院老师身份居多。他们透过独立拍摄影片，完成不同的表达欲望。以刘伽茵为代表的一部分创作者，走的是「纯艺术创作」路线，所拍摄的影片从题材、拍摄到推广，都完全处于个人意志，虽然也会到国际上参展，但没有明显的推广与增加收入的意图，只关心作品对自身的意义。而另一部分人，例如拍摄了诸多同性恋题材电影的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理论研究室副教授崔子恩，则更将电影创作当作一种「平权运动」，不论是纪录片或者实验电影，艺术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追求，「改变社会不平等现状的平权运动」（赵珂，2009年7月25日）才是更中心的创作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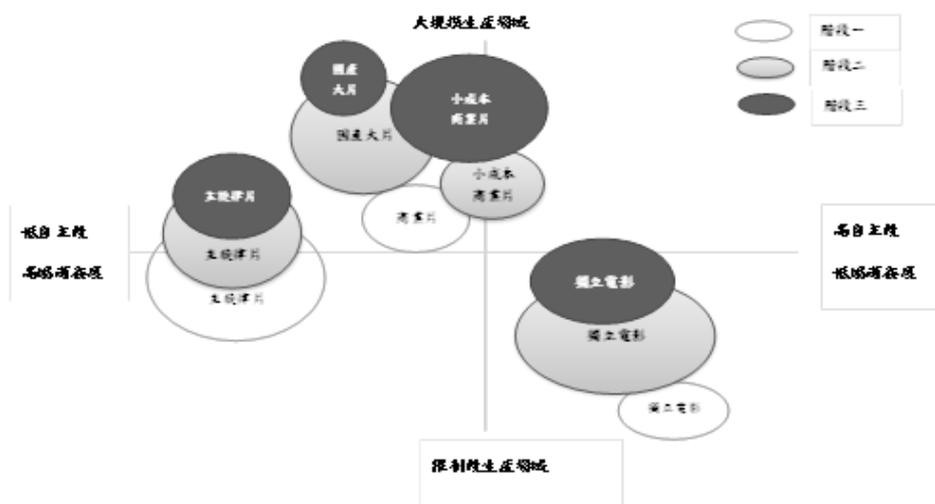
独立电影场域中还有一部分创作者属于**习作分享型**，他们大多属于影视相关专业学生，以及业余的 DV 创作者，位于场域边缘，却占据了很大数量。借助学校设备，靠家人朋友出资，在课余或业余进行创作，这些难以进入商业环节的作品大多依靠网络和民间独立影展传播，在获得较大关注之后才逐渐走向独立电影主流。

伍、结论

一、中国独立电影的另类与价值

经由本文的场域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出，中国独立电影的存在，并非是创作者英雄式的反抗，也不是单纯因国内政治、经济与全球化碰撞而催生，而是一种行动者的主观策略与客观场域条件之间的互动结果。在独立电影诞生之初，首批创作者刚刚走出校门，在电影市场未向民间资本开放时选择独立制片，同时以不同于国内「大叙事」的个人视角呈现影片内容，从而误打误撞地以「禁片」姿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各方面资本，有些人因此有了「刻意讨好西方观众」之嫌；在国家放宽了电影政策与政治压力之后，随着影像技术成本的下降，独立创作者的数量和背景多元化都得到了提升，独立电影呈现出绝对的写实主义以区别于当时流行的中国式商业大片，同时创作者能力和技术则难以保障影片的品质；而近几年来，政治压力回归，电影市场化加剧之下，独立电影数量下降，网络普及与民间影展改变了独立电影的流通方式和观众群体，话语权逐渐向民间影展策展人与知名独立导演转移，独立作品也开始出现更多的商业元素。

图四：中国独立电影与中国主流电影对比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电影的传统生产模式创造出两类主流电影：主旋律

片和商业片，之间界限已经模糊。独立创作者的主观选择既受到这两大权力的交替影响，其呈现则与这两种影片明晰那不同。1990 年代中，中国电影市场还十分弱小，主旋律片 / 商业片 / 艺术片三大类主流电影相对差异较大，商业片也大多属于小成本制作，艺术电影则更部分属于小成本商业片，部分因为被禁止而成为地下电影，而独立电影在内容上则属于更具青年气息的纪录片与文艺片。2000 年之后，主流电影出现较大转变，第五代导演在国际合制与国有电影厂集团化的驱使下，开始拍摄昂贵而缺乏内涵的商业片，主旋律片增加了商业元素以融入市场，一批年轻导演则以小成本商业片在主流电影中逐渐成长。此阶段的中国独立电影则以纪实性为主要创作倾向，以对应主流商业大片中的虚幻场景。2007 年之后，随着政治局势的重新严峻，以及中国电影市场的急速膨胀与商业资本招揽，中国独立电影场域出现了紧缩，并逐渐分化至小成本商业片中。此时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小成本商业片多走温情积极的路线，而相对的，独立电影则在纪实中出现了「荒诞」与「象征」的趋势。

这一批无法获得足够资源以进入主流电影场域的创作者，同时带着无法苟同于主流创作模式的倾向，于是走上独立制片的道路。当国家只允许电影厂拍片时，他们选择向西方获取资源以独立制片；当国家鼓励商业电影推广积极形象时，他们坚持写实主义；当国家在防范网络言论失去管控时，独立电影在国内已经从线上、线下聚集了渴望另类表达的观众群。因此，中国的独立电影对于国家意志授权下主流电影制作模式的突破，正是其独立性的体现。

当然，突破和妥协是并存的，独立电影场域中的不同位置也时刻在变化。独立电影与主流电影模式的拉锯，并非是一种好与坏的对立，更重要的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这种「可能」，可以是「补充」、「改造」或者「颠覆」，主要取决于独立电影场域与其所在权力场域之间的互动与发展。而这种对立，即独立姿态对电影传统生产结构的突破，已为中国电影已然僵化的现状，带来不同面向上的提升。参与者数量大、平民化趋势明显的独立电影，对于长期被主旋律影片与商业片统治的中国电影来说，无疑是打开了一个缺口，一方面从人才储备上为理想中不再由官方控制、精英主导的中国电影注入活

力，另一方面也从观众基础实现了「以民间吸引民间」的扩散，让整个电影工业的僵化从最核心的观众问题上得到一定突破。同时，尽管不一定都优秀，但独立电影文本所呈现出的活力，也是大多数主流电影难以企及的。而独立电影的发展壮大，同样能够带动电影体制或者商业模式的改革。

二、可能性的建议

建议虽非本研究直接得出的研究发现，但与问题意识的初衷相关，探讨如后。

在制度上，官方应该取消主观性过强又十分僵化的「电影审查制度」，改为「电影分级制度」，根据影片之内容来规定和划分适合观赏的年龄段，既能够保护特殊人群，也保障创作者的自由度、影片题材的多元化以及观众的选择权。在制作上，独立电影应该建立更加完善的制作体系，以更加成熟的制片人模式，将融资、影展推广、影片发行环节串联起来。在放映上，配合上述独立电影制作体系，推行独立或艺术院线则成为当务之急。

但独立电影创作者更应回归自身努力，改变观众选择，辅佐以更加专业而有针对性的宣传方式，在大学、地下摇滚酒吧、艺术电影网站等目标群体容易集中的地方铺设宣传，而在放映上则不要枉走大院线的烧钱路线，而应更灵活地利用网路收费观看、小规模放映场合等平台，尽可能挖掘那些有观影热情却一时难以触及的群体。另一层面上，独立电影人与其花时间与广电总局或投资人交涉，不如团结起来相互扶植，以资源互补的方式先将独立电影的声势壮大，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创立联盟，除了目前以观影和创作为主的民间影展外，更应该结合力量向国家机器与大投资商施加压力才能拥有更多改造制度的筹码。

参考书目

王小鲁（2012年2月1日）。〈张元对话王小帅：中国独立电影二十年〉，《经济观察报》。上网日期：2013年12月30日，取自：

- <http://cul.sohu.com/20120201/n333368464.shtml>
王小鲁(2010年6月25日)。〈实践社往事〉,《经济观察报》。上网日期:2013年12月30日,取自:<http://www.eeo.com.cn/2010/0625/173872.shtml>
- 井延凤(2010)。〈资本逻辑和市场逻辑的逐步确立——谈2000年以来的中国电影〉,《电影文学》,003:8-9。
- 中国青年观察(2011年8月11日)。〈导演张内咸:再过三十多年还会想拍电影〉。上网日期:2013年12月30日,取自:
http://www.openyouthology.com/Youth_Watch_List_In.aspx?id=162
- 毛羽(2002)。〈中国电影业的体制改革与发展趋势〉。
上网日期:2013年12月30日,取自:
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2-01/25/content_5101139.htm
- 尹鸿(2001)。〈世纪之交:90年代中国电影备忘〉,《当代电影》,2011(1):23-32。
- 石川(2003)。〈代群命名与代群语码〉,《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0(2):32-35。
- 白睿文(2008)。《乡关何处: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白瀛、周玮(2013年11月29日)。〈2013年全国电影票房逼近200亿〉。上网日期:2013年11月30日,取自: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11/29/c_118357411.htm。
- 李正光(2009)。〈回顾:第六代导演与两次「七君子事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9(3):156-161。
- 李东然(2012年4月23日)。〈专访导演王小帅〉,《三联生活周刊》。上网日期:2013年12月30日,取自:<http://www.lifeweek.com.cn/2012/0423/36970.shtml>
- 吕美静(2011年12月11日),〈【光棍儿】导演郝杰:解密底层农民性苦闷〉。
上网日期:2013年1月6日,取自凤凰网:
http://culture.ifeng.com/renwu/special/haojie/haojie/detail_2011_12/11/11248928_0.shtml
- 马然(2009)。〈转变中的中国「都市一代」电影:全球时代中国「电影节电影」的文化面向〉,《上海大学学报》,16(4):114-135
- 高力(2003)。〈漂泊与皈依「第六代」的主题变奏〉,陈犀禾、石川(编),《多元语境中的新生代电影》,页271-284。北京:学林出版社。
- 陈旭光(2002)。〈不断重临的起点——论「五代后新生代导演」的现实境况〉,「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第二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中国上海。
- 孙绍谊(2004)。〈寻找消隐的另一半:【苏州河】、【月蚀】和中国第六代导演〉。《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88-92。
- 现象工作室(2010年5月31日):《从独立电影人到观众:2009年度中国独立电影年度报告》。上网日期:2013年12月30日,取自: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5121102.html>
- 第一财经日报(2005年3月16日)。〈人物:刘伽茵-编导【牛皮】〉。上网日期:2013年12月30日,取自:http://www.bfa.edu.cn/news/2005-03/16/content_9778.htm

中国独立电影创作的场域分析，1990-2013

- 张英进（2004）。〈神话背后：国际电影节与中国电影〉。上网日期：2013年12月30日，取自：<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383>
- 张献民（2012年4月13日）。〈独立电影十年〉。上网日期：2013年12月30日，取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b3e2a01011qev.html
- 张献民（2013年5月16日）。〈中国独立影像「强拆年」〉，《纽约时报中文网》。上网日期：2013年12月30日，取自：
<http://cn.nytimes.com/film-tv/20130516/cc16filmfestival/>
- 彭侃（2010）。《关于当代中国独立电影的话语分析：一个初步的东西比较》。香港：香港浸会大学林思齐东西学术交流研究所。
- 彭侃（2011）。〈西方研究视野中的中国独立电影：回顾与反思〉，《现代中文学刊》2011(1): 42-51。
- 黄式宪（2003）。〈第六代：来自边缘的「潮汛年」〉，陈犀禾、石川（编），《多元语境中的新生代电影》，页23-39。北京：学林出版社。
- 程青松、黄鸥（2010）。《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先锋电影人档案（生在1960—1970）》。山东：山东画报出版社。
- 杨忠贵（2008）。〈低成本电影生产的市场化运作〉。《视听纵横》，2008(004): 101-103。
- 赵珂（2009年7月25日）。〈崔子恩：中国的同性恋电影还处于自发期〉。上网日期：2013年12月30日，取自：<http://www.fridae.asia/tc/gay-news/2009/07/25/8694>
- 赵宁宇（1995）。〈第六代：一次文化预谋〉，《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5(1): 150-152。
- 凤凰网（2013）。〈倾家荡产去拍电影，没人拦得住——独家对话【光棍儿】导演郝杰〉。上网日期：2013年12月30日，取自：
<http://ent.ifeng.com/movie/duihua/dianyingduihuahaojie/>
- 郑洞天（2003）。〈「第六代」电影的文化意义〉，陈犀禾、石川（编），《多元语境中的新生代电影》，页40-48。北京：学林出版社。
- 郑洁（2003）。〈从个人化走向市场化的新生代电影〉，陈犀禾、石川（编），《多元语境中的新生代电影》，页374-381。北京：学林出版社。
- 翟建农（2000）。〈第六代导演应该多洗澡〉，《大众电影》，2000(5): 7。
- 刘伽茵（2005）。〈关于【牛皮】〉，《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5(2): 85-88。
- 戴锦华（1996）。〈雾中风景：初读「第六代」〉，《天涯》，1996(1): 90-100。
- 韩小磊（1995）。〈对第五代的文化突围后五代的个人电影现象〉，陈犀禾、石川（编），《多元语境中的新生代电影》，页112-126。北京：学林出版社。
- 罗晓南（1996）。《当代中国文化转型与认同》。台北：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 Braester, Y. (2007). Tracing the city's Scars: Demolition and the limits of the documentary impulse in the new urban cinema. In Z. Zhang (Eds.), *The urban generation: Chinese cinema and society at the turn of the 21st century* (pp. 161-180).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1993). *The field of culture produc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 Brunow, D. (2012). Before youtube and indy media: Cultural memory and the archive of video collectives in Germany in the 1970s and 1980s. *Studies in European Cinema*,

- 8(3), 171-181.
- Dixon, W. W. (1986). *Producers releasing corporation: A comprehensive filmography and history*.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Company.
- Lash, S. (1993). Pierre Bourdieu: Cultural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C. Calhoun, E. LiPuma & M. Postone (eds.), *Bourdieu: Critical perspective* (pp.193-211). Cambridge, UK: Polity.
- Levy, E. (1999). *Cinema of outsiders: The rise of American independent film*. New York, NY: NYU Press.
- Lin, X. (2002). New Chinese cinema of the “sixth generation”: A distant cry of forsaken children. *Third text*, 16(3), 261-284.
- Lin, X. (2010). *Children of Marx and Coca-Cola: Chinese avant-garde art and independent cinema*.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Lu, S. H. (2007). Tear down the city: reconstructing urban spac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pular cinema and avant-garde art. In Z. Zhang (Eds.), *The urban generation: Chinese cinema and socie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173-179).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Lu, T. (2007). *Confronting modernity in the cinemas of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London,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ing, G., Molloy, C., & Tzioumakis, Y. (2012). *American independent cinema: Indie, Indiewood and beyond*. London, UK: Routledge.
- Nichols, B. (1994). Discovering form, inferring meaning: New cinemas and the film festival circuit. *Film Quarterly*, 47(3), 16-30.
- Park, N. (2009). The three faces of people’s cinema: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South Korean independent cinema movement in the 1980s. *Acta Koreana*, 12(2), 21-53.
- Pickowicz, P. G. (2006). Social and political dynamics of underground filmmaking in China. In P. Pickowicz & Y. Zhang (Eds.), *From underground to independent: alternative film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pp.1-22). Washington, DC: Rowman & Littlefield Pub Inc.
- Plotkin, J. (2013). *Filmmakers, Independent, European*. Jewish Women's Archive. From <http://jwa.org/encyclopedia/article/filmmakers-independent-european>
- Rayns, T. (1996). Provoking desire. *Sight and Sound*, July, 26-29.
- Tzioumakis, Y. (2006). *American independent cinema: An introduction*. Edinburgh, UK: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Webb, J., Schirato, T., & Danaher, G. (2002). *Understanding Bourdieu*. London, UK: Sage.
- Zhang, Y. (2006). My Camera doesn’t lie? Truth, subjectivity, and audience in Chinese independent film and video. In P. Pickowicz & Y. Zhang (Eds.), *From underground to independent: Alternative film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pp. 23-45). Washington, DC: Rowman & Littlefield.
- Zhang, Y. (2007). Rebel without a cause? China’s new urban generation and postsocialist filmmaking. In Z. Zhang (Eds.), *The urban generation: Chinese cinema and socie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49-81).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Zhang, Z. (Ed.)(2007). *The urban generation: Chinese cinema and socie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Independent Film Making in China, 1990-2013:

A field analysis

Hai-Tang Qiu*

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changing patterns of Independent Film Making in China between 1990 and 2013. As China has followed a state capitalism model, her market economy is imbued with conservative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consequence, alternative film-makers have so far taken three distinguishable practices. To begin with, in days when only in-house production was permitted and monopolized by the state studios, they solicited financial resources from overseas. As the state encourages independent movie production aiming at commercial gains, they instead opted for realism. In the latest, in spite of the state's tightening its grip upon the net, they have groomed on-line and off-line audience wishing to find alternative audio-visual expressions. It's concluded that, although these independent films run counter to the state ideology and imperatives of commercial entertainment, it's inappropriate should they be extolled to the status of heroic resistances. Rather, they are necessarily played out by agent's strategies and practical conditions existing in the field.

Keywords: alternative audience, field analysis, Independent Film Production, overseas resources, realism

* Hai-Tang Qiu graduated with a master's degree in the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e-mail: begoniakoo@163.com.

附录：中国独立电影不完全列表（1990-2013）

年份	电影名	导演
1990	妈妈	张元
1993	悬恋	何建军
1993	冬春的日子	王小帅
1993	周末情人	刘烨
1993	北京杂种	张元
1993	黄金鱼	邬迪
1994	头发乱了	管虎
1995	邮差	何建军
1995	远山	胡杰
1996	谜岸	于晓洋
1996	不羁的青春	龚力
1996	儿子	张元
1996	东宫西宫	张元
1996	巫山云雨	章明
1997	极度寒冷	王小帅
1997	长大成人	路学长
1998	扁担姑娘	王小帅
1999	小武	贾樟柯
1999	赵先生	吕乐
1999	男男女女	刘冰鉴
2000	苏州河	娄烨
2000	非常夏日	路学长
2000	东宫西宫	张元
2001	我们害怕	程裕苏

中国独立电影创作的场域分析，1990-2013

2001	动词变位	唐晓白
2001	十七岁的单车	王小帅
2001	秘语十七小时	章明
2001	海鲜	朱文
2002	任逍遥	贾樟柯
2002	陈默和美婷	刘浩
2002	山城记事	应亮
2002	哭泣的女人	刘冰鉴
2002	旅程	杨超
2002	安阳婴儿	王超
2002	我最中意的雪天	孟奇
2002	心·心	盛志民
2002	来了	胡小钉
2002	西施眼	管虎
2003	目的地，上海	程裕苏
2003	制服	刁亦男
2003	山清水秀	甘小二
2003	香火	宁浩
2003	二弟	王小帅
2003	回家看看	应亮
2003	唐诗	张律
2003	云的南方	朱文
2003	哎呀呀，去哺乳	崔子恩
2003	客村街	符新华（符号）
2003	山上	朱传明
2004	烧烤	耿军
2004	世界	贾樟柯

2004	盲井	李杨
2004	日日夜夜	王超
2004	陌生天堂	杨福东
2004	旅程	杨超
2004	好大一对羊	刘浩
2005	夜车	刁亦男
2005	好多大米	李红旗
2005	红颜	李玉
2005	牛皮	刘伽音
2005	武松打我	陆一铜
2005	季风中的马	宁才
2005	少年花草黄	崔子恩
2005	芒种	张律
2005	马背上的法庭	刘杰
2005	一路风尘	胡小钉
2005	葵花朵朵	王宝民
2006	举自尘土	甘小二
2006	赖小子	韩杰
2006	三峡好人	贾樟柯
2006	静静的嘛呢石	万玛才旦
2006	背鸭子的男孩	应亮
2006	今天的鱼怎么样?	郭小橧
2006	槟榔	杨恒
2006	北海怪兽	彭磊
2006	浮生	盛志民
2007	轨道	程裕苏
2007	我们的十年	贾樟柯
2007	盲山	李杨

中国独立电影创作的场域分析，1990-2013

2007	血蝉	彭韬
2007	寻找智美更登	万玛才旦
2007	街口	王晶
2007	金碧辉煌	翁首鸣
2007	鸟岛	吴明晓
2007	另一半	应亮
2007	下午狗叫	张跃东
2007	马乌甲	赵晔
2007	我如花似玉的儿子	崔子恩
2007	远离	卫轶
2007	熊猫奶糖	彭磊
2007	安子	雷小宝
2007	底下	刘浩
2007	生日快乐！安先生	睢安奇
2007	冬天的故事	朱传明
2007	关于赵小姐的二三事	王宝民
2008	重庆	张律
2008	青年	耿军
2008	大赖皮	何辉
2008	河上的爱情	贾樟柯
2008	二十四城记	贾樟柯
2008	黄金周	李红旗
2008	少年血	舒浩伦
2008	完美生活	唐晓白
2008	二冬	杨瑾
2008	好猫	应亮
2008	我爱湖人	应亮

2008	扎赉诺尔	赵晔
2008	黄瓜	周耀武
2008	盒饭	张弛
2008	姑妈在茶城	田爱民
2009	中国姑娘	郭小橹
2009	春风沉醉的夜晚	娄烨
2009	蝴蝶的颜色	应亮
2009	白蜻蜓	张涧赤
2009	光斑	杨恒
2009	牛皮 2	刘伽音
2009	八卦	符新华（符号）
2009	东北东北	邹鹏
2009	啄木鸟	郑毅
2009	小子不坏	张峰
2010	光棍儿	郝杰
2010	斗鸡人	金瑞
2010	寒假	李红旗
2010	麻局	李明航
2010	老那	刘浩
2010	碧罗雪山	刘杰
2010	镜中迷魂	若般
2010	黑白照片	舒浩伦
2010	红灯梦	司马优
2010	太阳总在左边	松太加
2010	老狗	万玛才旦

中国独立电影创作的场域分析，1990-2013

2010	早餐、午餐、晚餐	王晶（中国）、 Anocha Suwichakornpong （泰国）、Kaz cai （新加坡）
2010	大城喜事	王小明
2010	毛嗑儿	魏阿挺
2010	慰问	应亮
2010	寻欢作乐	赵大勇
2010	小东西	朱文
2010	王良的理想	高雄杰
2011	老虎	毕赣
2011	到阜阳六百里	邓勇星
2011	空山鞞	高子鹏
2011	-bing	黎明昕
2011	疾藜	李澄
2011	八宝粥	李栋
2011	花	娄烨
2011	欢欢	宋川
2011	天国	王超
2011	少年与刀	王姜永
2011	行歌坐月	吴娜
2011	花为眉	张凡夕
2011	草莓百分百	张内咸
2011	郎在对门唱山歌	章明
2011	嫦娥	邹鹏
2012	金刚经	毕赣
2012	杨梅洲	陈卓

2012	在期待之中	甘小二
2012	飞机	耿军
2012	夏洒往事	何瑞博
2012	鸡蛋和石头	黄骥
2012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	李睿珺
2012	浮城谜事	娄烨
2012	此处与彼处	茅毛
2012	万箭穿心	王竞
2012	一路向北	王小明
2012	倭寇的踪迹	徐皓峰
2012	牧牛童	荀伟平
2012	女导演	杨明明
2012	南风	郑阔 / 孙杨
2012	鮫·恋	郑智敏
2012	柔抚	朱程
2012	流氓	马翔
2013	那些五脊六兽的日子	张内咸
2013	田园将芜	王晓振
2013	唐皇游地府	李珺
2013	艾山	张金楠
2013	动物园	杨潇

韦依思想的当代意义： 一种对新自由主义的古希腊史诗精神反思

王贺白*

本文引用格式

王贺白（2015）。〈韦依思想的当代意义：一种对新自由主义的古希腊史诗精神反思〉。《传播、文化与政治》，2:99-135。

投稿日期：2014 年 10 月 26 日；通过日期：2015 年 6 月 20 日。

* 作者王贺白为长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e-mail: w1103@mail.cgu.edu.tw。

《摘要》

资本主义的资本统治与社会主义的官僚统治，在二十世纪末形成二合一的新自由主义，其所造成的民主被拍卖、生态恶化与贫富差距悬殊等问题，几成当前世界难以承受之重。本文透过韦依思想的古希腊史诗精神，重新审视文明基础，并尝试说明：如果解释世界的内容是封闭的，那么改变世界的结果，将只是官僚统治取代资本统治，一种压迫替代另一种。从古希腊、福音书到中世纪奥克文明，韦依认为其共同的史诗精神是，不相信逃避命运、不崇拜力量、不仇恨敌人以及不轻视不幸的人。生命后期的韦依，一直思考着人们如何战斗但人性依旧可以是纯朴的行动。战地护士培训计画以及起草义务宣言，正是在那黑暗时代里，韦依思想的亮光再现。如今在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时代，韦依思想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超自然真实的力量平衡。

关键词： 史诗精神、超自然真实、新自由主义

壹、省视当代文明基础的韦依思想

在韦依 (S. Weil)¹《扎根》(*The Need for Roots*) 英译本上, 诗人艾略特 (T. S. Eliot) 写了一篇序, 提及是否赞同韦依观点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与一个伟大灵魂相遇。艾略特同时感叹当代从事政治工作者的满口行话, 离韦依在书中所提的种种诉求愈来愈远。

不过, 一生只及三十四岁的韦依 (1909 年至 1943 年), 却在其生命后期两度提及, 希望后人关注她的思想而不是她的生平事迹。一是 1942 年写给贝兰神父的书简〈最后思想〉(Last Thoughts), 另一则是在 1943 年《伦敦手记》(*Fragments, London 1943*) 里的书信中。在 8 月 4 日的信里 (事实上也是她的最后遗言), 对于大家在乎她本人而不是她的思想深感遗憾。韦依希望大家探索「她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而不是她个人苦行僧般的事迹。而在前一个月的信里, 当她意识到来日不多时就开始挂念她那可能永远不会被理解的思考。当她说坚信自己拥有一个「能传给后人的纯金库」同时, 虽然奔走各地的「战地护士培训计画」一直未被采纳, 但她还是如此强悍地写下: 「我不会因此而有任何痛苦, 因为金矿本身是不会枯竭的」(Petrement, 1997

¹ 韦依是二十世纪法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神秘主义思想家。虽然其一生著述甚多, 但从未以本人之名发表, 因此其思想在台湾少为人知。但随着其著作的陆续整理出版, 声誉日隆。1909 年 2 月 3 日, 韦依生于法国巴黎, 五岁时就曾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士兵没有糖吃而拒绝吃糖。她于 1928 年考入高师, 1931 年取得哲学教师学衔, 随即被任命为勒浦伊市女子中学教师。在那里她明确表达对政府政策的不满, 向市政府公开表示对该市失业者的同情并以实际行动帮助他们。1933 年她决定告假一年, 希望能全面体验工人生活, 并在雷诺汽车厂找到一份工作。尽管她有严重的头痛病, 身体又虚弱, 但她绝不允许自己的生活条件与车间工人有任何不同。1936 年 8 月, 她前往西班牙内战中的巴塞隆纳, 与共和派军队一起对抗佛朗哥将军, 后来因为脚烫伤返回法国。1940 年 6 月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离开巴黎, 同年 10 月在马赛暂居。1941 年 6 月, 经朋友介绍, 她认识马赛修道院的神父贝兰 (Le. R. Perrin) 与梯篷 (G. Thibon)。之后韦依住在梯篷家里, 这期间参与农家体力劳动, 帮助收成庄稼与葡萄, 与此同时, 她研究古希腊思想与印度哲学, 并进一步体验神秘主义, 这些经历使她写下许多期待上帝的宗教文字。1942 年 6 月, 她离开法国抵达美国纽约, 11 月又转赴英国伦敦, 主要目的是希望能重回法国, 筹划执行其「战地护士培训计画」。后来她在伦敦被分派任务, 负责规划未来法国如何复员计划的要项之一, 为此她起草撰写, 人类应承担的「义务宣言」。由于韦依执意分担法国沦陷区人们所经受的磨难, 长时间地严格遵行食物配给以致严重营养不良。1943 年 4 月她健康恶化, 数月后与世长辞。

/ 王苏生、卢起译，2004，页 931)。本文尝试说明韦依自称「纯金库」的思想即是古希腊的史诗精神。并以此对 1980 年代开始席卷全世界的新自由主义，其所造成的民主被拍卖、生态环境恶化以及贫富差距悬殊等问题²，进行古希腊史诗精神的反思。

令人好奇的是韦依一生著作从未以本名发表。我们今天看到的文字，都是后人帮她编撰的。如此纯粹生命，韦依的传记作者佩特雷蒙特（S. Petrement）这么形容她，「没有任何人可以如此英勇地，将自己的行动与思想结合在一起」（Petrement, 1997 / 王苏生、卢起译，2004，页 2）。中译者杜小真，则引述马多勒（J. Madaule）的话说：「能够改变生活价值观的书是很少的，而韦依的书就属这类。在读了她的书之后，读者很难继续保持阅读前的状况」（顾嘉琛、杜小真译，1998，页 xxiii）。

在阅读韦依思想的过程中，这位两次世界大战时期活跃的女子，其与法国女性主义作家波娃（S. Beauvoir）早就交手对话过³；另外，1957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缪甚至在领奖之前，还特别到韦依居住过的巴黎旧址，驻足沈思以表敬意（Yourgrau, 2011 / 余东译，2014，页 2）。

一、反思马克思思想的韦依

1933 年 8 月韦依发表〈展望：我们正在走向无产阶级革命吗？〉（Prospects: Are we heading for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Weil, 1958/2001, pp.1-23），提

² 透过《绿色全球宣言》的整理分析，当前新自由主义所造成民主被拍卖、生态环境被破坏以及贫富差距的愈加扩大，作者伍汀（M. Woodin）与鲁卡斯（C. Lucas）提出「在地化」的替代政策。

³ 波娃在其回忆录中，提及她与这位小她一岁的韦依对话经历。一场大饥荒肆虐当时中国，波娃耳闻韦依得知消息后泪流满面，波娃为此仰慕着韦依关怀全世界的心。「有一天，我找到机会与她接近，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引起话题。她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宣称，当今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最重要：那就是一场使所有人都有饭吃的革命。我也断然的辩驳说：『问题不在于使人幸福，而是为人的生存寻找某种意义。』她以轻蔑的神情打量着我，说：『很清楚，你从未挨过饿。』我们的关系就此结束。我明白，她把我归到『小资产阶级精神贵族』那一类人当中去了」（Beauvoir, 1974, p. 239）。以上内容，也参考 1981 年出版的《西蒙·波娃回忆录——一位娴静淑女的自传》译本，第 230-231 页，这个中文翻译本，应该是最早提及韦依事迹的中文著作。

及因为官僚主义的缺陷致使工人运动受挫。自此，韦依对于政治历史的认知愈趋悲观，甚至持续到她生命结束。韦依始终把批判苏联官僚主义的文章，发表在极左派的工会刊物中，藉此避免让人觉得她与资产阶级站在同一立场批评苏联（事实上，自1918年到1922年，苏联一直面临严苛的内战，这也是其走向官僚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一封后来被找到的信件里，韦依提及史达林对俄国革命的背叛。「当列宁后退时，他会说我们在后退，而史达林永远只说前进。对工人撒谎永远是不能原谅的。」甚至韦依还曾与托洛斯基面对面讨论，问题环绕在目前俄国是否还是一个工人国家？韦依认为因为官僚问题，现在的俄国统治组织正在背叛工人。包括韦依等十四人签名的〈我们位于何处？〉（Where Are We?）其中直指「这个官僚主义……正在指引着苏联的方向，不是向着消除国家权力的方向前进，而且继续增加这个权力。……它建立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国家机器式的政体，……，从现在起，应当着手聚集一支有觉悟的、与俄国官僚政体断绝一切联系的革命者队伍」（Petrement, 1997 / 王苏生、卢起译，2004，页321、316）。⁴

为此，韦依回顾马克思思想，认为无论是当时或在那之后的马克思观点依旧是最好的理论。韦依认为马克思成功结合了「创建科学的努力与反抗压迫的斗争」，但创建这个学说的伟人在五十年前就过世了，他只能利用他的观点研究他身处的那个时代，而我们应当做的是，学习他的路径好好地理解当今新时代的新问题。如今新的挑战是，官僚统治取代了资本统治（史达林到美国还非常赞赏该国生产线的优越）。而核心问题是，「是否任意将一个国家的工人组织起来，那么这个组织就不会马上滋生依附于国家机器的官僚机构呢」（Weil, 1958/2001, pp.24-35）？

⁴ 本文引述韦依生平著作依据，主要是佩特雷蒙特在1973年完成的韦依传记，文中依据的法文原著是1997年的Fayard新编版；另外，法文翻译为英文的1976/1988年Schocken Books版是依据1973年版本，并且有许多删改与遗漏，如第八章直接并入第七章以及许多重要的韦依经历被省略；而本文参考的主要版本，则是法文直译中文的200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本，虽然还是有些许的意识形态的省略（如提及苏联领导人托洛斯基与列宁的部份依旧有未照原文），但整体来说，情形比英译本好很多。综合以上，所以关于韦依的许多重要生平与思想来源，在文后标注的是2004年中译本页码。而以上这一段内容，则是参考2004中译本的283, 377-378页。

在后来《伊利亚特》，或力量之诗》(The *Iliad*, Poem of Might) 及对希特勒主义起源的《对野蛮的思考》(Reflections on Barbarism) 里，韦依发现，真正决定历史进程的是力量，而非马克思所说的阶级。即使今日我们都能觉察，官僚与资本都会形成有力量组织，但人数占绝大比例的普罗大众却会因为人性弱点而流动弱化。普遍来说，底层人们只要一有机会都会想上升成为权贵，也因这个阶级的卑微特性，人多却往往势弱。此时韦依已经意识到政治领域的悲观，当她说着「如何组建一个不会产生官僚主义组织」时，她同时想着的是：政治的改变是微不足道的，只是一种压迫替代另一种。

《社会自由和压迫诸原因之反思》(Reflections Concerning the Causes of Liberty and Social Oppression) 是韦依工厂劳动前夕的「政治遗嘱」。尽管继续说着，工人的美德是应当把事情做好，社会科学主要应当用来探讨最少压迫的可能。其后在转向宗教的体会中，韦依提及《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第二十里的耶稣话语：「哪里有你们之中的两、三人以我的名义聚会在一起，我必在其中。」韦依若有所思地认为：「谁都知道，只有在三、两人之间才会有真正的贴心话。若是在六人或七人之间，那集体的话语就会开始占上风」(Weil, 1973/2009, p.35)。韦依以上的忧虑是针对教会组织。然而这样的组织是普遍存在于各个领域，包括各种团体与政党等。当更多人形成组织时，就会渐渐质变为韦依对官僚主义的批评，甚至说组织永远在背叛等重话。也许，对于组织的有效监督制衡，是目前人类可以想到的消极解决之道。

当韦依实际参与教育、政党、工会与教会等各组织时，与其说悲观地发现组织扩大的必然问题；倒不如说她在这些经历之后，反璞归真地回到其老师阿兰 (E. A. Chartier dit Alain) 所说的，应将重心放在具体问题的思考上。

二、韦依思想的时代意义

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及，财富集中少数人但绝大多数人却贫穷的资本主义运行法则，其彻底失衡终在 1929 年经济大恐慌全然呈现。两大后进资本主义国家德国与日本，分别在组织更完善的国家机器支撑下，面对此一困境寻找出路。德国先是加入欧洲多数国家的海外殖民，而希特勒崛起后，则

进一步想学习古罗马对欧洲的内部殖民；此外再加上日本在亚洲扩张的军国主义，终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一边是 1929 年遭遇挫败，全球资本主义开始寻求结合官僚的国家机器；而另一边则是，劳工运动在苏联的支持下，左派人民联合阵线在一些传统欧洲国家取得执政优势。1936 年的西班牙内战，即是这两边势力对抗的缩影。

1936 年 2 月的西班牙与 6 月的法国，左派都以人民阵线之名，经过选举取得执政权。在西班牙，经过五个月的僵持之后，右派佛朗哥将军在 7 月发动政变推翻民选左派政权导致内战。这场西班牙战争，可说是经济大恐慌的接续，同时也是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哨。苏联支持左派政权，法西斯主义当道的意大利与德国则支持佛朗哥，影响最后胜负的是法国与英国的态度。原本刚上台执政的法国社会党布鲁姆（L. Blum）首相决定援助西班牙左派政府，但遭到英国保守党政府的强烈反对而最后选择中立。

韦依对于布鲁姆避免法国卷入西班牙内战没有批评，她本人则在该年 8 月进入西班牙巴塞隆纳加入左派共和军，但不到两个月即因烫伤返回法国。然而当韦依得知共和军这边也进入战争的残忍状态时，她再一次提起关于官僚组织的问题。一场自发的起义变成有组织的战争时，革命就有可能被专制所取代。她甚至认为，如果佛朗哥没有取得胜利，那么西班牙有可能会变成另一个苏联。⁵

而后将近一年的布鲁姆执政，是韦依对单一国家理想主义的终结。在 1937 年 11 月〈工人的境遇〉（*The Worker's Condition*）里，韦依列举其调查报告指出：不同国家的工人状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与不平等。而那些工人状况得到改善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会处于劣势。据此，韦依认为当务之急是达成一个国际协定，让一个国家取得的社会进步也能在其他国家引起相应的变革，否则，即使在某些国家取得的初步改革，也将很难在世界范围内维系下去（Petrement, 1997 / 王苏生、卢起译，2004，页 592）。财政困难是布鲁

⁵ 1959 年帮助古巴完成革命的格瓦拉（E. Guevara），在后来进行行政推动时，同样感受并明言那巨大阻力即是官僚主义。1965 年在刚脱离法国殖民的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发表演说时，格瓦拉谴责社会主义集团（暗指当时苏联）是第二号帝国主义，也在掠夺他们自己的保护国（Garcia & Sola, 1997, p.152）。

姆政府下台的主因，当他想推行国有化与社会福利政策时，他没有办法阻止法国资本家将钱汇出法国，难以想象外逃的资金将近 600 亿法郎⁶。韦依的此份调查报告，对比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国际资金任意流动的当代世界，实有着先见之明。

另一个让韦依失望的发展是，即使是左派政府上台，法国对殖民地政策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为了确保捍卫阿尔及利亚人权益的「北非之星」哈吉（M. Hadj）不会被捕，韦依甚至去见布鲁姆并得到承诺。可是后来接任布鲁姆的左派政府还是逮捕了哈迪。这与稍早之前，甘地领导印度反抗英国，期待英国工党政府的殖民政策会与保守党不同而落空一样，感到强烈失望。韦依警告说，欧洲迟早要对殖民地人民苦难不闻不问付出代价，事实上，希特勒的下一步行动即是要对欧洲内部国家进行殖民。

正如 1934 年决定去工厂劳动的重大转折一样，1938 年之后韦依将主要心力放在被法国殖民的人民身上。事实上，早在 1931 年求学时在报章上读到鲁博（L. Roubaud）关于法国在越南的殖民作为时，她即无法接受法国民族主义的想法。甚至在勒浦伊教书时，无视校长阻挡执意要讲述法国的殖民暴行。而此刻的韦依认为，殖民地问题与维护欧洲和平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国人很可能因为他们对殖民地苦难的冷漠而遭到惩罚。她无法接受国人，对自己殖民地暴行（特别是阿尔及利亚与越南）的漠视，甚至认为欧洲未来是否能维系和平，实与殖民地政策息息相关。

唯一让韦依宽慰的是，欧洲目前面临的不幸，会有助于殖民地人民命运的改善。欧洲各国目前最能体会有可能遭到希特勒的内部殖民，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同理心下，理应展现与希特勒对外政策的不同，从而修正原本对

⁶ 历史似乎时常周期似地重演。1981 年法国社会党密特朗当选总统后，一开始执行其选民负托的重要产业国有化时，法国资金就开始严重外流。据统计，1981 年外流资金约 500 亿法郎，1982 年逃漏税约达 900 亿法郎，几乎等于法国当年的财政赤字。大资本家的反对和抵制，进一步加重了政府的财政危机，使国有化改革带来严重的后果。后来密特朗为了希望阻挡资金外流而调高法国利率，但这些大资本家根本不领情，结果反而加重经济萧条。之后当民众把不满情绪反应在国会议员补选后，密特朗只好做政策调整。以上例子告诉我们：在国际资本跳脱民族国家的束缚之后（特别是有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为其背书时），任何尝试想进行偏向劳工政策的政党，其所可能面对的窘境。

殖民地的不当措施。这是对抗希特勒未来可能的侵略，建立坚实的道德基础。在〈法兰西帝国殖民问题的新情况〉(New Facts about the Colonial Problem in the French Empire)中，韦依认为，由法国带头赋予殖民地自治是最佳办法，而不要等到殖民地人民起义反抗。韦依想的更远的是，自治可以使那些至今还不得不对各种压迫俯首称臣的人民获得部份自由，而不会把他们推向狂热的民族主义。自治同时可以使他们的国家避免重蹈过度工业化、走向国家主义甚至军国主义的覆辙。韦依甚至梦想着，这将会使所有热爱自由的正义人士，为法国作为自由泉源的存在而感到高兴(Weil, 2003, p.70-71)。遗憾的是，韦依关于这一方面的现实乌托邦，离真实的政治现实还很遥远。

韦依以上关于国际协定以及殖民政策的国际主义主张，对于今天因为新自由主义造成传统民族国家竞相破底竞争的困境，不仅早有预见，同时在那时代，提出相当前瞻的主张而今依然历久弥新。

三、其独特的古希腊文明反思

从经验世界面向超验世界，韦依选择了自己最亲近的基督教。在知识的世界里，她确信福音书是她向往的古希腊文明传承，但同时也知基督教在稍后受到古罗马的负面影响。韦依延续托尔斯泰的观念，特别是其《天国在你心中》(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作，认为君士坦丁一世在公元313年颁布的米兰诏书(基督教不再遭受迫害)，其后继任者甚至将之定为国教，是基督教罗马化的开始。韦依甚至指出，原本福音书继承古希腊精神的内容，渐渐被逐一清空。而「逐出教门」的可怕惩罚，就是古罗马文化带给基督教的恶劣影响。

韦依对于德国纳粹民族主义兴起，加上隔年法国也掀起爱国热潮，1932年写了一篇〈关于爱国主义的几点思考〉(Quelques réflexions sur le patriotisme)。她对爱国主义的历史渊源，做了以下说明：「希腊人的爱国主义是美好的、人道的，不过，这种爱国主义是对法律的爱。只有当他们为自由而战，只有当他们反对国内敌人比反对国外敌人倾注更多热情的情况下，这个爱国主义才是美好的、人道的。……一个人的祖国，是他自由生存之所

在……在法国大革命时，祖国这个概念被重新拾起。爱国者首先是本国贵族的敌人，首先是支持这些贵族的外国人的敌人」(Petrement, 1997 / 王苏生、卢起译, 2004, 页 331)。韦依认为，在古希腊人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爱国主义显然与我们今天有着极为不同含意。在前者那里，爱国主义是公民对保障人身自由法律的热爱；而在我们这里却是奴隶对奴隶主的热爱。

另外在《扎根》中，韦依对此演变有更清楚描述。在〈拔根状态与民族〉(Uprootedness and Nationhood) 章节里，韦依提及法国大革命的爱国主义独特之处，就在其传承古希腊时代的概念。透过强烈的「主权在民」思想，把过去臣服在法国王室的各界民众融合在一起。许多人以前不是法国人，如今希望成为法国人，而其关键就在这主权在民的概念上。「于是，在法国有一个这样爱国主义的悖论：爱国主义不是建立在对过去的爱，而是建立在对本国历史最彻底的决裂之上」(Weil, 1952/2002b, p.109)。然而不到几年，科西嘉的拿破仑又让它质变回「主权在君」。由于拿破仑建立国家征兵的现代军队与抽象的国家荣耀，爱国主义又从左派变回右派。民族之主权，原本是在人民，现在又转回在君主统治者这边。

因此，有关民族主权所指内涵为何？韦依指出，一位当代人与一位 1789 年的人，其之间的对话，肯定会导致一连串极富戏剧性的彼此误解。如今现代观念的国家，是一个神圣、不会犯错的国度。而起码，英国的谚语还会说：无论好或坏，都是我的国家。而法国则走的更远，已经不承认自己的祖国，有可能是坏，也可能会犯错。可怕的是，在现代爱国主义的表达中，已经没有太多正义与否的可能讨论空间，因为在民族主义的旗帜挥动下，自己的国家是永远都不会犯错的。没有讨论的前提或议题，只有服从的结论与命令。韦依这一部份关于爱国主义的说明，可作为刘晓波对于当前中国民族主义的批判，最为适当的补充。⁷

⁷ 2010 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曾经对近几十年中国狂热的民族主义特别著书《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2006)，对于中国极端的反美、反日与反台独提出批判。在该书书背的「作者题记」，刘晓波甚至这么说着：「除非面对外族入侵带来的主权领土的危机，否则的话，我从不认为『爱国主义』是个崇高的字眼。恰恰相反，在和平时期，聚集在爱国主义大旗下的，不是卑鄙的政客，就是颠三倒四的疯子。」刘晓波目前依旧被中国政府软禁中。

贰、我们是否还保有古希腊史诗精神

有一次，韦依与友人谈起对未来的担忧，她担心人类最终会丧失古希腊精神。在她看来，我们今天所有最好的东西无不源于古希腊的启示。韦依提出一个非常独特的西方文明观点：新约福音书是一部古希腊作品。而确实，旧约是以希伯来文书写，而新约则是以古希腊文记载。甚至韦依说着「耶稣基督不仅是以赛亚预言的受难的人，是所有以色列先知宣称的救世主，他还是古希腊人在几世纪里奋力思考的黄金比例」（Weil, 1957, p.161）。

韦依从古希腊、福音书与中世纪法国南部的奥克文明，诠释出她非常珍惜、但明显日渐式微的古希腊史诗精神传承。〈《伊利亚特》，或力量之诗〉书末的文字如此写着古希腊史诗精神核心：「当他们懂得不相信逃避命运、不崇拜力量、不仇恨敌人，以及不轻视不幸的人时，他们也许会找回史诗精神。但我很怀疑这一天会很快来临。」

一、新约福音书是古希腊思想的传承

在荷马《伊利亚特》的叙述中，古希腊人对于特洛伊城的征服，并没有引以为豪，反而从中思索人类处境的苦涩。有限世界的胜利光荣，却无法掩盖面对终极世界的空无。于是胜利后的整个希腊文明，竟是在沈思，如何搭建人类困境与神性完美的可能桥梁，呈现在希腊悲剧与柏拉图的思想中。

有限的人们倾向以第一人称，视自己为世界中心。胜利者更因为拥有这尘世的主宰权力，加强了这世界中心的感受。但任何有限个人的生命结束之后，那些过往云烟的曾经胜利，又能代表什么呢？于是反过来，一种直视战败者的苦难心灵世界，一种尊敬与惊呼这灵魂「承受苦难的潜能大到令人震慑地步」的悲剧创作，竟主要出现在古希腊伯里克利与英国伊莉莎白一世的两个盛世时期。汉弥尔顿（E. Hamilton）更是在其〈悲剧的理念〉（The Idea of Tragedy）中这么写着：「没有一种尊严可以与受苦中的灵魂尊严相比拟，……，瞥见一个比我们生存其间的世界更深睿、更至极的真实境界」（黄毓秀、曾珍珍译，1984，页 9-13）。

而关于柏拉图，韦依则认为他是荷马到耶稣之间的秘教传承者。不同于绝大部份哲学家努力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柏拉图在其对话录中，主要不是去讨论这个想法是对或是错，而是弄清楚这个想法究竟要说明什么。也因为这样，柏拉图的主要工作是在对人类思想进行清点，在清点中发现矛盾。柏拉图甚至认为，我们无法透过清点来消除矛盾，否则我们一定在说谎。柏拉图确实倾向把话说一半，因为在其巨兽理论中，有限的人永远不可能理解巨兽全貌。而当人们不可能认识真正完整的善，却自视全然已知时，人世间的荒诞与不公主要正源自于此。

只有放弃自以为是的全称思考，一个人才有可能真正明白人的认知有限，以及其他的人都是自己的同类。

韦依在 1938 年写给贝尔 (C. G. Bell) 的信里曾这么说，「最美的诗歌，必须能够真实表达那些不能写诗的人的生活」(吴雅凌译，2012，页 329)。而我们应可顺着韦依的论述如是说：最美的公共政策论述，也应是能为不能发声者发声。事实上，过去历史以来，有多少人没有办法写属于自己的诗歌，有多少人没有办法为自己的处境发声？因此当韦依说着，耶稣基督就是古希腊人冀求的黄金比例，其指的就是基督最后走向十字架的过程。耶稣为世人背上十字架，面向众多难以发声的平民百姓，然后对着无限大的上帝，最后殉道时说：「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整个过程所形成的，即是一个传承古希腊的史诗悲剧。

然而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对于不能发声者的发声问题，并不以为意。他们秉持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信念，只重视前面 20% 有购买力人们的需求即可。至于其他 80% 绝大部份的一般百姓，是可以忽略的，更不要说那底层的 20% 人口。因此在市场上，这群底层人民根本无从发声，也由于他们大都没有机会受到应有教育，因此不能说、不敢说、甚至不知该如何说，以致无法书写文字诉说自己命运。

韦依不仅表达新约是古希腊文明的传承，甚至还直指旧约与新约的矛盾。在与朋友的书信中，韦依竟如此写着：「我怎么也无法理解一个有理智的人，怎么可能认为旧约中的耶和华和新约中的圣父会是同一个人。我认为基督教的败坏是由于受到了旧约和罗马帝国的影响，而这个影响一直由罗马

教廷沿袭了下来。」(Petrement, 1997 / 王苏生、卢起译, 2004, 页 719) 过境纽约时期, 与朋友华尔 (J. Wahl) 讨论宗教历史她还这么说, 「我认为在创世纪中, 一直讲到亚伯拉罕的前十一章都不过是埃及宗教典籍的改头换面。」(Petrement, 1997 / 王苏生、卢起译, 2004, 页 870) 而这个谈话几乎提前预告佛洛伊德晚年著作《摩西与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 的结论。因为经过佛洛伊德考证后指出: 被视为犹太教的奠基者同时也是以色列的民族英雄摩西, 不是犹太人而是埃及人。⁸

二、中世纪昙花一现的法国奥克文明

韦依在义大利佛罗伦斯写作〈关于服从与自由的沈思〉(Meditation on Obedience and Liberty) 中提到, 虽然佛罗伦斯让伽利略传达力量概念, 但是社会力量的概念却仍未形成。社会组织结构看起来依然是荒谬的, 因为历史上大都是多数人臣服于少数人。韦依进一步省思马克思主义, 认为其从经济范畴里找问题症结, 依然无法解释何以多数人甘愿服从少数人而少数人能够指挥多数人, 人多往往势弱 (Weil, 1958/2001, p. 132-135)。

阐释奥克文明的两篇文章〈从一部史诗看一种文明的终结〉(L'Agonie d'une civilisation vue à travers un poème épique) 与〈奥克文明启示何在?〉

⁸ 萨依德 (E. Said) 的《佛洛伊德与非欧裔》(Freud and the Non-European), 即是透过佛洛伊德晚年重要著作《摩西与一神教》, 拆解了以色列建国赖以建立的神话基础。在过去, 旧约圣经记载里的摩西, 是古代以色列人的民族英雄与领袖。旧约记载着以色列人祖先进入埃及数百年繁荣兴旺, 后来遭到埃及法老王种种迫害, 据载摩西受上帝之命, 率领族人逃离埃及来到西奈半岛, 并创造许多奇迹。在西奈山上, 上帝向摩西颁布十诫及其他律令, 摩西藉此启示设立宗教祭司与审判制度, 从此犹太教才有了完备的教义。也因为这样, 萨依德告诉我们今天的以色列必然会抑制佛洛伊德的思想, 此一著作内容在以色列已成为禁忌。因为犹太教的创教者居然是一位非犹太人, 而且犹太教始于埃及领域; 佛洛伊德可说倾尽全力动员犹太人的非欧洲过往, 破坏了那些想要将犹太身份置于稳固基础的任何教条企图, 他破坏了以色列官方长期以来一直要抹除的这块耶路撒冷周围土地的复杂土层 (萨依德, 2004, 页 58-60)。

(What Makes Up the Occitan Inspiration?), 韦依称之为是《伊利亚特》, 或力量之诗》的续篇, 有意识地从社会力量角度, 比较荷马史诗与奥克语史诗。

文中韦依认为, 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次虚假的文艺复兴, 人类当下的困境实扎根于这虚假的文艺复兴。十三世纪的奥克文明才是真正的文艺复兴, 只可惜今天仅留罗曼建筑遗迹。假设奥克文明没有被消灭而能经历到今, 那么谁知道今天的欧洲命运会有多大不同? 直至今日, 我们每人每天依然在承受这个苦果。对于古希腊罗马、福音书、罗马帝国影响下的基督教会、奥克文明以至文艺复兴运动, 韦依提出全然不同的另类诠释。

传统的文艺复兴认为, 人们以为只要背离基督精神, 就能回归古希腊精神, 但殊不知它们是在同一地方。韦依认为, 当下人类困境恰恰扎根于现代人文精神对古典精神的误解, 「如果说《伊利亚特》是希腊精神的最早显示, 那么福音书则是最后一次神奇现身」(Weil, 1957, p. 52)。

古希腊人认识世界的现实, 是由力量所主导。力会让人变成物, 即使是活生生的人, 因为力的结构驱使, 会早早成了物。这种现实, 是人的苦涩, 也是人的共同艰难。应对此一苦涩命运: 古罗马人崇拜战胜者, 以成王败寇观点书写属于战胜者的历史, 他们轻视外族、敌人、战败者、庶民与奴隶, 用格斗取代悲剧; 希伯来人则把苦难看成是原罪的标志, 在他们眼中, 被征服的敌人是神嫌恶的人, 被判定应去赎罪, 这使得残忍被允许乃至被视为无可避免。

在《伊利亚特》中, 没有人能逃脱命运, 但也没有人, 会因为屈从强权而让人看不起。而那些不屈从的人, 会受到爱戴, 但对他们的爱会很痛苦, 因为他们随时可能会被再摧毁。灵魂的屈辱无须掩饰, 既不需要廉价的同情, 也不会让人看不起。悲剧可以观察出, 一个人承受苦难的极限。然而在这悲剧中, 我们瞥见一个宗教之外(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 属于此岸世界更为深邃与极致的境界。而福音书正是古希腊的真正传承。对希腊人来说, 人生是痛苦与快乐的混合; 而传承到福音书中则是重负与神恩的混合。人被放逐到人间, 既体会着痛苦与重负, 但也同样能感受到快乐与神恩。神恩可以阻止灵魂受到力量强权的影响而堕落, 但却无法阻止这些灵魂受伤。但因为人类升华的爱承受了悲剧重负, 最终就像晨光一样普照人类全体的苦涩。

虽然经历古罗马对古希腊与福音书的负面影响，但奥克文明竟然再现了强调价值、喜悦、平等与仁慈的骑士文明。那是一群自由人自愿效忠主人。即使面对主教们的指责，认为图卢兹伯爵与富瓦伯爵纵容清洁派（又称阿尔比派）异端份子，但他们依旧不为所动地宽容所有教派，而各教派竟也没有因为存亡压力而相互指责对方。最令人感动的是，即使图卢兹伯爵后来丧失了所有土地与财富，自由的亚维农人仍主动前来奉献一切。但奥克人承受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这些人以前是出于正义与尊严而顺服，但最终他们还是在恐慌与羞辱中被迫顺服。此时韦依感慨地说着：「力量不能摧毁精神价值，在历史方面，再没有什么比这种老生常谈更残酷」；但同时也赞叹着奥克文明的坚持，「认知力量，就是承认力量几乎就是世间的绝对君王，同时又带着厌恶和轻视弃绝它」（吴雅凌译，2012，页 281、287）。在《扎根》书里的〈拔根状态与民族〉中，韦依告诉我们：十三世纪初，法国人征服了卢瓦尔河以南地区（也就是今天法国中南部将近一半的国土，包括里昂、波尔多、马赛等），是最酷烈的征服，让原有多样文化一夕之间荡然无存，当地文化被彻底拔根。这里所提及的，是奥克文明被消灭的伤痛。这种对地中海文明的野蛮征服罄竹难书，是罗马帝国后续的可怕遗产。

三、韦依所认知的古罗马文明

韦依是犹太人，不仅不认同旧约，甚至还直觉说出旧约摩西与埃及之间的密切关连，加上其对古罗马的负面评价，对整个西方文明诠释是极大的撼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刻，韦依阅读众多历史著作认为，希特勒目前的所作所为与过去古罗马帝国并无二致。

韦依首先驳斥希特勒必将失败的乐观想法。由于人们习惯看到种种企求统治世界的失败，比如查理五世、路易十四与拿破仑等，但她认为，如果我们把历史的回顾再拉更久远一点，那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企图至少有一次是成功的，也就是古罗马帝国在几个世纪的存在。由此，韦依对自由民族不会消失的天真看法提出警告，在〈对希特勒主义起源的几点思考〉（Some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of Hitlerism) 中, 认为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并非特例。

韦依发现, 现代强权国家普遍都有希冀达到全球统治的愿望, 并以古罗马帝国为其景仰学习的榜样。因此威吓世界和平的不只是希特勒德国, 而是一种让希特勒意图可能实现的全球性统治「现代文明状态」。而这种威吓将不会随着对德国取得胜利后就可以解除。韦依以上陈述, 某种程度说明了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的曾经作为, 并且也准确预测了二次大战后的美苏冷战, 以及苏联瓦解后, 目前由美国所建立的全球霸权秩序。

韦依当时认为, 世界上唯一实现全球统治成功, 并且将这统治维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就是罗马帝国。但罗马帝国却是历史上, 能够找到对人类发展损害最严重的政治体制之一, 其独裁与集权带给被统治民族是灾难与长期的衰落。罗马帝国的和平是荒漠里的和平, 没有政治自由、文化多样性, 更不要说文学艺术科学的发展。几个世纪地中海流域的精神贫瘠正是这帝国所带来的惨烈代价。

在这悲观的说明中, 韦依也提及亮光, 而往后的历史发展也确如她所说。她发现希特勒与古罗马的差异在, 希特勒在成为世界主宰之前就实行帝国统治, 这种独裁统治会阻碍他最后成为世界主宰。因为一个独裁国家只能镇压臣民, 却不能征服许多其他民族。希特勒在自己的国家过早地扼杀自由。韦依强调, 是罗马共和国的公民征服了世界, 而非后来失去自由的罗马帝国臣民。罗马帝国保存与发展了罗马共和国的征服成果, 但罗马帝国本身却战功寥寥。韦依在战争爆发前夕就已推论, 古罗马的扩张力量在其实行帝制之后反而不复存在, 因此, 我们如果能有效维持不让希特勒继续扩张十或十五年, 那么整个危险情势就能渐渐化险为夷。

比较让韦依忧心的是, 由于我们对古罗马仍未有清楚省思, 因此重新审视「我们文明基础」是当务之急。因为古罗马的模式是, 荣誉属于那些战胜者, 属于那些能够征服和统治别人的人, 而不是属于为正义和公共福祉奋斗的人。或许我们可以仔细回想, 当今世界主流的功成名就价值观, 对失败者与弱者依旧是多么地现实与残酷。所以, 究竟现在的文明状态, 是古罗马的影响较多, 还是古希腊影响较多? 从中, 或许我们才能体会何以韦依对未来

的担忧，「人类最终会丧失古希腊精神，我们今天所有最好的东西无不源于古希腊的启示。」可以说，韦依的以上论述，依旧是当代的现在进行式。

参、新自由主义是资本统治与官僚统治的结合

在《往事与随想》(*My Past and Thought*)中卷第三十九章里，俄国思想家赫尔岑戏谑地写着「皇帝詹姆斯·罗思柴尔德和银行家尼古拉·罗曼诺夫」标题，内容说尼古拉皇帝一直扣留他的财产，但他却因为结识银行家罗思柴尔德(J. Rothschild)最终得以解围。赫尔岑描述着罗思柴尔德如何威胁尼古拉，「完全像一个政权对另一个政权的谈判」(项星耀译，1998，页438)另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少年》(*A Raw Youth*)，少年阿尔卡季说明其「思想」是，成为罗思柴尔德那样的富豪。阿尔卡季甚至转述「据报纸报导，在维也纳的某个车站上，就有一名外国伯爵或男爵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一位当地银行家穿鞋，而那位居然不动声色地接受了」(陈燊，2010，页116)。由上得知早在十九世纪时，王公贵族早就与资本家进行全面性的「历史性妥协」，并在二十世纪成为新的权贵阶层，继续进行对绝大多数中下阶级的普遍统治。而在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如此统治模式，继续成为全球普遍现象。

一、198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统治

不过，1960年代是难得罕见地理想高过现实的时代，原本一元的白人男性特权，渐渐让渡部份权利给其他有色人种、女性等。然而，美国学者杭廷顿(S. Huntington)在1975年给「三边委员会」的报告中却表示，1960年代后的美国虽有更多的平等参与，但已激起社会无法管理的民主波涛，并给政府管理带来问题(Green, 1993, p. 99-100)。

然而从 1980 年雷根当选美国总统后，其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新自由主义，又重获主导角色以至今日。⁹1995 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透过全球广泛的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逐渐让原本民族国家许诺给本国劳工福利的愿景一一破灭。

西方强国国家倡导的经济全球化告诉大家，在撤除关税壁垒与各种贸易障碍后，国际间各种商品可以自由流通，这是让全球经济成长的不二法门，每个国家都可从中得到好处同时嘉惠穷人。这种商品与国际资金得以自由进出各国的国际经济政策，大大降低传统民族国家的政治人物影响力。于是我们接着看到，在多数自由贸易协定里，主要都是强调有利于资方的劳动市场自由化。如此，在市场机制运作下，所有劳动者的福利、安全保障渐被取消，许多劳动者面对工作环境恶化，也因为害怕失去工作而默默承受，因为在自由贸易协定的大环境下，有更多的第三世界劳动大军等着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

另一方面，资本家在此一潮流主导下，其享有的权利远远大于其所应尽的义务。于是这 30 多年来，我们见识到跨国大企业「慢动作政变」传统民族国家的过程。民族国家流失的权力，正不断地灌入已经臃肿不堪的大企业及国际金融组织里。即使是经济大国德国，在过去 20 年里，企业利润已增加 90%，但德国公司税收入却反而减少 50%。1999 年当时德国财政部长拉封丹（O. Lafontaine）曾不顾一切要提高公司税，但却遭到大企业联合威胁要外移。最后结果威胁大获全胜，拉封丹被迫下台（Woodin & Lucas, 2004 / 邓伯宸译，2005，页 30）。

在这样全面资本统治大获全胜的社会趋势下，全世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未来我们将面对社会阶层无法流动的「社会死」窘境。在 1960 年时，当时世界最富有的前五分之一所得，是后面最贫穷五分之一所得的 30 倍：

⁹ 2009 年纪录片【资本爱情故事】，导演摩尔（M. Moore）在片中的第 20 分钟前后，呈现出雷根总统的总参谋长美林证券总裁 Don Regan，对雷根颐指气使嗤之以鼻，而雷根却全然听命行事的画面。这过程，几乎是赫尔岑回忆录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翻版。

但到 1990 年时，差距一下子来到 60 倍，1999 年的统计是 80 倍，2006 年则已经来到 90 倍。

2006 年 12 月，根据联合国历来最大规模的全球财富分配调查发现：全球 1% 最有钱的人掌控世界财富的 40%；排名前 2% 的巨富，则垄断全球半数以上的资产。这项由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所进行的研究显示，金字塔顶端的 1%，每人资产至少 50 万美元。此外，在 2015 年 1 月世界经济论坛召开前夕，国际组织「乐施会」(Oxfam) 发布更新的贫富悬殊数据：2009 年全球 1% 最有钱的人掌控世界财富的 44%；2014 年则再进一步来到 48%。乐施会据此推估如果情况继续，那么 2016 年全球 1% 最有钱的人，将掌控世界财富超过 50%。

二、1980 年代社会主义社会的官僚统治

中国在经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之后，邓小平于 1978 年上台主政，告别革命点滴改革。在引进市场经济、先让一部份人富起来的做法，让今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学者李泽厚去政治化的美学思想，正是当代中国整个「告别革命」背后最主要的思想支撑。¹⁰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当代中国更关键的共产党一党专政官僚统治问题，在魏京生、王丹与刘晓波等少数人主张之后，并没有被真正面对。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没有政治理论的论述根据。如此专政是对政治人性的欠缺认知，同时也是韦依与后来格瓦拉深刻感叹社会主义国家官僚统治的弊端。事实上，无产阶级专政是政治上的可怕玩笑，人们竟然会主观地相信一个政党长期执政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上而不会腐化。立基于对政治人性的消极解读是：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

¹⁰ 李泽厚从《美的历程》(2007) 开始，《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1996a) 是其核心思想支柱，然后《中国古代思想史论》(1996b)、《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996c) 与《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996d)，以至他与刘再复的《告别革命——二十世纪中国对话录》(1999)，笔者认为，是至今中国经济崛起的最重要立论论述。这个影响普遍的论述，使得绝大部份的当代中国人，对于去政治民主化的当前党国威权官僚体制，将之视为可被接受的现实存在。

化，所以政治人性需要被监督制衡。因此理想的状况是：要让任何执政党强烈感觉到，如果做不好，随时可能会被在野党取代。

中国在邓小平主导下进行四个现代化，但排除了魏京生极力倡导的第五个民主现代化。邓小平出访资本主义国家、参访并盛赞先进工厂技术，某种程度是前面提及史达林参观美国工厂的翻版。

在换掉胡耀邦、赵紫阳，并经历江泽民、胡锦涛，以至今天的习近平。中国经济崛起的后果，不仅有着西方资本统治的贫富悬殊恶果，更有着因为不顾环境失衡的生态浩劫。北京大学 2014 年 7 月 25 日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中国顶端 1% 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另外，底层 25% 的家庭却仅有全国 1% 的财产。中国 30 多年来所谓经济崛起，成为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经济体，其背后的代价却是贫富悬殊的社会死再加上环境恶化的「生态死」。中国目前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在中国 500 个城市中，只有不到 1% 的城市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良好空气标准，而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 10 个城市有 7 个在中国。更令人无法想象的是，中国首都北京，在柴静【穹顶之下】纪录片的报导下，竟是一个不适人居的城市。

2014 年 11 月中国为了举办国际会议而出现的「APEC 蓝」，正是这全面性官僚统治的正与反注脚。

2014 年 11 月 7 日至 12 日，APEC 亚太经合会在北京举办。中国政府为了不让参与的各国领袖见识到北京几乎一年到头的雾霾空气，于是进行了可能人类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空气污染管控。包括车辆限行、数千家企业限产与停产、工地停工与调整放假等非常措施，终于使得会议期间出现久违的蓝天。然而会议结束后，一切又重回从前。于是人们将那几天的北京蓝天，称为 APEC 最宝贵的遗产，「APEC 蓝」同时也立即成为描述事物稍纵即逝的形容词。

三、结合资本与官僚统治的世界贸易组织

也许许多人不知，世界贸易组织与联合国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就世贸组织主导的各项贸易谈判明显偏向资方来看，说该组织是维护跨国大企业利益的全球富人俱乐部实不为过。早在关贸总协在 1993 年乌拉圭回合谈判时，正因为农产品国际贸易的补贴问题陷入僵局时，该次会议谈判代表，竟第一次提出要继续向前，在物与物的货品贸易之上，推动人与人之间国际流通的服务业贸易协定。关贸总协深知，服贸协定的推动会更棘手，因此 1995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立世界贸易组织。许多人由此推论，世贸组织正是为了推动服贸协议而成立。¹¹

而当中国与俄罗斯在 2001 年与 2012 年，分别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会员国之后，世贸组织可说结合资本统治与官僚统治于一身，成为比联合国更有实际决策力与影响力的新自由主义最大大本营。世贸组织的「力量」王国确实早就远远超越「阶级」意识所能影响的范围。此刻，不管是再高谈如何「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或者是社会主义国家将当前困境惯性地指向「邪恶美帝」，都会让人觉得感慨与不知所云。

在「怎么办？」的疑惑与思考中，我们可以扭转当前此一新自由主义市场力量的趋势吗？或者情况可以不要再继续恶化吗？在卑微人性的现实认知下，古希腊文明可以帮我们回复一些吗？韦依是悲观的。但也许透过韦依思想的说明，我们可以扭转多少算多少。

马克思在 1845 年〈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第 11 条提及，「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今，经过近两百年对资本统治的尝试改变，得到的却是官僚统治。曾经追随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游击战，后来甚至出任法国密特朗总统特使的德布雷（R. Debray）在与中国学者赵汀阳进行「两面之词」对谈中（2014），其提出的「媒介学」主要关心技术发明对人类行为带来实际影响，其论述似乎从改变世界一端，重新摆向

¹¹ 欧盟执委会对此则承认，正在推动的「服务业贸易总协定」将成为大企业新一波的获利最大利器，协定的推动，服务业游说团体的用力也最深。一位曾任职世贸组织的官员就表示：若非美国两大跨国公司——美国运通与花旗银行，所施加的巨大压力，那么就不会有服务业贸易总协定的产生与推动（Woodin & Lucas, 2004 / 邓伯宸译，2005，页 44）。

解释世界的另一端。如何重新提出一种不要是「一种压迫替代另一种」世界解释，是当前重大挑战。

以下，则尝试从韦依思想的经验层面与其超验层面，提出其可能的「超自然真实」启示可能。

肆、韦依思想在经验层面上的当代意义

劳动是使我们从幻想到现实的重要途径，从笛卡儿的研究中，得知几何学就是工人的女儿，通过劳动掌握世界。韦依深感教育就是力量，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力量，她希望藉由教育，劳动者也可以获得知识，将知识据为己有而非推翻它。基于这样认知，韦依从短暂打零工到赴任中学教师，她与阿兰的其他学生期望在未来，可以办一所社会教育大学。

过去的统治阶级是王公贵族，如今则是前者与资本家的联合。阿兰曾经将资产者定义为以说服别人为生的人，与人而不是与物打交道的人。所以资本家说服与收买学者时常是无往不利，因此总的说来，文字记录者、神甫或知识分子，到目前为止几乎仍是倾向选择站在统治阶级那一边。新自由主义的文化霸权可以如此巩固，只是再多了一个例证。

一、现代分工的笛卡儿失败

科学究竟为人类带来自由平等，还是新的奴役？韦依认为必须回到现代科学的源头笛卡儿思想。当古希腊的泰勒斯发明几何学，取代了过去祭司建立的王国，而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可说终结中世纪另一经院哲学王国。尽管韦依欣赏笛卡儿的贡献，但在她经历工厂岁月之后，还是有感而发地说「笛卡儿探索的方向错了」。笛卡儿为了让思考进一步走远、抽象化，于是将古希腊几何学也进一步符号代数化。然而，当思想交付给符号，人的精神，也就是大部分的人就会放弃思考的能力。当思想成为只是符号的操作，就不太可能有真正的思考。于是接下来的发展是学科专业分工，学者专家被发明出来，成为当代文明的主导。

笛卡儿没有找到方法阻止将想象的范畴变成事物。韦依的工厂经历证实了她早先学位论文所提及的忧心。学者将生活常识扔到一边，直观易明的则尽可能清除，取而代之的是重重抽象符号建构起来的新科学。于是，一道深渊将学者与未受文字教育的人们区隔开来，学者们成功地继承古代神权统治的祭司。为此韦依将当今文明的画轴，称之为「笛卡儿失败」。这是如何获得知识的失衡。

或许挽回的方向是，绝大部分人开始恢复真正的思考，韦依后来也长期致力于此，甚至教工人们如何认识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Antigone*）。今看来，公民社会的诞生与成熟，应该就是挽回笛卡儿失败的希望。学者专家的特权化，是笛卡儿从几何走向代数的失败；而公民社会的知识普及化与降低国际分工的在地化，应是未来可以改善的方向。

前面曾提及韦依意识到达成国际协定的重要，否则一个国家取得的社会进步，将很难在世界范围内维系下去，当今新自由主义的大行其道，证实了韦依早先的忧虑。新自由主义透过李嘉图「比较利益」法则（做自己擅长的），将本国贸易与国际贸易本末倒置，作为主张国际贸易的理论依据。而当国内分工进一步走向国际分工，资本主义的资本统治就很容易在传统民族国家间，透过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名义，进一步不尽义务地需索其所要的权利，让各国竞相破底竞争。

这样的破底竞争国际分工，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原来单一国家的民主巩固、生态保护与缩小贫富差距等，如今渐成海市蜃楼。过去即使有定期选举、民主自由传统的民族国家，其向公民许诺的生态保护、基本工资保障，都在国际贸易组织主导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下，成为被视为不长进、没有国际竞争力的落后国家保护主义象征。

曾经几度是全世界最大的跨国企业通用电气（GE），从1986年就开始将公司业务进行全球分工，美国员工被裁一半，生产线移往低工资地区如东欧国家。然在这些低工资国家，工作依旧极不稳定。通用电气曾将土耳其厂关掉，移往工资更低的匈牙利，但尽管如此，它仍威胁匈牙利，如果匈牙利又开始要求这要求那，则他们准备移往印度。该公司前总裁魏尔克（J. Welch）更明言建议：「你的每座工厂，最好都设在方舟上」（Woodin & Lucas, 2004

/ 邓伯宸译, 2005, 页 321-322)。因为只要当政府想对工厂设限或该国工人想要更多工资或更好的劳动条件时, 工厂就可随时迁走。从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由于数亿中国劳工加入全球劳力市场, 因此在这破底竞争过程中, 中国劳工正在界定, 什么是真正最低工资, 也就是全世界的工资到底可以低到多低。

今天国际分工下的「血汗工厂」, 除了低工资外, 对人性最大的伤害是, 劳工被计时地、并成天像机器般, 做着同样一个动作。人变成了机器、成了物。德语系思想家黑格尔很早就预示到, 资本社会的分工, 会造成「整体」史诗风格的危害 (Lukacs, 1950, p. 155)。一个理想人性化的社会应是, 每个人都能完整地独自完成其所想要做的事物、志业。每个人即使最枝微末节的细节动作, 也都能联系到社会整体意义, 这是从古希腊文明以降, 珍贵的人性化史诗美学。而今新自由主义倡行的国际分工, 让这原本已经相当非人性化的社会, 实际上更成奴役化般的社会。

二、韦依的实际劳动经历

早在学生时代, 韦依即认为既是体力劳动又是劳心思想者, 才是最完美均衡与拥有真实情感的人。高师毕业后, 在从事教育工作与实际介入工会活动之时, 她意识到自己并非属于双手劳动的人, 总觉遗憾与不足。在实际经历教师工作与多年渴望工厂劳动之后, 韦依终于在 1934 年付诸行动。她曾与奥诺拉特 (H. Honnorat) 说: 如果自己不这么做, 就没有资格在那个时代说话。韦依觉察面对现实问题, 理论思考已经陷入困境; 已有相当时日, 她认为只有实际进入工厂劳动, 才能得到真正的解答。

对于体力劳动, 韦依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第一个是非人性化, 累得连脑子都不转圈的现代工厂劳动, 分别是 1934 年 12 月 4 日到隔年 4 月 5 日阿尔斯通 (Alsthom) 公司的冲压工、1935 年 4 月 11 日到 5 月 7 日在卡纳和弗日 (Basse-Indres Forges) 工厂的高速运转的生产线工, 以及 1935 年 6 月 6 日到 8 月 22 日在雷诺汽车的车间铣床工。那个总也摆脱不了的思考习惯,

到后来终于摆脱了一个抽象世界。韦依认为工人的真正解放只能从劳动本身出发，因此对现代机器除了效率之外，是否符合劳动者的人性要求才是至关重要。但令她难过的是，工厂劳动要求的是精神真空，要大家变成没有思维的机器人。她知道工厂是多数受压迫者真正生活的地方，如何使之更有尊严、不须逆来顺受，是重要关键。可是这一段时间的工厂岁月，不仅让她烙下无法忘怀的奴隶记忆，同时更加强她政治上的悲观。韦依认为，只要无法改变工人的从属地位，生产过程依旧建立在被动的服从基础上，那么所谓的工人革命，反而会因为管理者从分散转为集中，不平等与非人性会变得更为严厉。事实上，伤害工人们最大的，莫过于别人决定着自己的命运。「每当我想到布尔什维克的那些伟大领袖们，总在宣称要创立一个自由的工人阶级，可是他们中却没有人在工厂曾经做过工时，我就觉得他们的政治理论就是一个凶多吉少的玩笑」(Petrement, 1997 / 王苏生、卢起译, 2004, 页 456)。

第二阶段则是 1941 年 9 月到 10 月，在离马赛不远的葡萄园担任农场女工。透过奥诺拉特认识贝兰神父再认识梯篷，从而得到了这份收成葡萄的农场工人工作。韦依曾对梯篷这样说：「对我来说，知识文化并不赋予一种特权。相反，它构成了一种令人却步的特权，这是一个要承担许多沉重责任的特权」(Petrement, 1997 / 王苏生、卢起译, 2004, 页 761)。为此，韦依希望在一段时间里用行动证明这一切，去承担那些从来不享有这种特权的人，一生都在承担的压力。种没有知识特权的工作压力，正是芸芸众生普遍的生活经历。

这时期韦依的身体状况，农场劳动对她已是负荷过度。但她依旧想着与农场工人同甘共苦，将劳累转为净化，甚至从中体会那独特的生之愉悦。「我猜想我也许会因为身体的劳累而丧失才智。但我相信体力劳动是一种净化，是对痛苦和屈辱的净化。我们能在劳动中发现那种发自内心同时又能滋养我们内心的欢乐。这种欢乐是你在别处找不到的。」而后，即使同伴们看着韦依摘着葡萄后因为体力不支倒在地上，但她还是完成了每天工作八小时，且四个星期皆如此的工作，并且得到雇主的赏识，说她够格嫁给农民。这是一个农民对城里姑娘所能给的最高赞赏，韦依如是说。

在后期作品里，韦依对体力劳动评价甚高，在〈内心爱上帝的几种形式〉(Forms of the Implicit Love of God) 有如下文字：「体力劳动构成了同世界之美的一种特殊接触，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样全面充分的接触在别处无可替代」(Weil, 1973/2009, p. 108)。另外，在《扎根》最后说：「于是，所有其他的人类活动：发号施令、在技术、艺术、科学、哲学领域中的合作等等，都亚于具有灵性意义的体力劳动」(Weil, 1952/2002b, p. 298)。

三、权利宣言外的义务宣言

在伦敦流亡的戴高乐，成立了许多委员会，其中之一是国家改革委员会正在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基础上，准备起草一份新的宣言。由于韦依知晓这份新宣言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依旧环绕在「权利」上，为此她特别写下比权利宣言更为重要的义务宣言。

这本未完成的著作是《扎根》，法译英的书名是 *The Need for Roots: Prelude to a Declaration of Duties toward Mankind*。这是韦依有感于法国大革命仅强调「权利」忽略「义务」(法文是 *devoir*，英文是 *duty* 或 *obligation*) 的重要著作。书中韦依将义务置于权利之上，认为义务优先于权利，并且后者应从属于前者。她认为：一项「义务」即使不为他人所承认，也无损于它的存在意义；但「权利」则不然，如果不被别人承认，则这权利一文不值。而 1789 年的人们，由于错把权利当成最主要的价值依据，是今天许多问题的根源之一。

韦依进一步阐述权利的概念是善恶混杂的，因此拥有一项权利，意味着以此为名，其行善或作恶的双重性；相反地，义务的履行则是纯然的善。1943 年 8 月 4 日在〈自由法国行动〉(Free French Movement) 上刊登的新宣言中，韦依不仅列举公民权利，同时提出一系列应尽的义务 (Weil, 1986, p. 201)。

在〈抵抗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bellion) 里，韦依提议的「最高抵抗委员会」为戴高乐采纳，并于 1943 年 5 月召开第一次「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不过，法国的「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不是韦依原本的完整构想。她拟议的「最高抵抗委员会」是一个国际性组织，起码是全欧洲的委员会。

但戴高乐想着的依然是自己或是法国的权利委员会，他仍然无法真正理解，这是韦依全世界的「义务委员会」。

伍、韦依思想在超验层面上的当代意义

韦依一生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她的妈妈曾说，她女儿不到二十岁，就预感自己活不久。主要是令她时常痛不欲生的疑似遗传头痛病，让她珍惜有限的生命。她也曾回应母亲说道：「你不应该为我患头痛病而懊恼，因为没有这个头痛病，有许多事情本来我是不会去做的」(Petrement, 1997 / 王苏生、卢起译，2004，页 157)。¹²

韦依说，这世上让人觉得神秘莫测的还是那些仅仅追求善的人。那真正完整的善是独立于人的理解之外，有限的个人面对这超越经验的善，是不可能企及的全然理解。然而摆在眼前的事实却是，对于这个与知识教育高低无关的善，人们依旧有权接近、仅仅纯粹地追求着。而最令人感动或神秘莫测的是，知道善的巨大难以企及，但属于自己渺小的、必须履行这个善的义务时，许多人依旧是为所应为。

一、战地护士培训计画

很多人知道韦依一直有奉献生命的倾向，因此人们对于她从战争一开始到生命最后极力奔走的战地护士培训计画，有着很深的误解。这个计画让她从马赛流亡到纽约，又从纽约辗转来到伦敦。当美国白宫收到韦依的计画时，其信的回复是：一项有关血浆的最新发明，已经改善了在前线对伤员的治疗。而在伦敦，当计画送到戴高乐手上时，戴高乐的评语则是：「噢，她疯了！」

这一整个计画在其《伦敦手记》里有完整的说明。韦依为那些在战场上受伤痛苦的生命感同身受，认为对他们的快速抢救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他

¹² 韦依的头痛病，让人再次想起在她之后的格瓦拉哮喘病。或许这不同时代的两个人，都因为随时意识到生命的有限与随时終了，使他们献身世界、让后人缅怀不已。

们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治，哪怕是很初级的救治，他们的生命或许就得以延续。至于那些伤势极为严重，已经奄奄一息无法救治的伤员，把他们丢弃在战场上也是不能忍受的。因此，韦依的计画是培训一些不怕牺牲，肯到火线上救治和抢救这些伤员的护士。而这计画若能实现，韦依一定以身作则参加，同时明白这些参与的护士也大多会九死一生。虽然招募到这样勇敢与温柔兼备的女性并不容易，但韦依有信心可以找得到。

事实上，这个不被理解的计画并不是韦依因为怜悯而想疯了头，而是在理想与现实上，对战争的一种积极意志回应。

在理想上这是想象力下的产物，后来在阅读到〈薄伽梵歌〉时，她再次确认这个计画的重要性。〈薄伽梵歌〉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诗篇，是武将阿周与天神黑天，关于继续战斗与否的著名对话。阿周以怜悯之心准备停战，但黑天却认为，他应履行职责继续前进。韦依在面对无可避免的战争之后就主张迎战，她引述黑天告诉阿周的话：「用某种方法作战，并不会影响到，人依然是纯朴的」。而这个战地护士培训即是，使用某种方式作战，人依然可以是纯朴的。

另外在现实上，韦依也提醒人们，道德因素在今日战争中有着何等重要的作用。希特勒懂得组织他的党卫军与空降伞兵队，这些培训就是挑选一些准备冒险，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人去完成一些特殊使命。在《伦敦手记》里她认为：我们的敌人靠着偶像崇拜和艾尔萨兹式（ersatz）的宗教信仰走到我们的前面了，我们的胜利也需要同样的激励，但却要更加的真实与纯粹（Weil, 1986, p. 23）。韦依认为，我们不能照搬希特勒那一套（我们知道，日本在二战后期的神风特攻队也是如此），应该有自己的培训。我们需要一种勇气，不是伤害人的勇气，而是在危难的时刻，伸出援手救助那些生命垂危之人的勇气。战地护士培训计画就是这个保护人的巨大勇气计画。

然她的计画始终未能被理解与实现，最终病倒送至伦敦近郊医院。应该说，韦依是听任自己渐渐不吃食物的，在她看来，节省自己的那份口粮是她在生命最后能参与抵抗的仅剩行动。弥留之际仍不断表示，她要分担法国人的苦难，不能吃东西。

二、韦依在宗教上的超验经历

主要是经历劳动的真实体会与过往对世界憧憬的幻灭，一次又一次地将她从有限的经验世界拉向超验的宗教领域。对韦依来说，或许最大的失望在于她意识到受压迫者的群体本性，其中的人性卑微使她的同情心一再落空。

韦依虽是犹太人，然其成长过程却一直处在「不可知论」的氛围中。但在她生命晚期 1942 年，写给贝兰神父的书信〈精神自传〉里，却详细描述其与天主教的三次重要接触。在这三次朝向宗教的过程中，让我们得知这位原来的不可知论者，何以在 1938 年后会说，她感受到基督的存在。

第一次接触是她在工厂劳动之后，1935 年随同父母来到葡萄牙，然后一人独行到一个小村落。「在这个和我的身体状况一样悲惨的葡萄牙村庄，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我都是独自一人，……渔妇绕着渔船排成长队，手里拿着蜡烛，唱着古老的赞歌，声音里却透出一种令人心碎的悲哀……在那儿，我突然间确信：基督教尤其应该是奴隶们的宗教，他们无法抵抗它，而我却不属于他们」(Weil, 1973/2009, p. 26)。然当时韦依还觉不属于他们，但经历奴隶般的工厂劳动后，韦依显然已经有所领会。

第二次接触则是 1937 年途经义大利那不勒斯。「当我独自待在圣·玛丽亚·德利·安琪儿 (Santa Maria degli Angeli) 那座七世纪罗曼风格的小教堂时，我感到一种无与伦比的纯净。圣弗朗索瓦 (Saint Francis) 曾在这里祈祷。我感到一种强大的力量，生平第一次我跪了下来」(Weil, 1973/2009, p. 26)。第三次接触则是 1938 年。那年 11 月当她头痛病发作时，她背诵着赫伯特 (G. Herbert) 的〈爱〉。原本以为自己是在背诵一首美丽的诗，但韦依不自觉地发现那也是一种祈祷。韦依很明确地表示，当时感觉基督就在她身边，那是比人的存在更为具体确定、真实的存在。韦依一开始难以置信这样的事实，「我一直坚持认为，上帝的存在无法验证，从来没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体验，……我从未读过神秘主义的书……是上帝的慈悲阻止我去读那些书，如此更能证明，这次同祂的不期而遇绝不是我编造的故事」(Weil, 1973/2009, p. 27)。

1941 年 9 月, 韦依毋庸置疑已是基督信仰者, 进行了生平的第一次福音书祈祷, 以古希腊原文背诵〈主祷文〉(〈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九至第十三或〈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第二至第四)。「有的时候我刚刚开始阅读, 就感觉思想似乎从肉体中分离, 来到外部空间中, 没有欲求、意识, 只感到一个新的空间展开了。好像无限的认知空间又让位给第二或第三层次的无限感知力量。……还有的时候, 当我念诵经文时, 基督就会现身, 而且比第一次他在我面前出现时更加真实、动人与清晰」(Weil, 1973/2009, p. 29)。那主祷文的内容中, 有来世彼岸的「愿上帝的天国降临」, 而紧接在后的是现世此岸的「愿上帝的旨意如像在天堂般在尘世得以实现」。而当韦依背诵这内容时, 这天国与尘世的均衡移动, 正是她一生思想的真实写照。¹³

¹³ 韦依别无求的纯粹性, 让接触她思想的人, 会有一种接近无限宽广的宗教启发。她甚至鼓励旁人也鼓励着自己, 不要因为对社会的忧虑, 而让自己失去对生命快乐的追求。写于 1942 年, 几乎是她精神自传的寓言〈超自然真实绪言〉(Prologue à la connaissance surnaturelle): 其中, 一方面感受到神秘的神恩, 神恩让她看见整个城市(尘世)以及有酒与面包的阁楼舒适享受; 另一方面也体认到生命的重负: 「我的位置不在那座阁楼上。我的位置在任何地方, 一间黑牢房, 一间摆满小古玩和红色长毛玩意的中产阶级沙龙, 一间车站候车室。任何地方, 却不在那座阁楼上。」这篇寓言的全文如下, 主要参考吴雅凌的法文直译(吴雅凌译, 2012, 页 1-2); 另外, 英译则参考(Weil, 2004, p. 638-639)。「他走进我的房间, 说: 『不幸的人哪, 你一无所知。跟我走吧, 我要给你, 你意想不到的教诲。』我跟着他走。他带我进一座教堂。教堂新而丑陋。他引我到祭台前, 说: 『跪下!』我说: 『我未受洗。』他说: 『跪下, 在这个爱的所在前, 就像在真理的所在前。』我照做了。他领我离开, 爬上一座阁楼, 从阁楼打开的窗, 看得见整个城市, 几个木头的脚手架, 船舶在河岸卸货。他令我坐下。只我们两个。他说话。偶而有人进来, 加入谈话, 又离开。不再是冬天。春天还没有来。树上的枝桠光秃着, 尚未发芽, 空气冷冽, 阳光充足。太阳升起, 闪耀, 又消隐, 星月从窗口进来。之后又是一个黎明。有时, 他停下说话, 从橱柜取出面包, 我们一起吃。那面包真正有面包的滋味。我再没有尝到那滋味。他为我倒葡萄酒, 也为自己倒了。那酒有阳光的滋味, 有这座城邦所在的大地滋味。有时, 我们躺在阁楼的地板上, 温存的睡眠降临在我身上。不久, 我醒来, 饮着日光。他答应给我一个教诲, 但他什么也没教。我们谈论各种话题, 断断续续, 像两个老友。有一天, 他对我说: 『现在, 走吧。』我跪下, 抱住他的腿, 求他莫赶我走。但他把我推到楼梯口。我下了楼, 懵懂, 心都碎了。我走在街上。我意识到自己根本找不到那所房子。我没有尝试找到它。我心想, 那人来找我是个错误。我的位置不在那座阁楼上。我的位置在任何地方, 一间黑牢房, 一间摆满小古玩和红色长毛玩意的中产阶级沙龙, 一间车站候车室。任何地方, 却不在那座阁楼上。有时, 我忍不住对自己重复他说过的一些话, 带着恐惧和悔恨。如何证明我准确无误地记住了呢? 他不在旁边, 没有人告诉我。我知道, 他不爱我。他怎么可能爱我? 然而, 在我内心深处, 在我身上潜伏的某一点, 时时因恐惧而战栗, 一边忍不住想:

原本韦依并没有要将自己的神秘体验对他人诉说，是在布思盖（J. Bousquet）的信件询问下首度透露；然后隔了两天后，在写给贝兰的精神自传书信里完整陈述。

三、如何从人类困境走向神性完美

在那危机与战乱年代，韦依始终关注的是审视我们文明的各种基础。在她看来，几乎每个古代文明都有其各自的属灵启示，虽然说法不一，但却都指向某种超自然的真实。而整个古希腊文明的超自然真实核心，即是在感知人类困境后，希望搭建走向神性完美的桥梁。而在福音书里，则是确认现实力量王国之后，透过祈祷、救赎，甚至如耶稣走向十字架的过程里，将有限经验指向无限超验。

韦依指出，柏拉图那么多的对话都没有得到确定的结论，而仅仅得出一些矛盾的看法；而康德哲学总括来说是「不可知论」，指出了许多无法消除的矛盾，并且也并呈了这些矛盾。为此韦依认为，矛盾之无可避免，正是超验存在的证据之一。而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忽略超验，正是其关键局限。韦依认为，马克思努力避开某种谬误，却陷入另一种谬误之中，这是所有拒斥超验的人无可避免的困境，因此，认识超验的存在，是一个人领会善的重要基础，这是延续古希腊文明对于人类认知全貌困境的自省。同样在这困境的认知上，萨依德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进一步转述了维科（G. Vico）《新科学》（*The New Science*）所陈述的一段话，「由于人类心智的不确定性，只要它陷入无知的境地，人就把自己当成了万物的尺度」（Said, 2003, p. 11）。

以今天我们面临的新自由主义，其强大且自满的「市场信心」，即使如今已经造成诸多问题，但仍就未改其自视万物尺度，而其实已陷入无知境地的人类认知困境。

也许，归根到底，他爱我。」

我们需要更多的包容与勇气来应对当今现实，正如古希腊、福音书至奥克文明给我们的超验启示一样。事实上，市场上的强者从来就不是绝对强大，而那被忽视的弱者也从来不是绝对永远地弱小；遗憾的是，无论是以上强者或弱者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不知道这一点，只有人们在面临生命有限之际，终究才会恍然大悟这一切。或许，命运将力量赋予一些少数权贵，但自视这样力量为永恒与理所当然，最终在生命结束时，也许才能知晓富贵如浮云且过眼如云烟。而是否，我们可以在生命终点之前，能够尽早地体悟，强者或弱者各自的生命内涵意义。本文认为，这应是韦依念兹在兹的古希腊史诗精神，在当代积极意义之所在。

每个人最终一定会走向彼岸，并且理解此岸力量的终究有限。从而，人们心中油然而生对同类以至各种生命的彼此敬重，并付诸实际行动。这也许是人类感受困境之余，能够走向神性完美的可能之路。韦依一生正是这可能之路的具体而微。

陆、超自然真实的平衡之路

《重负与神恩》(Gravity and Grace) 编辑梯篷，在序言中有一段话是这么形容韦依：「她对民众的爱，对一切压迫的憎恨，都不足以把她归为左派；她对进步的否定和对传统的崇拜，同样不能把她归为右派」(Weil, 1952/2002a, p. xvii)。如果说，韦依给人的一般印象是她对贫苦的农民与劳工大众表达最大的关怀，那应也是充分证实，我们这个世界至今对众多弱势者大多仍是漠不关心，甚至反而常在责难受难者。在她从事政治社会活动时，平衡一向是她行为的基准：「若已知社会在何处失衡，那么就应该尽己所能，在天秤轻的一端，放上自己的砝码，以寻求社会的平衡。虽然这砝码是恶，但是将它用于这方面，人们也许不会玷污自己。然而，应当对平衡有所设想，随时准备着像正义一战胜者营垒的潜逃者一那样，改变自己的位置」(顾嘉琛、杜小真译，1998，页 10)。

于是我们会发现她许多看来奇特，如今终于能够理解的观点。她在捍卫工人的权利时，同时也强调着，老板的某些权利也不应该被剥夺。另外，即

使是第二次大战刚爆发，法国即将被德国占领，韦依也是可怜那些入侵法国的德国士兵是盲从的炮灰。在餐桌上对着父亲说，如果他将降落家里的德国伞兵送至警察局，她无法与父亲继续共进晚餐。韦依真的不吃了，直到父亲允诺不这么做，她才愿继续吃饭。

以韦依平衡观反思当代新自由主义，则金字塔顶端 1% 少数权贵的基本权益，也应全力捍卫。那 1% 少数权贵，由于政治人性使然，失去应有的监督制衡后，实际运作上会使得 99% 多数大众权益受损。我们所应致力的是，思考建立比较完善的制衡体制，让这「失衡」的贫富悬殊、资源分配不均状态，可以得到朝向平衡的改善。不过，那 1% 少数权贵的基本生活必需权益，也应全力捍卫。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要完全取消那 1% 的基本权益是越过基本底线的。那 1% 权贵，对社会也有一定的贡献。我们理应做的是，让这 1% 享受一定的权利之外，也要尽他们应尽的义务。然而眼前的事实却是，新自由主义让这金字塔顶端 1% 少数权贵，拥有权力失衡的状态愈加严重。

要在体制内改变此一失衡状态，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可能。或许，在这样接近绝望的感受下，我们可以理解何以会出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矫枉过正。

在《〈伊利亚特〉，或力量之诗》文字最后，韦依写着「不相信逃避命运、不崇拜力量、不仇恨敌人，以及不轻视不幸的人」是为古希腊的史诗精神。在不仇恨敌人与不轻视不幸的人之间，是一个人应对世界的处世平衡；而在直面命运之时，对现实力量世界的不卑不亢，更是需要超自然勇气。从古希腊、福音书以至奥克文明，韦依看到人们可贵的超自然真实抗衡。韦依思想在面对当今新自由主义的当代意义，笔者尝试转化成以下文字：

不敌视少数权贵、不轻视那些被市场忽略的芸芸众生；在应对倡导提升国际竞争力文化霸权之前，我们虽然知道市场力量的无比强大，但我们却有更坚实的勇气，坚决不去顺服这个市场的力量王国。能够超越人世间的力量王国是艰困的，但就在这困境克服过程中，也许我们才能趋向这接近完美的超自然之爱。

不过，当代文明的人性面貌，在世贸组织主导的资本统治与官僚统治双重夹击下，活生生的人也几乎全面地被当成可计算之物。在提升国民生产毛额、国际竞争力等「量」的大旗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仁慈与宽容等属于「质」的生活内容被弃之如敝屣，而且一日甚过一日。长此以往，正如韦依所担忧的，最终我们都将会失去古希腊史诗精神的最宝贵遗产。

韦依曾在《期待上帝》(*Waiting for God*)书中提及爱斯基摩人的故事。说这个世界刚形成时，大地上有乌鸦想啄食落于地面的豆子，但四周一片漆黑，于是它想：「这世界若有光亮，那啄食起来会有多方便啊！」就在乌鸦这般想的瞬间，世界顿时充满了亮光。韦依继续这样写着：如果真的希望、期待与祈愿，只要继续地如此寄望，那么所持的希望终将得以实现(Weil, 1973/2009, p. 59)。从期待到寄望希望得以实现，即是韦依所说的包括古希腊等众多古文明的属灵超自然启示。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最黑暗时代里，韦依从自己的劳动到义务宣言，以及战地培训计画到宗教的超验经历，向我们揭示了古希腊史诗精神的超自然意志对抗。如今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力量」王国，虽知超越现实是艰困的，但就在这执意穿越人类困境抵达神性完美的信念过程中，或许我们多少才能体会，那受苦难灵魂的尊严以及其生命体会的厚度。在面对真实世界如此众多的不公不义之时，仍然能够稳步地走向超自然真实的平衡之路。

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当有人告诉韦依的老师阿兰说，他的学生已经过世。阿兰无法相信地说：「这不是真的，她会回来的，是吗」(Cabaud, 1957 / 顾嘉琛、杜小真译, 1997, 页 445)? 或许，我们无法体验韦依曾描述的，基督曾降临她身边一样，期待韦依来到我们身边；但一定会有许多人同意，经历过韦依思想的人，会随时眷恋着她，然后心向往之、有为者亦若是。

参考书目

王苏生、卢起译(2004)。《西蒙娜·韦依》(上、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原书 Petrement, S. [1997]. *La vie de Simone Weil*. Paris, FR: Fayard.)

- 余东译（2014）。《西蒙娜·薇依评传》。桂林：漓江。（原书 Yourgrau, P. [2011]. *Simone Weil*. London, UK: Reaktion Books in the Critical Lives Series.）
- 吴雅凌译（2012）。《柏拉图对话中的神》。北京：华夏。
- 李泽厚（1996a）。《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台北：三民书局。
- 李泽厚（1996b）。《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台北：三民书局。
- 李泽厚（1996c）。《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三民书局。
- 李泽厚（1996d）。《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台北：三民书局。
- 李泽厚（2007）。《美的历程》。台北：三民书局。
- 李泽厚、刘再复（1999）。《告别革命——二十世纪中国对话录》。台北：麦田。
- 易鹏译（2004）。《佛洛伊德与非欧裔》。台北：行人。（原书 Said, E. [2003]. *Freud and non-European*. London, UK: Verso.）
- 孙晓春译（2004）。《天国在你心中》。长春：吉林人民。（原书 Tolstoy, L. [2006]. *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C. Garnett, Trans.]. Mineola, NY: Dover Publications, INC）
- 徐卫翔译（2003）。《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书 Weil, S. [1949]. *L'enracinement: Prélude à une déclaration des devoirs envers l' être humain*. Paris, FR: Gallimard.）
- 陈燊（主编）（2010）。《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十三卷《少年》（上）。石家庄：河北教育。
- 项星耀译（1998）。《往事与随想》（中）。北京：人民文学。
- 黄毓秀、曾珍珍译（1984）。《希腊悲剧》。台北：书林。
- 黄宝生译（1999）。《摩诃婆罗多——毗湿摩篇》。南京：译林。
- 杨翠屏译（1981）。《西蒙·波娃回忆录——一位娴静淑女的自传》。台北：志文。（原书 Beauvoir, S. [1974]. *Memoirs of a dutiful daughter*.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 赵汀阳、德布雷（2014）。《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北京：中信。
- 刘晓波（2006）。《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台北：博大。
- 邓伯宸译（2005）。《绿色全球宣言——让经济回到升斗小民手上》。台北：立绪。（原书 Woodin, M., & Lucas, C. [2004]. *Green alternative to globalisation: A manifesto*. London, UK: Pluto Press.）
- 顾嘉琛、杜小真译（1997）。《信仰与重负——西蒙娜·韦伊传》。北京：北京大学。（原书 Cabaud, J. [1957]. *L'expérience vécue de Simone Weil*. Plon.）
- 顾嘉琛、杜小真译（1998）。《重负与神恩》。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 Beauvoir, S. (1974). *Memoirs of a dutiful daughter*.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 Garcia, F. D., & O. Sola (1997). *Che: Images of a revolutionary*. (R. Whitecross & T. Wells, Trans.). London, UK: Pluto Press.
- Green, P. (1993). *Democracy: Key concepts in critical theory*. Amherst, NY: Humanities Press.
- Lukacs, G. (1950). *Studies in European realism: A sociological survey of the writings of*

- Balzac, Stendhal, Zola, Tolstoy, Gorki and Others.* (E. Bone, Trans.). London, UK: The Merlin Press.
- Petrement, S. (1988). *Simone Weil: A life.* (R. Rosenthal, Trans.). New York, NY: Schocken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6)
- Said, E. (2003). *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eil, S. (1957). *Intimations of christianity among the ancient Greek.* New York, NY: Routledge.
- Weil, S. (1986). *Simone Weil: An anthology.* (S. Miles, Eds.). New York, NY: Grove Press.
- Weil, S. (2001). *Oppression and liberty.* (A. Wills & J. Petrie, Trans.). New York, NY: Routledge Classic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8)
- Weil, S. (2002a). *Gravity and grace.* (E. Crawford & M. von der Ruhr, Trans.). New York, NY: Routledge Classic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2)
- Weil, S. (2002b). *The need for roots.* (A.Wills, Trans.). New York, NY: Routledge Classic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2)
- Weil, S. (2003). *Simone Weil on colonialism: An ethic of the others.* (J. P. Little, Trans.). New York, N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 Weil, S. (2004). *The notebooks of Simone Weil. 2 Vols.* (A.Wills, Trans.). New York, NY: Routledge.
- Weil, S. (2009). *Waiting for God.* (E. Craufurd, Trans.). New York, NY: Harper Perennial Modern Classic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3)

The Contemporary Meaning of Simone Weil's Thoughts: A Reflection about the Neo-Liberalism Rises from Ancient Greek Epic Genius

Herbert Wang*

ABSTRACT

Capital domination of capitalism and bureaucratic domination of socialism together form the neo-liberalism at the end of twentieth century. They have caused democracy to be auctioned, ecological degradation and wealth disparities and other issues, a few into the current world unbearable burden. This article by Simone Weil admired ancient Greek epic genius, re-examines the basis of civilization; and tries to explain, i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tent of the world is close-minded, then the outcome of world change, will only replace the rule of capital by bureaucratic rule, substitute another kind of oppression. From ancient Greece, the Gospel to medieval Oak civilization, Weil believes its common epic spirit is to accept the fact that nothing is sheltered from fate, how never to admire might, or hate the enemy, or to despise sufferers. At her late life, Weil concerned how to act in war but the purity of motive. There was the resurrection light of Weil's thoughts at the dark times when she promoted the front-line nursing squad plan and drafted for a statement of human obligations. Today, in the era of neo-liberalism sweeping the globe, Weil's thoughts may help us fi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transcendental truth.

Keywords: epic genius, neo-liberalism, transcendental truth

*Herbert Wang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ang Gung University.

来去西安： 一名台湾教师在彼岸的教学经历与见闻

余阳洲*

本文引用格式

余阳洲（2015）。〈来去西安：一名台湾教师在彼岸的教学经历与见闻〉。
《传播、文化与政治》，2:137-160。

投稿日期：2015 年 8 月 6 日；通过日期：2015 年 10 月 6 日。

* 作者余阳洲为世新大学新闻系讲师，e-mail: ycyu@cc.shu.edu.tw。

《摘要》

本文是笔者自 2012 年二月以来,和中国大陆西安两所高校的新闻传播科系师生,在专业交流与人际互动方面的实录。根据个人之经历见闻,彼岸的公办与民办高校,无论国家教育资源的分配、学生的背景条件,或是教师的待遇福利,前者都要略胜一筹。这点,和台湾公私立大学之间的差异有些类似。公办的西北大学新闻传播科系学生,日后的发展偏向传统模式——读研究所、考公务员、谋职于媒体或国家 / 民间企业等。民办的欧亚学院,毕业生则多投入商场或试行青创之路,从而反映出教学对接行业的校方政策;虽然学院教育强调专业实务技能,但并未因此忽略基本学理与人文素养,这可以从该校近年来,积极推广「媒体素养」课程及读书会活动等种种努力中得见。

去到西安讲学,笔者的优势在于不会 / 必受制于单一特定意识形态,而能够自在地引述各种学理观点、论及台湾,并辅以多方案例,多数听讲者因此觉得充实有趣。另一方面,或出于生活作息与管理方式不同,更可能是因为在大陆,教育 / 大学学历对促成社会流动还起着相当作用,整体而言,彼岸大学生上课比较认真专注。也因此,身为一名资深且热爱教学的大学老师,笔者近几年往返古城所获得的幸福指数与成就感,甚至超过台北家乡的回馈。

盼望,人生处处都是化雨春风的好所在。

关键词: 比较两岸教育、教学研究、媒体识读 / 素养、新闻传播教育

2011，就在即将步入任教世新新闻系的第 25 个年头，我突然失去那股向来快意奔忙于学校和社区大学、补习班之间的拼劲，以及讲课廿年如一日的动力。教学工作索然无味，告别职场的念头也就不由得升起；后来几经挣扎，在学校董事长成嘉玲博士的支持下，幸运地有了暂时转换环境的机会。

隔春我从桃园机场出发，直飞西安。这一趟彼岸行，不意开启了个人教学生涯的新页。而，从此结下的不解缘，使得我迄今仍如候鸟般，在每年天气回暖、却又忽冷乍热的春假里重返古城，继续未竟的美好旅程。

四年来，笔者在西安的西北大学（西大）新闻传播学院（以下简称 C 院）及欧亚学院（欧亚）的二级分院文化传媒学院（以下简称 O 院），或担任整学期的授课或仅仅数天的讲学，或按表操课或示范教学，或专为学生讲课，或是与同行先进分享教书、带领读书会的经验等等，各式各样的活动不一而足。这段个人生涯里的特殊际遇，确实积累了不少有别于台湾的经历见闻。

本文是笔者这几年与中国大陆两所高校的新闻传播科系师生，在专业交流与人际互动方面的实录。但即使人在现场，我的观察并非长期持续，更称不上全面，因此恐难反映大陆新闻传播教育的完整图像。所以，我于今春针对 C 院和 O 院两校的行政主管、教师，以及同学 / 毕业生进行了数次访谈（见〈表一〉），除藉以充实见闻报告，还可避免个人看法之偏颇独断。

表一：访谈对象和人数*

学校 \ 受访者	行政主管	教师	学生
C 院	无	1	8、9
O 院	1	1（新进）	无

*每次访谈时间大约 1 到 2 小时；主管和教师为笔者分别进行的正式约访，同学们则分属在三次聚会中，不拘形式的聊天。另外，该名新进教师是我 2012 年客座 C 院时教过的研究生，而 C 院学生有五位也曾于同年教过，其余则是来台当交换生，在世新选修过我的课。

壹、C 院与 O 院

历史上，西安是一座承载荣光、人文荟萃的世界级古城。今日西安的发展，经济上虽不如沿海地区或一线城市，但就高等教育而言，仍设有七、八十所各类型高校，数量之多，仅次于北京和上海。¹

历史悠久、校龄超过百年的西北大学，前身为清代陕西大学堂，如今尤其是西北地区学子们向往的高等学府之一。西大于 2007 年与笔者服务的世新大学缔结姊妹校；2012 年春，我伫立在长安新校区的 C 院入门处，抬头仰望那一道高耸宽阔，标示着新闻传播学院，以及辖下各个研究中心和培训基地的乳黄色墙面，不禁为其气势所折服。

正如大陆许多大学的新闻传播院系都具有中文系背景，C 院的源头同样可以溯自西大于 1972 年在汉语言文学系设立的新闻学方向 / 组别。

我在 C 院负责 2011 级两班尚未分系的大一生，和专业型研究生班²的「媒体识读」课程。从 2012 年 2 月 26 日住进太白校区的西大新村，历经二月底开学、上课，直至 7 月 5 日改完作业、缴出期末成绩为止，总共在西大待了四个月又 8 天。无论工作或生活，因为彼此真情至性的付出与回馈，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日子。至今，我依然和院里的领导和老师，以及曾经教过的学生保持联系、多所往来。

至于结缘欧亚学院，则是起于友人邀约参观同样位在长安区，性质类似台湾专技学院或科技大学的该校。不同于西大之古老与气派，站在欧亚正门、朝内望去，只见一方长型喷泉水池，后头矗立着几何造型的钟塔，隔邻则是起伏的小丘绿茵环绕着的图书馆，视野分往左右拉开，路径两旁座落着赭红色的连栋楼房。整体映入眼底，是一幅颇具欧美气息，宛如婚摄景点的校园风光。

¹另有一说，指称武汉高校数量亦超前西安。总之，中国的大专院校种类繁多，除教育部门批准或核备的「普通高校」（尚可分「本科」与「专科」两类）外，还有「军事院校」、「成人高校」等，因此学校数量的统计与比较，难有单一、权威之标准。但无论如何，西安高校的质、量在大陆各城市名列前茅，殆无疑义。

²西大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班依课程设置分学术和专业型两类：前者重研究，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专业，后者偏向实务，为新闻与传播专业。

初见 O 院的几位领导，她 / 他们对我在西大客座表示高度兴趣，并于问我的教学科目后，数度前往 C 院观课。之后，更安排我给 O 院同学一场「如何当个耳聪目明的阅听人——浅谈媒体识读」的演讲。由于理念契合、对话愉快，在笔者学期结束返台后，欧亚的校院领导又邀我于暑假期间重回西安，针对课程设计、教学活动，以及「媒体识读」和读书会的经营等主题，与校内相关单位，包括教务处、通识学院的教师和行政人员，进行心得报告与经验分享。

1995 年建校的欧亚学院，是一所年轻、各方面正努力冲刺的民办高校。如同台湾公私立大学间存在国家经费的差别对待，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一或说政府轻忽、甚至歧视私人兴学的问题—在中国大陆更形严重，以致于民办院校上焉者辛辛苦苦求存，下焉者将立国根本的百年树人大计搞成一场大骗局。³

大陆公办与民办院校的资源差别，也可以从 C 院和 O 院的师生人数比，以及高级职称（副教授和教授）教师所占比例明显看出。根据〈表二〉，在 2015 年上半年，C 院的专 / 全职（full time）教师与学生人数比为 1:22.1，O 院则拉大超过两倍的 1:46.2；再对比高级职称的教师人数，C 院计 19 位，占全职教师的 49%，O 院有 5 人，不及全职教师的五分之一。虽然西大为学术取向的研究型大学，欧亚则是注重实务技能养成的教学型院校，但前述两项指标显示，大陆民办院校的教育 / 学资源确实远远不及公办大学。

³由丹麦 Steps International 公司策划制作，台湾公共电视曾于 2013 年播出之探讨贫穷问题的系列纪录片，其中一部「出路」(Education, Education) 即赤裸裸呈现当前中国教育政策的菁英化、产业化，间接导致不肖人士以欺罔手段办学招生，并造成农村青年不易生存和贫富差距更形恶化。

表二：C 院与 O 院的比较，参照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4-2015 资料）

院校		C 院	O 院	世新新闻传播学院
项目				
属性*		公办（一本，211 工程）	民办（三本）	私立
专业**		新闻、广告、网络传播与新媒体、播音与主持艺术（艺术类）；新闻传播学、新闻与传播、艺术—广播电视（硕士班）	数字出版、新闻、网络与新闻媒体、文化产业管理；新闻采编与制作（专科部）	新闻、口传、公广、广电、传管、资传、图传、数媒；传播所（博士班）
师生人数	全职教师***	39（19，49%）	26（5，19%）	116（68，79%）
	学生	863 = 672（大学）+ 191（硕士班）	1200 = 800（大学）+ 400（专科生）	5388 = 5001（大学）+ 292（硕士）+ 35（博士）

* 大陆各省各地都有许多大专院校，为方便招生作业及增加考生录取机会，因此会根据学校性质与入学考试成绩，让不同的高校分期分批录取学生，形成录取批次：一本的大学为第一批录取，二本、三本的学校即放在第二、第三批进行录取。

「211」工程即「面向 21 世纪、重点建设 100 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是中国于 1990 年代起针对高等教育策划及实行的政策。

**C 院「播音与主持艺术」属于分开招生的艺术类专业；欧亚学院业经陕西省教育部核准，O 院于今（2015）秋将「编辑出版」改为「数字（位）出版」，并增设「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另外，世新的八个系皆为系所（硕士班）合一。

***大陆高校教师分「助教」、「讲师」、「副教授」，以及「教授」四个等级职称，后两者属于必须通过升等评审的「高级职称」；（）括号内为「高级职称」人数及占全体教师比例。

依聘任性质，O 院教师分为「专职」、「签约」，及「兼职」三类；第一类的专职教师类似台湾的专任教师，但其中包含了退休回聘的「顾问」，责任钟点与薪给皆可另行协议。在 2014-2015 期间，O 院有三位届龄退休的教授和副教授转任为持续授课的顾问职，此项不影响原教学品质的职务调整，却能够为校方节缩大约一半的支付薪资。

另值得一提的是，在 O 院专职教师当中，C 院的校友占将近 4 分之一。

另一方面，无论 C 院或 O 院，对我这名台湾老师都十分礼遇。例如，C 院领导们特别整理宿舍、研究室各一供笔者专用，种种硬体设备充分顾及客座教师需求，甚至还细心到订送报纸；O 院领导同样照顾有加，虽然较晚接触，但双方互动频繁、关系良好，再为后续的交流奠定基础。

2012 年的西安行，虽然是笔者首度接触到彼岸新闻传播教育。但在不算长的访学期间，C 院和 O 院师生的真诚与热情，让我印象良深、感怀在心。

贰、教师

前面提及，西大与欧亚的经办性质、兴学目标并非全然相同，所以师资的量与「质」自然有别——单单全职教授与副教授占教师人数比例，C 院就高出 2.6 倍之多。若从提升学校名气与实力的角度设想，这点当然值得 O 院看齐。但对刚起步的民办高校而言，要营造岁月堆砌的高度谈何容易？所以，也唯有踏实向前，配合环境与时代的需求，才能在生存竞争中占一席之地。

针对师资，我曾于访谈中向 C 院毕业的 O 院行政主管提问「如果有机会向母校挖角三位老师，您会邀谁？为什么？」。受访者未多加思索即回应：

拥有校务管理与新闻传媒业界经验，同时热爱教学的 X 为第一人选；再来是 Z，因为思维灵活创新、注意外界变化，而且非常关心学生，会为同学找实习、推荐工作。最后是科研能力很强的 Y，Y 虽属理论派，但和 Z 对新媒体都很有想法。

由以上人选组合可知，行业接触与关照学生出路是 O 院的优先考虑，但也不至于因此忽略学术面向。受访主管还特别提及，院内的师资政策具有弹性，教学人员并不拘泥于学历——院内即有专业技术好、实践能力强的行政人员被委以行业 / 技术教师的任务，以及参与相关的计画项目。此外，未来校方还会进行校内的职称评定，让实务突出的讲师升等、提高待遇。

C院师资则呈现另一种风貌。笔者在访谈中获悉，任教于西大虽有光环加持，但部分教师因为少了博士学位，⁴或出于同侪间名额有限的评职称竞争，致心生极大不安全感。除了升等与科研 / 提报论文，有时校方教务单位会派出未具备新闻传播背景的人员监课，造成另一种压力，甚至形成不满的源头。

至于O院，既然强调实践 / 务、以培训就业技能为主要目标，拿学位或评职称与否纯属教师个人的生涯规划，并无规定或要求。对比C院，O院的氛围似乎轻松一些，但教师并非因此没有压力；事实上，院内教师一学期平均每周8到12小时的授课量，远多于C院同行。⁵更何况，虽然两校都实施教学评鉴，但O院教师除了行政主管的观课与督导、学生的反应之外，尚需接受来自院内和校级教务单位的「教学」、「授课质量」、「班级学风」等各项考核。

可能是工作比较有自主空间，或许也是一支平均未及40岁（1/3教师才取得硕士学位不久）的教学队伍散发的年轻气息，O院形塑了亲切、具有活力的职场环境，加上大家共处一间大办公室、天天见面，更容易培养出融洽的同侪关系。笔者客居西安时期，除了专业的往来交流，也常受邀和O院

⁴ 西北大学校方规定：1971年1月1日之后出生的教师，评高级职称要拥有博士学位；如果没有，担任讲师8年未能晋升，就必须转任行政职。此一政策虽未严格施行，却也对部分教师形成莫大压力。

就新进教师而言，C院现在都要求拥有博士学位，任职先从助教干起，半年后自动升任讲师，再往后才投入校内竞争，角逐高级职称。因学校性质不同，O院的年轻教师于工作后要经评选才能成为助教，三年后要升等讲师就必须接受职称评定。

⁵ 不同于台湾的学分制（即每周授课钟点数），大陆高校主要采取课时制，其中除了授课课时数外，还包含其他例行工作像是出题、阅卷、指导学生参加竞赛活动或发表作品等，都列入教师的工作量计算。

C院教师每学期的课时量平均约200小时，依职称高低而有所不同：讲师较少，教授和副教授半数的课时，可以指导研究生论文来折算——指导同一位研究生，第一年抵10课时、第二年20、第三年30。所以单就授课量而言，C院教师每周大多在3到6小时之间。至于O院方面，教师每学期的课时量约从128到160个小时，虽然较少，但因无须指导论文，即连全职的正教授每周也必须承担至少8个小时的教学。

就此忆起，C院原本安排我每周授课4小时，后经主动争取，再增加2小时。但即使每周6小时的教学，对笔者而言，经常不及世新授课钟点数的一半。

师长同仁一道爬山游湖，所以讲学的成就感之外，友谊与生活乐趣同样是丰收满载。

相形之下，或也是出自体制差异，我在 C 院比较像一位受到热诚接待的外宾。经常接触的，若非领导即行政人员，至于院内教师，除少数因不期然的机会而得以结识外，其余多位老师，很可惜的，直至学期结束依然十分陌生。⁶

身为教师，我当然对大陆同行的教学感兴趣。但从没有合适的旁听机会，唯一的一次，就只有在教室内先行观看学生（去年刚毕业的 C 院研究生，现为 O 院专职教师）授课，之后由我接续示范教学。而根据访谈结果：整体来说，C 院教师授课比较会依循教科书或事先制作的 PPT，师生双方都看重结果——也就是相当在意分数或成绩；O 院的教学强调案例与实践，教师需要搜集许多实例作为教材，另外则是比较关注学习过程、进度，以促成学生的积极性。

最后，难以免俗的，三不五时我会被问及台湾的大学老师待遇如何，我也同样好奇大陆高校教师的工资。根据〈表三〉，C 院和 O 院两校教师的月薪看来接近，但仔细衡量比较，前者的整体薪资其实高过后者。其间差别，意味着基本工资与学历 / 位的连动，同时也反映先前提及，公办与民办高校的资源不均问题。换从不同角度来看，民办院校的薪给举措如寒暑假工资减半、不发绩效奖金，甚至于减薪等等，其实是将分配不公的结果转嫁到教师身上。这一点，虽也存在于台湾的私校，但情形不若彼岸严重。另一方面，一如（过去）台湾公私立院校教师待遇的差别主要并非薪资，而是退休金给付方式，欧亚教师待遇比不上之西大，更在于后者能以低价配给教职员工宿舍，甚至设有专供员工子女就读的附属中小学等。虽然 O 院近年来也和建商洽谈团购房折扣，为教师职员争取福利，但种种条件确实难和公办高校相提并论。

⁶ C 院曾特地挪出一间办公室作为笔者的研究室，但当时非行政职教师并无个人研究室，也没有共同办公室，所以只在授课、开会，或有其他要事时到校即可。（自 2014 年起，院内担任教学的老师亦配置有数人合用一间的办公室。）在我自行安排定每周两天、共 7 小时的座班时间里，虽然常看得到院领导和行政人员，却很少遇见其他老师。所以，客座西大期间，我难得有机会与姊妹校的老师交流。

表三：两校教师薪资（人民币）比较，参照台湾的大学教师薪资（台币），
2014~2015*

学校 类别	C 院	O 院***	C 院/O 院教师 年薪是人均 年所得倍数	台湾 公立 院校	台湾大学教师 年薪是人均 年所得倍数
月薪**	3000-7000 (约年薪 60%)	同左 (约年薪 70%)	1.C 院教师年薪 约为人均所得的 2.5 至 5.8 倍 2. O 院教师年薪 约为人均所得的 2.3 至 5.0 倍	约 60000- 125000	约 1.4 至 2.9 倍
绩效 / 年 终奖金	约年薪 40%	约年薪 30%		月薪 1.5 倍	

*年均所得的部分，中国大陆系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201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 2014 年人均所得为 20167 元(人民币)；台湾系参照中华民国统计资讯网 (<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37407&CtNode=3564&mp=4>) 所公布的资料，其中 2014 年人均所得为 586532 元(新台币)。表四的所得资料来源亦相同。
**月薪范围从最低到最高职称，金额并未计入年资、行政兼职、超钟点费，以及其他各类津贴。
***寒暑假仅支领半薪，绩效如欠佳也可能没有年终奖金。

参、同学们

我喜爱教书、能教书；一直认为编写教材、设计作业、发想教学方法，以及在课堂上与专注发亮的眼神交会，要比写论文、提升等，或参加研讨会一类的活动有趣、更具成就感许多。

相处一学期，我和部分 C 院学生的熟悉程度可能不输于，甚至还超越她 / 他们认识四年的学校老师。另在 O 院，很可惜的，因为每回授课只有短短 4、5 天，加上每一次听讲的未必是同一批学生，所以跟同学的互动，反倒不如接触老师们之频繁。

态度上，两校学生都十分有礼貌，也确实表现出学生该有的作为——上课迟到的极少，更不可能有人铃响半小时后才进教室，或者下课后才匆匆赶来应付点名。上课时，除少数积习久而不自觉地滑手机的同学外，绝大部分都能专心听讲，罕见有人肆无忌惮地说话、饮食，更没有随意走动、进出教室如入无人之境的浮躁学生。总之，对喜欢教书的我而言，相遇于西安的绝大多数学生，真可以说是老天恩赐。不过，出于一种难以言喻的顾忌——唯恐介入太深，我却又有意识地 and 彼岸同学保持距离。

分开来看，不难想见 C 院学子所展露的菁英特质——基础好、学习力强，积极、自信，长于论述、懂得表现，课余会主动邀访我或询问读书方法、升学事宜（2012 年离开西安迄今，我已为四位 C 院毕业生写过申请国外研究所入学推荐信），乃至闲话人生未来。O 院的同学们，则由于接触浅，我不容易真切感受到她 / 他们的想法和心境，但从安排辅导员⁷坐阵课堂来推断，能够想见校方希望掌握秩序的用心。也的确，每回上课我总会瞧见几张漠然、没反应的脸孔，好像诉说着呆坐教室的无奈，而同样表情似乎不曾在 C 院本科生身上看到过。

不像台湾的许多大学生住家里或自行在校外租屋生活，大陆高校学生一律住校，同步的生活作息加上集体管理，有时令人较难从外表判断个别的生活条件和家庭状况。但客座 C 院时，曾有同学在缴交的作业里夹着纸条，上头为紊乱的排版内容致歉，并解释是因为读大学前，在农村从未操作过印表机。乍见字迹，笔者除了当下觉得揪心，更因为无法体会那种匮乏状况而感到莫名愧疚。

供给孩子上大学，尤其是就读民办 / 私立院校，对中产阶级家庭来说，是一笔不算轻的负担。两相比较，就读 C 院一年人民币 3800 元，O 院则介于 10000 到 11000 元，约为前者的 2.76 倍；相形之下，台湾差距较小，私校学费约为公立 2 倍（〈表四〉）。然而，台湾私校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往往不如就读公立者，但那样雪上加霜的承担，我受限于接触有限且不够深入，并未在 O 院同学的学习活动与生活中明显感受到。

⁷中国大陆高校设有「辅导员」一职，早期工作主要是引领学生的政治思想，目前则多为班级与学生生活的管理考评。

表四：C 院和 O 院学费（人民币）比较，以台湾政大传播学院、
世新新闻传播学院学费（台币）为参照，2014~2015*

学校 费用	C 院	O 院	政大 (公立)	世新 (私立)
一学年	3800	10000-11000	57000	114000
学费是年 均所得%	18.8%	49.5%-54.5%	9.7%	19.4%

*年均所得的资料来源与表三相同。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 C 院虽然开设广播电视课程，但当时校方似乎少有提供器材设备，所以同学们的实务技能，往往是到了实习阶段或在校外工作才有演练的机会。相反的，我倒是经常看到 O 院学生扛摄影机、拎脚架或灯光照明，在学校各类活动场合中边做边学。甚至听 O 院老师说，还有同学自掏腰包配合实践教学、以便精进效果，让作品更臻完备。这对于入门设备犹嫌不足的 C 院师生来说，也许难以想象或理解。

回头来看，O 院强调培养学生的一技之长、重视实践，以期毕业能够顺利接轨职场；而毫无疑问，就业或创业同样是大多数 O 院学生入学前的期望。另方面，我教过、今年毕业的 C 院 2011 级学生当中，有人继续留校读研、有的已知保送北大、人大、厦大等其他各校研究所；升学以外，当然也有同学选择考公务员或进入传媒、企业任职，仅仅一人提及创业——经营一家小咖啡馆。

C 院、O 院两校学生对出路的考量不同：前者大多依循传统模式，后者则呼应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因此比较贴近去年中国高教界提出转向应用型大学的呼吁。就此，O 院主管在受访中也曾经表示：学校已掌握对接行业的方向，因此不像学术型高校，可能要面对调整课程和教学的问题；但这些学校具备综合素质的优势，所以外界用人单位大多还是会优先考虑 211

毕业生，我们送出去的同学，相信专业技能与人际应对绝对有竞争力，未来要能持续发展，其他方面的思维与素养就有待个人努力。

正因为考量到先天不足，欧亚近几年较大幅地翻新课程，陆续增加「批判性思维」、「媒体素养」等校必修、院必修课程，以及由 O 院先行试点，希望能够普及全校的读书会活动。凡此种种，无不在提升学生素质，从而强化全方位的竞争优势。

我在 C 院的授课对象，包括两个共 104 位学生的大一班级，以及 28 人（外加 4 位旁听）的专业研究生班，科目都是「媒体识读」。对校方和学生而言，那是一门全新的课，不少同学连课程名称都未曾听说过。至于 O 院，除了同样有「媒体识读」之外，都是学生已经修过或正在上的课，包括「新闻学」、「新闻伦理」、「传播史」、「传播理论」，都是我长期教授的科目。受限于时间，在 O 院授课比较像专题的系列讲座，学生并非来自同个班级，每节课听讲的同学也未必是固定一批人；此外，院方可能还会安排其他教师观课，或至少让教同课程的老师跟课。

肆、立场与态度

去中国大陆之前，我在世新其实已有面对陆生的教学经验，虽然两岸环境有别，但面对本地或来自彼岸的学生，我自认没有不同的立场与态度。

在世新新闻系同学的耳语中，笔者素以严格有名，而个性使然的作风也难有「因地制宜」的改变。所以，尽管人生地不熟，到了西安，我还是如常宣布课堂上的「禁区」是滑手机，或开笔电、ipad 上网，有人想越雷池一步的话，请干脆离开教室。我还要求旁听生到课必须有始有终，并和其他人一样，按规定缴交作业。最后特别警示同学：来西安的前个学期，我在台湾教四门课、六个班级，平均「挂课率」为 12.21%。⁸总之，我的要求或规定，与 C 院学生的经验值有很大差别。也难怪，几位同学聊起三年前上课，最深

⁸ 「挂课」即重修。制度上，以 C 院为例，学生如果修课成绩未达最低标准，还有一次补考机会；甚至，补考未过，毕业前还有「清考」。据 C 院同学告知，除「高等数学」之类的通识课，专业课如「新闻学」、「传播学」等，少有人会落到重修地步。

刻的印象之一就是严格—无论修课规定、批阅作业，或是评定成绩全都一丝不苟、少有通融。

虽然严格，但对于大多数年轻学子而言，一口港台腔的老师自有其新鲜感、吸引力。（我也同样对京片子、陕西口音，或者不熟悉的中国各地的话语腔调，及其背后的生活经验与故事感到好奇。）所以，我知道必须好好运用此一利基，让学生接受我，喜欢上课，终至达成教学目标。

台湾老师站上彼岸讲台，除了提供另类的生活经验与视角外，还有不会 / 必受制于单一特定意识形态的优势。尤其在新闻传播领域，⁹教师如果能够自在地引介各种学理观点、并辅以多方案例，自然有较大的挥洒空间，相信同学们更会觉得充实有趣。

另一方面，台湾环境开放、传媒发达，大家十分清楚中国官方的禁忌或社会回避的话题。况且，笔者只是一名普通教师，赴西安教书既非传教，也无意宣扬政党理念或参与社会运动，完全清楚红线所在并知道拿捏分寸。因此，并没有像他人揣想的困扰；事实上，我在彼岸讲学从未被干预。¹⁰

最后，为避免同学们在新鲜感消失后，若只剩下失望，可能会「伤及无辜」，我还特别提醒大家——「远来的和尚未必会念经」。毕竟，笔者只是世新三百位教师中的一员，更未必能代表典型的台湾大学教师。

伍、教学

⁹ 继今（2015）年年初，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提出「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后，三月份大陆传出对大学专校和高职的海外原版教材进行调查，其中新闻传播科系被认为是境外教材使用较多的专业之一。

¹⁰ 但校外情况则不同；2012年在西安期间，我曾有两回受邀公开演讲，一次在某家餐厅谈年轻人的价值观，行前即有来自西大校方的关切电话，另一回在书城讨论读书会的经营，事后校方领导告知曾接到请托，希望能劝阻我取消演讲。又，据两次的主办方告知，活动进行时都有公部门的人员到场「旁听」。

这种校内之外，可以解释为中共当局对教育和学术仍保有较多的尊重，但也可能是因为学校环境单纯、相对容易掌控。

往来两岸，我的专业态度和立场虽无二致，但付诸实践总得因应教学环境和对象的不同而有所调整。底下，笔者就教材教法、教科书、作业布置、学习评鉴等逐一说明。

首先，在笔者出发之前，世新校方很周到地先寄赠了 130 多本《批判的媒体识读》给所有上课同学。但因为课本里多属台湾经验，除了摘引基本学理概念，我必须另觅在地实例讲授。所以，同学们固然人手一书，却无须紧随章节内容，再加上不考试，课本似乎变成一本翻读起来更有意思的闲书。有趣的是，后来许多同学告诉我，她 / 他们喜欢该书，是因为对繁体字感到好奇，也觉得（80 磅的模造）纸质、印刷，甚至（铜版纸的）封面及其设计，都胜过大陆同类的教科书。

我住西大新村宿舍，20 坪大的屋内有电视、网路，还有报纸可看，所以完全不会错过生活大小事，也因此得以收集适时适地的授课材料。在各种传媒资讯当中，我比较仰赖《华商报》，¹¹不仅因为个人偏好纸媒，更由于该报内容——尤其影视娱乐新闻，如〈细数穿越剧五大谎言〉 / 〈再提醒：家长要指导孩子观剧〉（李南夏，2012 年 3 月 6 日 a；李南夏，2012 年 3 月 6 日 b）、〈教你识破明星炒作计中计〉（刘凯威，2012 年 3 月 23 日）、《【甄嬛传】生活起居真假难辨 专家解读为网友释疑》（路洁、张锐、张军、董琳，2012 年 4 月 11 日）等，简直就是鲜活的媒体识读教材。而且，在我读来，该报软性新闻的品质，胜过台湾庸俗肤浅的娱乐报导太多！

授课教材除了剪报图档，我还准备有许多影音资料。其实，行前我原本担心彼岸的设备不敷使用需要，以致教学受到影响。结果是杞人忧天，无论电化讲桌、投影机，或是扩音系统，比起在台湾上课时而遭遇电子教学设备罢工、令人为之气结的情况，C 院和 O 院教室内的器材几乎未曾失灵过。这一点，对照我的台湾经验，值得探究与检讨。

¹¹摘引该报电子版介绍：「华商报是陕西地区的一份权威综合类城市生活报，每日发行量超过 66 万份，发行量在西安占 70%，形成了以西安为中心，覆盖全省的媒体。」

笔者于 2012 年首次接触该报，排开行礼如仪的政治新闻和一眼即可看穿的置入性行销版面或专刊不计，该报的公共服务性如注重民生或教育议题、征集读者意见和文章、设置读书版面等做法，要胜过台湾同业许多。可惜的是，受到新科技的冲击和广告量萎缩的影响，《华商报》近几年也跟着缩小版面和减少页数。

不只是「媒体识读」,其他偏理论性的课程如新闻学、传播理论等,笔者也希望采用贴近生活经验的例子来析说学理。譬如,课程论及「新闻框架」(news frame)时,我举出《华商报》在本(2015)年度清明公祭黄帝轩辕陵的活动报导中,特别强调〈万人公祭黄帝 / 台湾原住民青年 首度组团参加公祭〉(任娇,2015年4月5日),对比稍早台湾《自由时报》披露该争议事件的〈原住民主委:黄帝不是原住民祖先〉新闻(2015年3月27日),并征询同学们的意见,分别对先后两篇报导冠以「血浓于水」和「张冠李戴」的框架名称。另外,前央视记者柴静摄制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引发的广泛回响,包括大陆各地抗议雾霾活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两会的回应、反中石油和中石化贪腐等一连串事例,也都可以融入「议程设定」(agenda setting)的教学。

但并非每回备课、讲课都很顺利自在。最大问题来自两岸政经 / 传媒制度及背后意识形态的差异。在台湾上课,我会援引「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或「无国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的评比,来说明各国 / 地新闻自由的情况或检讨台湾形势,可是到了对岸,唯恐大陆学子误会台湾老师自我标榜或进行政治宣传,所以未提排名顺序。再像是介绍「沈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理论,由于大陆的传媒和舆论一向受到严密控制,难以实证优势与歧异意见之消长变化,更因为缺乏自由选举,「西瓜偎大边」的弃保效应或「剪刀开口」现象,也只能让无从体验的学生自行想象。

意识形态伏流,有一次还涌现在C院本科生「媒体识读」的口头报告。记得那位男同学上台指出:教科书中所谓「台湾……向其他国家采购的戏剧节目,则可依进口地点分为日剧、港剧、韩剧和大陆剧」的内容写错了,两岸同属中国,而且「台湾」前面应该冠上「中国」才对!当时我坐在教室前排,隐约觉得背后几十道目光直射过来:报告结束,我缓缓转向全班说明:在我来的地方,人们可以根据个人理念,来看待、描述自己的国家,其他人当然也有表示赞成与否的权利。至于谁对谁错,我认为没有答案、难以论断。

几年来,笔者接触过彼岸不少老师和学生,但该回「揪错」却是至今惟一的意识形态冲撞。不过,我并未从斗争面推想,我认为同学只是单纯反映自己的所学与信念,而非有意向台湾老师示威或占点口头便宜。再从正面想,

在一个不鼓励挑战权威的体制里，虽然事出意外，但教科书内容及授课方式能够促成年轻学子「发声」，终不枉「媒体识读」课程强调思辨与行动的教学目标。

在对岸讲课，关于英文学理名词的中文翻译，我倒是常有被「纠正」的困扰。初抵西安，如同多数台湾老师授课，只要提到西方 / 英美的基本学理概念，或口头讲述或写白板，我经常带出原 / 英文并略加说明。如此，一来扩展听讲者的学习视野，还可藉以领略比较各个中译词内涵与译法的高下。但我感觉，无论在 C 院或 O 院，同学们似乎不太习惯老师上课穿插英文，往后只好减少英文的使用。但两岸翻译有时无法对接，再加上笔者并不熟悉大陆教科书，所以上课光是确认中文译词，像学者「李温」也就是「卢因」(K. Lewin)、传播理论「涵化」等同于「培养」(cultivation)、媒体现象「汇流」亦称「融合」(convergence)等等，就虚耗不少时间力气。更无奈的是，即使强调纯属翻译不同，同学依然惯性地修正我的「中文」——「拉查斯斐」，「应该」是「拉扎斯斐尔德」，学生常这么说。

但彼岸大学生的英语程度未必不佳；大清早的校园，笔者经常遇见同学在操场或廊道上勤读英文，经探询，大多是在为语文检定或升学考试做准备。所以，或许因为实用性低，(新闻传播)专业的英文比较不受重视。再从结构面看，专业课较少接触英文，也可能和教授们较多为国内学成背景有关，再加上中国政府对于进口教科书的敏感与控管。这种种因素，多少构成课堂上以英文语词引介西方传播学理的障碍。

再回到教学，除了讲授，有一次上课我还邀请曾经任职台湾《苹果日报》，刚巧来西安旅游的世新校友现身说法，报告她在知名黄色报刊跑新闻的经历。毫不意外的，除了年轻人更没有距离，这种在台湾 / 世新很普遍的，理论实务相互证成的「协同教学」，¹²也很受彼岸学生欢迎。可惜因为缺乏异地

¹²近年来，世新校方相当支持并鼓励教师邀请相关业者或工作人员来校以共同授课方式，分享实务经验。拿笔者负责的课程为例，无论「媒体识读」或「传播理论」、「新闻学」等，都曾经邀请电视台台长、报刊编辑，或另类媒体工作者到班上讲课，师生一起聆听学习。

人脉，我没能继续安排，但往后向 O 院引介此一教学形式，就快就被采纳并积极推广试行。

陆、作业布置与学习评鉴

学期课的「媒体识读」没有考试，但规定缴交个人的「投书」、「文本评析」、「学习心得分享」，以及分组完成媒体识读的「实践行动」四项作业。

其中，两岸学生对于类似阅读心得、影评或音乐赏析等的「文本评析」，以及生活经验谈的「学习心得分享」都不陌生，但另两项关于报刊投书和维护阅听人权益，大陆确实比不上台湾之稀松平常。尤其针对分组作业，在沟通讨论的过程中，C 院同学经常反映这「不可能」，或那「没办法」、「做不到」，让我感觉生活在对岸，面对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或状况，人们虽想改变，却总是败给强烈的无力感，最后往往是指摘几声，然后视而不见。

也因此，我必须费心说明与示范——分享一篇又一篇世新同学针对社会议题的报章投书，以及同学们的团体行动案例，像是抗议八卦周刊登载情色图文、检举违法的瘦身饮料广告、向政府部门反映戏剧节目的置入性行销问题，或是策划并参与推广台湾本土电影的活动——以便鼓舞彼岸年轻学子公开表达意见、采取行动，在日常生活中落实识读媒体的知能。

到了学期末，细察作业成果，包括向陕西省新闻出版总局检举违法八卦小报《法制时空》、建构药品安全网站、改善穿越剧【宫】的不良影响、宣扬独立报人张季鸾的精神等多样主题与实际行动，其中流露的认真和巧思创意，整体而言，多所超越我熟悉的台湾学生的表现。¹³同学们的努力，还可以见诸一位 C 院同学于笔者结束客座教学返台两个月后，发表在其个人部落格感言：

¹³额外一提，正是笔者将 C 院同学的实践行动带到 O 院的讲座报告，让到场聆听的领导们印象深刻，觉得该项作业布置所蕴含的理念与实务成分具有相当意义，且是其他课程未能提供的。所以，O 院从 2014 年开始设置「媒介素养」专业课程，并且往前追溯，规定 2012 级的新闻专业必须修读。

无数次的讨论，无数次的争辩，无数次的努力，无数次在面
对现实问题的失望，无数次的在所有成员鼓励与激励下重新燃起
希望……从最初的宿舍卧谈，半夜三四点敲定选题，到后来为
把大家聚到一起所做的努力，还有在后期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困
难，课堂宣讲前我们的手忙脚乱，与老师课上课下的交流，以至
到最后终于到了团体作业文本成形前期写这次活动的感受，有一
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夹杂在其中的，还有一些我们这么久通过「媒
体识读」……

啰里吧嗦一堆，只想说，我真的学到了很多，成长了很多。
动手能力也好，实践能力也罢，或者是团体协作能力，无论什么，
我们，所有人，已经获益无穷。

除了向学态度不待言之外，C院本科生多依住宿的寝室来分组，或许因
为组员们的关系更紧密、有默契，致使团体行动产生加乘效果。相反的，修
同一门课的专业研究生，虽然年岁和学习资历俱长，有人却经常旷缺课、作
业打混，甚至于报告相互抄袭。28人当中，我评定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学期总
成绩不到70分——若根据欧美或台湾的学术标准，那样的研究生表现应已
丧失攻读学位的资格。

无论如何，笔者未能和少数研究生一起接近「批判／思辨」与「识读」
的真谛，应该是西安行的一丝遗憾。

至于在O院，因为时间紧凑，根本无暇施行学习成效的验收与评鉴。但
我相信，教学虽无法深入连贯，但得助于院内师长在时段、人员、教具等方
面的调度配合，同学们依然不乏收获，正如一位两年前上过我课的学生最近
这么回应：

在上您的媒体识读课期间我也学到了好多。例如您让我了解
到了成露茜女士的事迹，她成立破报，她办报宗旨是为底层人民
发声！这点也影响到了我，我的毕业作品也想做一份关于老年公

寓的杂志，让社会了解到公寓护工的艰辛与不易，宣扬敬老尊老的传统美德。同时您鼓励我们多尝试，多去做！「去做就好了！」对我来说很是激励，我把之前许多只停留在口头上的事付诸到了行动上！

读同学心声，就像施打了一剂强心针，让意态阑珊、打算弃守工作岗位的老教师，感受到自我的价值与小小成就，从而愿意继续努力奉献。

柒、教学以外

校内的授课和例行活动以外，笔者也经常受邀并利用机会参与西安或陕西各地的讲座和学术交流场合。例如，我曾经到过西安财经学院及座落在白鹿原大学城的行知学院等高校，甚至远赴陕北延安大学介绍「媒体识读」。原已驾轻就熟的主题，再融合台湾经验与在地的传媒文化，我的演讲往往可以引发许多回响，可惜止于单次演说，并不容易深植识读媒体的理念。

我也两度参加陕西省新闻传播教育学会年会。虽然会议主轴应为学术研讨和论文宣读，让我印象深刻的却是，在活动或新闻稿中被凸显的，多属「书记」、「市长」等党官职角色与谈话，学术方面的交流反倒被稀释了一些。

除了学校和学术活动，我也曾应「今日阅读」、「万邦图书」等私企邀请，分享读书经验；接受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节目访谈两岸生活经验，也应邀为《华商报》管理阶层和新闻工作者做专业报告。

笔者客旅西安期间，这些授课以外的多元活动，提供了笔者许多教与学的弥足珍贵的机会。

更值得一提的，初抵西大就有同学来询问读书事宜，而笔者长年在世新担任社团读书会指导老师，并多次应邀讲授读书会的经营，所以一拍即合，当时就在C院组读书会。一学期下来，我和七、八位成员讨论了脍炙人口的经典读物《小王子》、毛姆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以及专业性较强、传播学者 N. Postman 的《通往未来的过去》三本书。但随着客座结束，该读书会没能持续多久便告中断。

后来与 O 院交流，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一所强调技术训练、以培养就业人才为主的大学，竟然对难收立竿见影之效的读书会活动有兴趣。我应邀做了几回经营读书会的报告，才了解校方试图在实务能力与人文素养之间求取平衡——希望学生娴熟科技的同时，不忘开卷有益。正因为身处日趋功利的教育环境，特别有感于校方的设想与用心，终至使我期待另一项普及于世新的理念 / 活动，也能在他乡落实、结果。¹⁴

捌、结语

2012 秋回到世新校园，同事和学生问起客座西安的心得，想了一下，我的答复很简单——「有用，觉得自己有用」。

在台湾的教学型大学从事教职多年，除了执行应用型研究和偶而写些粗浅文章外，教书一直是我的核心活动。教室里，自己的强项并非督促学习者早起、守时、轻声说话、认真听课，或在上课中要求收起手机等，但近年来散漫、无所谓的大学生愈来愈多，确实影响我的专业表现。

飞过台湾海峡，在距离台北 1600 公里处，我遇见许多认真专注、勤学好问的同学，时刻企望老师使出十八般武艺，彼此砥砺学习。于是，我找回逐渐失落的工作成就感，并重温为人师者的幸福。而置身强调就业技能训练的环境中，我为自己熟悉的基本学理及素养课程，依旧在他乡受重视而倍感欣慰。

有幸来去西安，古城情谊让人流连再三。回到台湾，每当遇见用功好学的彼岸学生，不由得怀念西安，就像金黄麦浪让人想起远方的小王子。

但，家终究在此，期盼这里也是化雨春风的好所在。

¹⁴世新为鼓励阅读，自 2001 年起编列经费供教职员购书、进行读书会活动，同时也举办读书会竞赛，颁发奖学金给表现优秀的学生读书会团体。15 年来，笔者担任指导老师的学生社团「思潮社」，每年在竞赛中都获颁特优奖。

今春（2015），我全数回捐一笔欧亚学院给付的费用，在 O 院成立「成露茜奖学奖教项目」，期望在新科技当道的时代，支持并鼓励彼岸年轻学子继续保有阅读习惯。

参考书目

- 《华商报》电子版介绍，取自 <http://hsb.hsw.cn/>
- 任娇（2015 年 4 月 5 日）。〈万人公祭黄帝/台湾原住民青年 首度组团参加公祭〉，《华商报》，A02 版。
- 李南夏（2012 年 3 月 6 日 a）。〈细数穿越剧五大谎言〉，《华商报》，B11 版。
- 李南夏（2012 年 3 月 6 日 b）。〈再提醒：家长要指导孩子观剧〉，《华商报》，B11 版。
- 柴 静（监制、导演）（2015）。穹顶之下【影片】。（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CpvTHzsPdw>）
- 陈彦廷（2015 年 3 月 27 日）。〈原住民主委：黄帝不是原住民祖先〉，《自由时报》，A1 版。
- 路洁、张锐、张军、董琳（2012 年 4 月 11 日）。〈【甄嬛传】生活起居真假难辨 专家解读为网友释疑〉，《华商报》，B13 版。
- 刘凯威（2012 年 3 月 23 日），〈教你识破明星炒作计中计〉。《华商报》，B14 版。

**Journey to Xi'an:
A Taiwanese Journalism Educator's Pedagogy and Teaching
Experiences in China**

Yangchou Yu*

ABSTRACT

In the spring of 2012, I took a temporary leave of absence and flew to China, where I taught at the state-run Northwest University in the ancient city of Xi'an. During my visiting at Northwest, I was invited to give lectures at Eurasia University--a private, higher-education institution also located in the city. This paper presents my professional practices as well as personal observations at the two universities in mainland China. To make cross-school comparisons, my experience as a senior college teacher in Taiwan is also addressed. The contrasts between Northwest and Eurasia show that the former appears to be a notch above the latter in the resources of education,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and the benefits and welfare of the faculty. (Similar inequalities exist in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 addition, most graduates of Northwest would continue their studies in the G-school, tak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or work for state-owned media enterprises, while their counterparts from Eurasia tend to go into business or start an undertaking. Although Eurasia emphasizes professional trainings, it also devotes its education to liberal arts and humanities. For instance, in recent years, the university actively promotes "media literacy" course and extracurricular reading.

As for my teaching and lectures at the two universities, they have circumvented the marxist-leninist-maoist ideology. As a matter of fact, variou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journalism and instances of Taiwanese media practices introduced in the classes seem to be quite popular. In my view, Chinese students are more conscientious and hardworking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Taiwan. I think that I received greater happiness and accomplished more in Xi'an than back home in Taipei, Taiwan. In all, I believe that every educator wishes that his or her teaching is worthwhile and valuable, just like spring breeze and rain nourishing the earth.

Keywords: comparative educ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media literacy, pedagogy research

* Yangchou Yu is lecturer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Unesco 与 WTO、文化与经济

编辑委员会*

本文引用格式

编辑委员会（2015）。〈Unesco 与 WTO、文化与经济〉，《传播、文化与政治》，2: 161-178。

投稿日期：2015 年 8 月 10 日；通过日期：2015 年 11 月 25 日。

* 《传播、文化与政治》编辑委员会，e-mail: editor.2015ccp@gmail.com。

1993 年 12 月 15 日，起自 1986 年的「贸易暨关税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s on Trades and Tariffs, GATT) 乌拉圭回合之谈判，在巴黎落幕，尽管美方出动了包括柯林顿总统与中央情报局的游说与刺探消息(李欣、盛希、李漫江、周南译，2001，页 1-6)，各方还是没有达成协议，在厚达两万多页的「服务业总协定书」，并没有关于视听「内容」的决议。

虽然一般将这个状态，拢统称之为「文化免议、文化例外」(cultural exception)，惟这毕竟是悬而未决，不同认知及利益的两造或多造，势必无一敢于、肯于放松。究其实，这个争端不起于当前，而只是冲突更见激烈，早从 1947 年的 GATT 起，其第四条条文就对「电影」的贸易作了特殊的规范，其部分文字是：

任一缔约国如对已冲洗电影片制定或维持国内数量之管制法规，该项管制应以放映配额之方式为之。

放映配额得就一年以上之特定期间内，在各种不同来源之所有影片实际利用之营业放映时间之总额内，画出专供国产影片实际利用之营业放映之最低比例，此项放映配额，应以每一电影院每年或其等量之放映时间为计算之基础(《关税及贸易总协定》，1994，第四条)。

第四条是 GATT 贸易自由化的一个例外，据此，专供国产影片放映的时间，甚至可能可以高达 100%，如果签约国在 1947 年 4 月 10 日放映的影片，全部是国产，且日后坚持不另放映外国影片。该规定反映了当时主要签约国的妥协实况，因为欧洲各国因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冲击，影业萧条，美国则顺势兴起，战后即取代了法国，成为世界影业中心，因此从 1920 年代中后期起，德英法义等国就相继祭出「配额政策」¹，试图挽救本国电影业。1947

¹ 其后，到了 1960 年代，随着美国往欧洲投资拍片的盛行，以及各国映演业者的利益与配额所要屏障的制片利益有所冲突，配额制度的效果慢慢减少，一个以欧洲为主，共 18 国所执行之影片配额史的简便来源，可参见下列网址(上网日期：2015 年 8 月 13 日，取自 http://www.terramedia.co.uk/media/film/quotas_and_levies.htm)。

年底签订，次（1948）年生效的 GATT，其第四条不但是事后追认这个事实，也是要让未来预留政策空间。

当年，电视尚属新兴产业，第四条萤幕配额的「萤幕」一般也就只能是、只会是指涉「电影院」的萤幕。到了电视繁盛之后，人们前往电影院看视听节目的频次减少了，先是无綫、继之是有綫与卫星电视，以及录影带、影碟等各种流通管道及观看器材，晚近则延伸到了个人与平板电脑及手机。表面上，这些新的放映机制，其重要性超过了电影院萤幕对于视听文化的冲击，但不宜忘却的是，电影院这个作为最上层的流放头端，若其票房高，依旧可以决定影片在后续流放节点的价格。是以，在视听市场进入分众，乃至于零散化的年代，最热门最畅销的若干视听产品，仍然会占有该产品市场的绝大份額（比如，参考许恬宁译[2014]）。此时，假使当年的立法旨意，是在考虑文化的外部性效应（对文化认同与政治及社会的长期影响），而萤幕配额的用意，是要让各社会的（影音）文化工作者，都能自由表述，都能以自己身处的社会所提供的资源，作为社会纪录之用、作为美学或其他方方面面的表述及尝试的手段之一，那么，「萤幕」的内涵就有与时俱进的需要，至少应该包括「电视」萤幕。²退一步言，若是拘泥于文字，英文的 screen 仅限于「戏院萤幕」；法文的 ecran 则可用于戏院的萤幕 grand ecran，同时也能用于电视的萤幕 petit ecran（Cahn & Schimmel, 1997, p. 289, note 53）。

语言的差异是否赋予法语系国家更大的空间，使其在论证「文化例外」时，得以径自援引 GATT 第四条，固然是个有趣的问题。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其实早在 1961 至 1964 年间，已经三度在贸易谈判中提出「萤幕」能否适用于电视之争，参与辩论的国家也意见不一，惟美国当时的文字是这么说的，「如果某个政府立法保障国内自制节目比率，它亦应提供『合理的』比

² 许多国家的民众收看传统电视的时间已在减少，反之，通过有綫与无线网路的影音频道及串流功能，在电脑或手机介面接触视听节目的频次，是在增加。惟这只是说设定配额的困难增加，却并不能据此论称，配额所要维护的本地及非商业的表意文化，不再需要，仅能说传统接收面的配额规范之外，其他措施更显必要。因此，美国最积极想要区分新媒体与传统视听媒体，用意就在前者若无法自由化，后者应该仍要自由化，但对这个立场，欧盟等多数国家不必然接受（Hanania & Fabri, 2014, pp.497-500）。

率 (reasonable access) 让其国内电视台播放外国节目, 并且应对较佳的收视时段之外国节目比率, 『给予适当重视』。(Filipek, 1992, p. 341)。

这就是说, 以现在的眼光视之, 美国在 1960 年代要求的是, 让她的节目有些保障, 得以「合理」地展现于西欧观众眼前, 这个语气显然不若当今的「跋扈」: 电视节目如同任何商品, 因此要让实现主要是资本利益的产品, 得以自由流通、进入他国市场, 适用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

美国谈判代表的低姿态, 可能反映两项事实。一是视听贸易对于美国, 当年的重要性, 远不如现在。二是 1980 年代中期以前, 除了英国, 西欧国家的所有电视均为国家垄断, 一来节目需求有限, 各国自给自足的水平比较高, 再者, 这些公营机构的节目几乎多数自制, 外购量较少, 遑论进口, 即便英国的私有频道「独立电视网」, 亦复如是。

1984 年, 德国私人地方有线电视台取得合法地位。1985 年, 法国社会党政府将最受欢迎的 TF1 公营电视网私有化 (30 年来, 仍是西欧唯一将公有电视私有化的例子), 私人资本投入于电视的水闸, 于焉开启。同时, 欧洲共同体 (欧洲联盟的前身) 执委会在 1985 年发表白皮书, 为营造欧洲市场而准备, 它的 279 项规划案, 包括了 1989 年 10 月 3 日首度施行的《电视无疆界指令》³, 目的正是在创设一个视听的欧洲市场。与此几乎并行, 在《指令》通过之前四个多月, 欧盟 12 个国家与欧洲另 13 个国家, 总计 25 国也通过了《跨欧洲电视公约》。虽然《公约》的法律效力弱于「指令」, 按前述两份法律文件的重要内容相同, 都是要求签署国采取合适手段 (where applicable) 播放至少 50% 的「欧洲作品」。不过, 法律效果的强弱勿论, 它们对于美国所推动的视听自由贸易, 都是障碍, 于是美国随即在 1989 年 9 月 1 日与 10 月, 分别要求前两项法律文件的签约国, 与她进行双边会谈。这些国家不愿意遭致各个击破, 她们的回复是, 不急, 一切等 GATT 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 再行商议。

眼见无法分而治之, 美国立即发动另一波攻势, 声称《指令》与《公约》

³ 1997 与 2007 年修订后, 三者于 2010 年统整为《视听媒体服务指令》(the 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Directive, AVMSD; 上网日期: 2015 年 8 月 3 日, 取自 <http://epthinktank.eu/2013/05/19/application-of-the-audiovisual-media-services-directive>)

违反了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而配额规定也不能由电影延伸至电视。美国坚称电视节目附着于特定材质，是一种财货(goods)，而不是服务(services)，因此欧盟的配额作法，不合 GATT 第 11 条的规定（禁止使用关税以外的任何限制方法，包括配额，对贸易设定条件）。

至此，已经有人看出，假使只是坚持财货与服务之分，恐怕无济于事。其一，「服务」的传统定义是「无法储藏、不可触摸、无法长距离转送」，但技术进展已经予以改变，视听节目可以录制也能储存，并可远距传输。其次，乌拉圭回合原本就是要使服务业自由化。假使只是坚持视听产业属于服务范畴，恐怕会难以走脱自由化的命运。这里，坚持文化例外的主张，就得另拟更有效的长久之计了。欧盟虽然确实主张文化例外，但假使视听产品不能自由化，何以同样负载文化内容的书报杂志，就有更大的自由化空间？论者指出，这可能会是一个问题（Filipek, 1992, pp. 356-362）。

不过，这虽是问题，却并没有构成欧美争论的核心，原因也许有二。一是平面传媒涉及文字，不若影像之相对易于为他国阅听人所接受。其次，与前有关，文字使用者绝大部分在本国，他国相类产品若转换为本国文字，成本高而效益较低（亦即本国使用者的人数及接受度，不如外来影音产品）。这个情况在美加同样使用英文的国家，就有不同。

1989 年 1 月 2 日《美加自由贸易协定》(Canada-United States Free Trade Agreement) 的第 2005 条排除「文化产业」(cultural exclusion)，使自由贸易的适用对象，不包括文化品，其第 2012 条并以列举方式，叙明视听与书报杂志均属「文化产业」。这个排除规定同样放入了 1994 年元旦起执行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不过，北美三国没有因为文化排除而有争议，原因可能是美国设定了报复条款，让自己保留了空间，可以在认定美方媒体厂商利益受损时，施展其他对应手段；就此来说，美加自由贸易协定排除文化产品的适用，多少就变成了具文。因此，前述协定在实质上，还不能说是文化例外或排除。

情势如此，想要将文化例外条款放入「服务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f Trade in Services, GATS) 的国家，必须另作努力。

1990 年，乌拉圭回合的代表在 6 月 18 日设置了视听部门工作小组，并于

7 月 28 日展开谈判。其后，欧盟国家采取了三个层次的策略：（1）最佳作法是在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明列「文化排除」（*cultural exclusion*），并且排除贸易报复。据此，欧盟各国就可以径行各自的视听政策，文化不受 GATS 规范。不过，欧盟多数国家担心，这个作法可能危及其他产业，所以没有提出。（2）文化特殊说（*cultural specificity*），1990 年 10 月英国代表布列顿（L. Brittan）提出，欧盟可以强调某些部门有其特殊，应该与其他部门分开看待。建议采取这个途径的人认为，此举可以将视听部门纳入 GATS 的自由化过程，同时仍然可以确保欧洲电影业及欧洲的、各国的及地方文化认同。惟法国认为，虽有特殊之说，却只是暂时措施，一旦文化纳入 GATS 的规范架构，最终仍然可能必须服膺其渐进自由化的规定，因此法国仍然坚持（1）。（3）文化例外说（*cultural exception*），如果采用这个策略，视听部门可望得到如同公卫与国防安全的地位，此时，仍有三种选择。「3.1」是减去法，使最惠国待遇不适用于视听部门，这个选择的缺点是，它依旧属于暂时及阶段性措施，市场开放与国民待遇仍然难以避免；「3.2」则采用打了折扣的「文化排除」，但论者认为，此举还是可能遭致报复；「3.3」在 GATS 最后版本的第 14 条，放入「文化例外」条款，藉此，欧盟可以将 GATT 的三大原则（市场开放、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排除于文化产业之外。

到了 1993 年 10 月 14 日，美欧还是僵持不下，欧盟放弃以上「3.1-3.3」。这就是说，视听部门仍然整合于最后协议之中，但把它「括弧起来」。纳进而没有协议，预定起自 2001 年的多哈（Doha）谈判，还得在 GATS 之下，继续商谈视听文化产业，因为并没有予以「排除」。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之一肯特（Mickey Kantor）对欧盟代表布列顿说，「我们已经同意不同意，但我们的歧见还是存在。」美国要继续攻坚的立场，也具现于 GATS 协商期间的另一位谈判人谢尔夫（Richard Self）的说法，他坚称，「若不能触碰文化，就是让人们可以保护任何东西，因为文化并没有一个普世定义」（Cahn & Schimmel, 1997, p. 310）。事实上，无须等到 2001 年。这是因为，双方仅同意「冻结视听服务的谈判五年」，亦即到了 1998 年，欧美的歧见就要进入另一次的谈判。或者，更精确地说，既然这些文化争议最慢从 1989 年就已经开展，那么，关注者也就不可能等到坐上谈判桌的时候，才作计较。我们理

当能够预期，行动者早就在寻求机会，准备论述与相互结盟，在新一轮的正式谈判前，文化争议已经风云密布；历史并没有突如其来，人类的行径有机可循，有关自由贸易是否适合作为规范文化交往的原则，争论由来已久；如同 GATT 第四条的出现，是对 1920 年代以后欧洲各国现实的追认。

在 1995 年元旦之后，文化贸易争议的国际角力，移转到了两个组织。一端是新近创设的「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WTO)，它隐然认定资本的增殖动力，亦即为了利润而利润，并使其归由私人占有及分配，是善念与善行的根本，立基于这个基础，WTO 的宗旨就在扩大自由贸易的商品项目与地理范围。另一端是早在 1948 年就已诞生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其宗旨是「通过教育、科学、文化与传播，于人之思想中建设和平……在尊重差异和开展对话基础上……促进各国人民……合作」⁴。假设方便资本增殖的自由贸易能够「尊重差异」、促进多元，WTO 与 Unesco 也就可以携手并进；但是，如果视听自由贸易是诱使文化同质化的力量，两个组织与其国际规范也就会出现冲突。

欧盟各国与美国都是国际社会的成员，无不积极使用各自的手段，在 WTO 与 Unesco，以及其他场合发言，各方都会护卫或推进自己的意见与看法。特别是 WTO 在 1995 年开始运作，美国期刊以卫星传送杂志分版进入加拿大，致使两国有 1997 年争议，并在 WTO 仲裁时，加拿大落败，除引发知名公法学者的批评（如 Edwin Baker）（冯建三译，2008，页 326-328），更让主张文化例外的国家，升高戒心。（不过，加拿大在 1999 年另立法律，反而迫使美方协商。至今，为了维护与屏障本国文化工作者的资源与空间，加国仍然持续执行 1999 年的法律及其相应。对于这段过程，论及的文字众多，其中，

⁴全文如后：「该组织自己确定的宏伟目标是：通过教育、科学、文化与传播，于人之思想中建设和平。和平不仅仅是没有冲突。和平意味着：预算用于建设，而不是用来屠戮或破坏；基础设施和服务正常运转，而且不断完善；人民筹划未来宏图；人们摆脱了暴力的创伤和复仇的心理，企盼团结。和平是建立在尊重差异和开展对话基础上的自觉行为。教科文组织期望促成这种对话，促进各国人民进行合作，帮助各国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除了取得物质上的进步，可持续发展还应在不损及后人遗产的前提下，满足人们的各种愿望需求，帮助各国缔造基于人权和民主的和平文化。这一使命既是本组织存在的基础，也是其日常的工作。」上网日期：2006 年 5 月 24 日，取自 <http://typo38.Unesco.org/zh/Unesco-home/organization/about-Unesco-srct.html>

较为详细的记录与分析之文献，可以优先参见张玉国[2005，页 223-258]。

因此，加拿大与法国为首的数十个国家，除了在经贸场合继续坚持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其跨国流通不能适用自由贸易原则之外，另有一个必要的作法，亦即她们必须绕过 WTO，委由其他国际组织规范与协调文化的跨国交流活动。既然 Unesco 早就存在，这些国家也就无须另造新的组织，她们遂以 Unesco 作为号召，使其成为名正言顺的基地。除此之外，她们另外成立跨国的政府，以及非政府的公民组织（如 INCP 与 INCD，见后），强化彼此的沟通与串连意见之用。这个模式是一种分进合击，是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或说交流机制，不是某些论者所认为之多此一举、迭床架屋（如 Acheson & Christopher, 2004）；毕竟，政府机构与 NGO 的关系，很多时候是对立、冲突与收编，但也不能排除，会有共谋与共进志业的时刻。

在经贸谈判方面，GATT 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于 1993 年底、WTO 于 1995 年元旦挂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 并从 1995 年 5 月起，开始「多边投资谈判」(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s, MAI)。其范围虽然较小，但却要求「所有」部门都开放给所有会员国投资（国民待遇原则），任何税赋、现金给付，或其他差别待遇手段以鼓励本地生产，均不容许。这就形同资本自由贸易的原则，要从后门，绕道进入视听产业的大堂。只是这个如意算盘未能凑效，关注此事的人洞若观火，视听专业人及政治人联手，反对 OECD 的立场，并且，示威与抗议声浪太大，使得 MAI 整个翻了船，「OECD……以推动投资自由化为为议题的会议，由于法国抵制，20 日匆匆落幕」〈多边投资协议 OECD 年底讨论〉(1998 年 10 月 22 日)。OECD 推动三年多，一事无成，但「相关议论结晶了、延伸到了，并滋润了外交与公共的辩论」(Frau-Meigs, 2002, p.6)

OECD 的 MAI 会议之后，过了一年，就是 WTO 两年一次的部长会议，即将在 1999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3 日，首次在美国（西雅图）举行。该次部长会议登场前一个月，法国成功地劝使欧盟协同行动，准备将「文化例外」的内容具体化(陈希林, 1999 年 11 月 16 日; 另见 Graber, 2004, p.170, note 13)，使各会员国得以在保持本土文化特性的诉求下，自行制定影像、声音等文化

产品输入策略，免于自由贸易协定的约束。⁵法国甚至谴责克罗地亚（Croatia），为只求进入 WTO，以致姿态过低，开放太多领域给自由贸易（含影音等文化产业）。当时的法国，虽然左右共治，惟就文化例外一事，双方意见合一；同时，加拿大贸易部长也建议，由于文化产业不可等同于普通商品，因此「文化产业……干脆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规范算了。」其后，众所周知，在全球众多非政府组织、社运团体强力杯葛下，西雅图之会无功而返，不但主张自由贸易的人铩羽而归，法国领衔的「文化例外」想要入列的方案，同样没有机会提出，这就使人无从知悉，如果当时得以提出，是否能够成案、能否通过（Torrent, 2002）。

在前述折冲下，欧美的视听跨国文化流通，在这段期间有了相应的变化。从 1995 年起，欧盟各国的电影产量增加，至 2001 年达 625 部，美国电影占欧盟各国票房，从 80% 减少至 64%，欧盟各国的本国电影之票房平均占有率达 32%（Frau-Meigs, 2002）。西班牙电视播放美国节目的时数，从 1996 至 2002 年减少 26%，德国与义大利减少 17% 与 9%。欧盟希望各成员国的电视，要尽量制播欧盟节目至少 40%（50%）⁶，实际上 20 多个成员国的平均成绩是 62%，并且，外来（美国）节目大多不在黄金时段播放，20 多年前【朱门恩怨】（Dynasty）引领的风潮不再。CNN 的国际频道在 1996 年有 70% 美国内容，到了 2001 年是 8%，维康（Viacom）公司的 MTV 海外频道的内容，日趋以就地取材为主（“Anti-Americanism and Television”, 2003, April 5）。

2001 年（11 月）也是多哈（Doha）回合谈判开始的时候。当时，一般预料坎昆（Cancun）部长会议（2003 年 9 月 10 日起）应该会谈文化产业，惟事件的进展是，不仅没有谈，且该会因所谓的新加坡议题，并没有达成任何协定。到了 2006 年 7 月底，自由贸易的进程中断，虽然各国的差异，主要是涉及农业补贴。惟这个主要矛盾既然先行爆发，文化冲突也就无须出场，任由各国自理（视听）文化政策的现况，也就维持。事实上，WTO 的正式

⁵ 不过，国家政策也可能主动接受自由贸易，开放本地市场给视听资本流动，因此文化例外的国际效果，不必然是排除自由贸易，如同民族自决不一定主张独立，也可能主张与他国合并。同理，文化多元性的诉求若遭误用，亦有可能沦为商品切割市场的依据（Albro, 2005）。

⁶ 这里所引出处写 40%，疑为 50% 之笔误。

网站说,「视听服务是 WTO 成员最少承诺的部门……并且承诺的部分在电影相关的服务,远多于在广播与电视相关的服务。再者,这个部门的特色还在于,很多成员即便承诺,也有高比例是采取不承诺最惠国待遇……这经常与电影合制有关。」⁷作为总体协定的 WTO 谈判之外,另有更多的区域经贸等协定,在 WTO 激发下,也纷纷展开,这类协定在 1980 年仅有 20 个,1990 年是 30 个,1994 约有 50 个,其后数量增加快速,至 2015 年中期,WTO 登记有案的区域协定数量仍在运作者已达 406 个,此外,登记但没有运作者,另有 206 个。⁸

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协定中,尚在进行、也就还没于 WTO 登记,但若达成,将是全球最大规模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则再次于法国坚持下,〈美欧自贸协定 影音产业先不谈〉(2013 年 6 月 16 日)。除了继续凸显文化例外,法国还另加码,不但坚持各国可以继续补助本国影音作品,更是主张各国有权将规范延伸至网际网路,并对从电脑至手机等相关设施与硬体课税。欧盟 13 国文化部长与欧洲议会起而响应,美国导演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亦予支持,德国导演温德斯(Win Wenders)则说,若无文化例外,形同「焚书、关闭博物馆……也重新盖起了柏林围墙。」反对法国立场的人则语带讽刺,批评他们简直是在呼应《战后欧洲史》作者贾德(Tony Judt)的说法:「『文化』是公共生活的最后一块重要领域,民族国家而不是欧洲联盟或私人企业,可以扮演几乎是垄断的提供者之独特角色。」(“*L'exception Francaise*”, 2013, June 15) 虽然有人认为怪异,但视听部门在经贸自由化的谈判中,仍然保有「最低层次的承诺,在 1994 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论至今,(译按:二十年来,)变化很少……尽管传媒景观业已完全改观……」(Burri, 2014, p.488)

WTO 与区域经贸协定的目标,是要将影音等文化产业纳进接受资本支配的自由贸易之航程,但中途遇挫,并不顺利。与此相对,Unesco 及相关社团

⁷ 上网日期:2015 年 8 月 3 日,取自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serv_e/audiovisual_e/audiovisual_e.htm, WTO 前网址提供的最新资料是 2009 年 1 月底有 30 个成员在视听部门有部分承诺。

⁸ 上网日期:2015 年 8 月 3 日,取自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region_e/regfac_e.htm

凸显文化例外的进展，倒是有些步伐虽小，仍属稳健的斩获。

在 WTO 正式运作当年（1995），《我们的多元创造力》出炉了。这份重要的文书将近三百页，由 UN 及 Unesco 在 1992 年共组「文化与发展世界委员会」，由甫卸联合国秘书长（1982-1991）职务的培瑞兹（Javier Pérez de Cuéllar）出掌召集人，其任务是就文化与发展之关系，作一「政策」研究。这两个国际组织认为，这是重要的课题，但至今未曾有从全球层级，提出分析与看法。历时三年，培瑞兹在 1995 年 11 月，先后于 UN 与 Unesco 大会提报后印刷成书（Unesco, 1996）。在分析与论证后，该报告书提出十个行动议程，除对准文化遗产、性别人权、种族、联合国本身……等等，另有两个议程聚焦在媒体，其中，与「文化例外」最有关，也是对资本增殖的膨胀动力，该报告提出的对应作法是，「在一国之内，社区与公共广播服务有赖公共补助。如同现有的公共服务资金，其主要部分可以来自本国电视系统本身，国际上，全球商业媒体活动的收益，亦可重新分配，用来补助其他媒体。」（Unesco, 1996, p.278, pp. 271-278）这个见解允称历久弥新。早在 1980 年，环绕 Unesco 而进展的「新世界资讯与传播秩序」（NWICO）之争论，其报告书的结论与建言之一，就是「若要扩张传播系统，优先顺位应该给予非商业形式的大众传播」，以及「或可提供多种公共基金，作为前述目标之用。」（Unesco, 1980, p.260，亦可见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第二编译室译，1981，页 358）

正是在这份报告，Unesco 第一次论述「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是最重要的全球公共财，却备受权全球化的压力」。在其促成下，Unesco 再有两次「世界文化报告」（1998 与 2000 年），其中后一本有关世杰（2002）等人译本，同时也促成《斯德哥尔摩纲领》的提出，聚焦在文化政策。（Wouters & Vidal, 2007, p.161）正因为《我们的多元创造力》这份报告具有这个份量，张玉国译（2006）遂特别予以侈译。

《我们的多元创造力》出版约莫两年之后，由 Unesco 赞助，许多国家的文化部长假借斯德哥尔摩，于 1998 年 3 月举办了「服膺发展之文化政策政府会议」，再次提出行动方案，发表《斯德哥尔摩纲领》，得到 140 个国家的支持，再次强调签署国应该「考量提供公共服务的收音机与电视，提振社区的、语言的及弱势的服务内容」、「采行或强化扶持媒体多元表现及表意自由

的方案」(O'Siochru, Girard, & Mahan, 2002, pp.80-81)。会议之后,与会的部份视听专业与社运人齐聚加拿大法语区魁北克省,成立「文化多样联盟」(Coali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CCD);同年稍后,法国、加拿大为首的各国,在渥太华召开了首届的「文化政策国际网络」(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Cultural Policy, INCP)部长会议,其后每年至 2009 年均有所谓部长会议的举行(参见〈表一〉)。

从一开始,Unesco 以及美国⁹均派员参加这个年度会议。视听专业与社运份子没有缺席,原因或许是出于官方 INCP 的邀请,有意以他们作为奥援,使文化部长对美交涉文化例外时,正当性与所获背书的能量,均能提高;或者,出于这些 NGO 积极人士的主动要求与压力;或二者兼而有之,显示这些国家的民主政制是已经到了一个水平,业界、社运界与政府是有良性互动的空间。最后,他们在 1999 年组成「文化多样性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Cultural Diversity, INCD),同年也举办了第一次年会,其运作经费部分来自个人或团体成员,但主要预算还是由 INCP 会员国政府编列。他们的任务是与 INCP 合作,草拟与提倡「多元文化的新国际工具」(a New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 on Cultural Diversity, NICD),并且 INCP 亦颇心急,他们深知,假使等待 Unesco 通过公约,其通过日期实无把握(要有 2/3 以上出席会员国同意,且通过后,还得要有一定数量国家的批准与寄存,才算生效),是以 INCP 的建议,不妨让 NICD 单独成立。

这些努力在 2001 年,也就是 WTO 多哈回合谈判开始的同一年,有了初步成果,此即 Unesco 在当年举办的第 31 次大会,通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并「进一步考虑制定一部有关文化多样性的国际法律文件的可行性」。因此,2003 年,Unesco 第 32 次大会以超越往昔的出席层次与水平¹⁰,通过了决议,责成秘书处协调各

⁹ 美国在 1980 年代中期退出 Unesco,却又参加这个会议,并在 2003 年选择重新加入 Unesco,部分原因也许是考虑,与其置身事外而无影响力,不如入内发言表达心声;另一个广为引述的原因是,2001 年 911 事件后,美国更觉有必要与其他文明,能有正式的连带关系。详见本刊下(第三)期张时健专文。

¹⁰ 该年的会期是 9 月 29 日至 10 月 17 日,参与人数创记录,达 3580 人,包括 5 位国家元首、300 位部长级代表都来到巴黎。事实上,2003 年初,已有许多视听专业

方,提出《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 一般简称为 CDC)草案,以供各会员国讨论(梁治平 2005)。至 2005 年 10 月,Unesco 第 33 届大会以 148 个出席国家赞成、日本等 4 国弃权,美国及以色列 2 国反对的优势,顺利通过《公约》。其第六条第二项第八款称,「缔约方在本国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特殊情况和需求,在其境内采取……旨在加强媒体多样性的措施,包括运用公共广播服务。」

表一:文化政策国际网络历年会议资料,1998-2009*

年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9
起	6.29	9.20	9.27	6.24	10.14	10.16	10.14	11.20	11.23	9.20	10.29
迄	6.30	9.21	9.28	6.26	10.16	10.18	10.17	11.23	11.26	9.21	10.30
主办	加拿大	墨西哥	希腊	瑞士	南非	克罗 埃西亚	中国 (上海)	塞内 加尔	巴西	西班牙	罗马 尼亚
人数	NA	46	NA	67	81	94	143	82	NA	128	NA

*2008 年没有开会。

资料来源:至 2009 年整理时,可于 http://www.incp-ripc.org/meetings/index_e.shtml 查询,后已移除,但与该会议及本表上方文字所述的活动有关之材料,至 2015/8/4 仍可在 <http://www.diversite-culturelle.qc.ca/> 查询,该网址并有 1997 年 1 月至 2015 年最近一期(5 月)的「文化表意多样性新闻信」(the Newsletter on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可供读取及订阅。

「公共广播服务」这个概念似乎平淡,但在这里出场,既有突兀,亦见其来有自之处。以言突兀,在整部 CDC 之中,「公共广播服务」(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PSB) 是唯一的「具体制度与机构」之指涉,不仅只是自由与多元等等价值的「概括或抽象宣示」。说其来有自,则是 EU 各成员国,乃至日韩加澳等国,至今其 PSB 都还提供重要的文化资源,并且,诚如法国学者、著有《反思文化例外论》的 B. Gounary 所说,从文化例外到 CDC「的论战主要涉及两类『产品』:电影和音像节目。」(李颖译,2010,页 67)虽说遭受全球商业化走向威胁者,「不是仅有视听部门……然而不争的事实是,

人与社运者齐聚巴黎,向法国总统席拉克请愿与游说,参见蔡筱颖(2003 年 10 月 1 日)与 Riding (2003, February 5)。

绝大多数的讨论迄今都聚焦在影像与音乐。」(Wouters & Vidal, 2007, p.158) 更值得理解的是, 这个强调该有的诠释, 很有可能是与会者希望凸显, 或少是暗示, 在数位汇流年代, 「公共服务广播」的扩大规模, 使其成为「公共服务媒体」, 比起防止产权的过度垄断, 会是更值得重视的诉求与提法, 它既可以增进媒体多样性, 因此是目标本身, 也会是不能或缺的工具, 是防止媒体产权过度集中所滋生的弊端之重要手段。¹¹

依据公约第 29 条, 「第 30 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之日起的 3 个月后」, 也就是 2007 年 3 月 17 日起, 该约已经生效。这里, 可以举个对比, 从中可以窥知多样性公约得到的支持程度, 确实相当强大。《世界人权宣言》在 1948 年完成, 但一直要到 1966 年 12 月 16 日才在联合国大会通过落实其价值的两个公约, 又到了 1976 年 3 月 23 日及 1 月 3 日, 才有足够的国家完成批准至寄存的程序后,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与文化国际公约》两大公约, 才告正式生效。惟中国与美国迄至今(2015)年, 分别还没有签署前者与后者。两项人权公约从宣言, 进至公约, 再到生效, 前后相去将近 30 年, 文化多样性的价值从宣言至公约生效, 6 年完成, 显示国际间就此事务的共识, 确实更高, 即便美国又再次

¹¹ 根据伯尼 (Bernier, 2012, pp.196-197) 的现场笔记: 「第六条所列举的措施清单, 是在后来, 亦即第三与最后一次政府间专家组, 在 2005 年 5 月 25 日至 6 月 3 日集会时, 才予提出……公约草稿最初并没有将媒体多样性放入第六条第二项的措施清单……虽然公约的前言已有提及……『媒体多样性使各种文化表现形式得以在社会中繁荣发展』……在 2004 年 12 月各国送回修正案给公约草拟委员会时, 仅有一个国家清楚表示要在第六条第二项加入媒体多样性……不过, 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公约协商的 NGOs 却很重视媒体多样性…在七份修正书, 有四份清楚建议, 要就这个主题加入一个新的款次。很有意思的是, 除了欧洲广电联盟 (EBU), 所有提出的修正案在谈到媒体多样与多元的措施时, 都有这些字眼『包括防止产权过度集中的措施』。最后通过的修正案是以欧洲联盟与瑞士的提案作为基础, 并没有出现前述字眼, 取而代之的是这些字眼, 『包括运用公共广播服务』。这并不必然是说, 有关提振媒体多样性的手段, 不包括控制产权的过度集中。但很有可能是要表示, 这是不要让人们认为这是最有效的的手段。」根据 CDC 的重要推动人之一伯尼的前述现场笔记, 我们是否可以反推, 既然是以「运用公共广播服务」这个概念, 取代「止产权过度集中的措施」, 而这个概念的主要倡议者又是 PSB (PSM) 强大的欧盟与瑞士国家, 那么, 若说欧盟国家希望藉此凸显, 「运用公共广播服务」是提振媒体多样性的更重要手段, 「防止产权过度集中的措施」固然必要, 却偏向消极, 或许并不是非份的推论。

没有签署文化多样性公约。

因此，国际法专家认为，从 1966 年的《国际文化合作原则宣言》至 2001 年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多年来的文化国际协商之成果，若非至今已默默无闻，就是无法成为有效的法律工具，不足以符合 Unesco 自己所设定的目标。与此对比，2005 年的公约则是「一劳永逸填补了『公共国际法文化目标之空白』」（Wouters & Vidal 2007, p.168）假使放在 WTO 经贸协定的过程予以定位，那么，在文化多样性公约施行五年后出版，最为详细的逐章或逐节解释的文献，钻研甚久的汉（Hahn, 2012, p.66）是这样说的：「美国毫不考虑，断然拒绝了『文化例外』，这就创造了有利的环境，让法国、加拿大与一些其他已开发国家得以结盟，对于美国在视听产业与服务的支配地位，他们无不担心，加入的国家也多是欧洲联盟农业政策改革的主要受益国。因此，公允地说，法国、加拿大与法语系国家联盟及其他国家，相当明显有个主要的动机，就是要在 WTO 之外，创造一个「文化例外」，使其具有 WTO 法规秩序及更长远的效果，正是出于这个动机，最终遂有《公约》的出现。」

法律及其条文，包括国际公约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它是在不同世界观、价值、道德与看法的彰显与辩论之后，取得的暂时性协议，其内容可能模糊，但其成长过程暗藏进步机会。公约并非具文，若有同理心之运用，可以发挥重要的价值，比如，西班牙商业广电业者指控西班牙政府规定其 5% 收入，必须投资于欧洲电影，违反欧洲公约，不当地偏厚了西班牙电影。对此，欧洲法庭裁定西政府未违反规定，并且长篇幅引述甫于 2005 年制订的文化多样性公约（Grant, 2011, pp. 349-350）。CDC 也让欧盟在既有的对外文化交流与协助项目，开展更多与佳勒比海 10 余国家（乃至南韩）的文化合作项目，并能「采取较少的经济考量...在视听合制时，减少进入（译按：他国）市场的念头...而是作为绝佳的手段……刺激艺文交流而不是……提升出口」（Hanania & Fabri, 2014, p.504）。在这类案例，法律文字与言论的力量，不再只是符号，是具体的物质力量。正确的国际公约是迈向正确目标的第一步，虽不充份，却显然必要；同时，由于国际公约的执行有待相应国内法制的调整，那么，这不啻是从另一个层面说明，在全球化或国际化年代，「国家」

的自主与管理空间，仍然与国际机构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参考书目

- 〈多边投资协议 OECD 年底讨论〉（1998 年 10 月 22 日）。《经济日报》，8 版。
- 〈美欧自贸协定 影音产业先不谈〉（2013 年 6 月 16 日）。《联合报》，A14 版。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第二编译室译（1981）。《多种声音·一个世界：朝向更加公正、更加有效的世界情报和交流的新秩序》，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原书 Unesco [1980]. *Many voices, one world: Towards a new, more just and more efficient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report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Problems*. Paris, FR: Unesco.）
- 李欣、盛希、李漫江、周南等译（2001）。《不宣而战—好莱坞 VS 全世界》，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原书 Puttnam, D.[1997].*The undeclared war: The struggle for control of the world's film industry*. London, UK: HarperCollins）
- 李颖译（2010）。《反思文化例外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原书 Gounary, B.[2002]. *Exception culturelle et mondialisation*. Paris, FR. Presses de Sciences Po.）
- 梁治平（2005）。〈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万象》，10: 132-141。
- 许恬宁译（2014）。《超热卖商品的秘密》，台北：大块。（原书：Elberse, A. [2013]. *Blockbusters: Hit-making, risk-taking, and the big business of entertainment*. New York, NY: Henry Holt and Co）
- 陈希林（1999 年 11 月 16 日）。〈防止强势国家藉自由贸易之名吞没本国文化产业 欧盟谈判加入 WTO 决采文化保护原则〉，《中国时报》，11 版。
- 张玉国（2005）。《国家利益与文化政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张玉国译（2006）。《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原书 UNESCO & WCCD [1996]. *Our creative diversity: 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UNESCO Publishing.）
- 冯建三译（2008）。《传媒、市场与民主》。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原书 Baker, E. [2002]. *Media, markets and democracy*.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蔡筱颖（2003 年 10 月 1 日）。〈睽违 19 年 美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时报》，A14 版。
- 关世杰等译（2002）。《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原书 UNESCO.[2000].*World culture report 2000: Cultural diversity, conflict and pluralism*. UNESCO publishing.）
-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1994）。
- Acheson, K., & Christopher, M. (2004). Conven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28, 243-256.
- Albro, R. (2005).Managing culture at Diversity's expense? Thoughts on Unesco's newest

- cultural policy instrument. *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 Law and Society*, 35(3), 247-53.
- Anti-Americanism and television (2003, April 5). *Economist*, 59.
- Bernier, I. (2012). Article 6. rights of parti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In von S. Schorleme & P-T. Stoll (Eds.), *The UNESCO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 Explanatory notes*(pp.179-198). Berlin, DE: Springer.
- Burri, M. (2014).Trade versus culture: The policy of cultural exception and the WTO. In K. Donders, C. Pauwels & J. Loisen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European media policy*(pp.479-492). Hampshire,UK: Palgrave Macmillan.
- Cahn, S., & Schimmel, D. (1997). The cultural exception: Does it exist in GATT and GATS frameworks? How does it affect or is it affected by the agreement on TRIPs? *Cardozo Arts and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15, 281-314.
- Filipek, J.(1992). Culture quotas: The trade controversy over the European community's broadcasting directive. *Stanfor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8(2), 324-370.
- Frau-Meigs, D.(2002).‘Cultural exception’, national policies and globalisation: imperatives in democratisation and promotion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Quaderns (Sep.-Dec.)*,14,3-16.
- Graber, C. B. (2004). Audio-visual policy: The stumbling block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D. Geradin & D. Luff (Eds.), *The WTO and global convergence i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audio-visual services*(pp.165-214).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ant, P.S. (2011). The Unesco conven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 Cultural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ultural products. In R. Mansell & M. Raboy (Eds.),*The handbook of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Policy*(pp.336-351). Malden, MA: Wiley- Blackwell.
- Hahn, M. (2012). Article 1. objectives. In von S. Schorleme & P-T. Stoll (Eds.), *The UNESCO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 Explanatory notes*(pp.63-82). Berlin, DE: Springer.
- Hanania, L.R., & Fabri, H. R. (2014). European media polic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The EU's role in foste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05 Unesco convention. In K. Donders, C. Pauwels & J.oisen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European media policy* (pp.493-508). Hampshire,UK: Palgrave Macmillan.
- L'exception francaise (2013, June 15). *Economist*, 44.
- O'Siochru, S., Girard, B., & Mahan, A. (2002). *Global media governance: A beginner's guide*. Lanham, MD: Rowan & Littlefield.
- Riding, A. (2003, February 5). Filmmakers seek protection from U.S. dominance. *New York Times*, E3.
- Torrent, R. (2002). The “cultural exception”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The basis of the audiovisual policy in Catalonia. *Quaderns*, 14, 17-24.
- Unesco (1980). *Many voices, one world: Towards a new, more just and more efficient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report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Problems*. Paris, FR: Unesco.

· 传播 文化 与政治 · 第二期
2015 年 12 月 页 161-178

Unesco (1996). *Our creative diversity: 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for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Paris, FR: Unesco.

Wouters, J., & Vidal, M. (2007). UNESCO and the promotion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A. A. Yusuf (Ed.). *Standard-Setting at UNESCO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sixtieth anniversary of UNESCO(v.1)*(pp.147-168). Boston, MA: Martinus Nijhoff

「文化例外」与《文化多样性公约》在中国：
从十本年度报告说起
编辑委员会*

本文引用格式

编辑委员会（2015）。〈「文化例外」与《文化多样性公约》在中国：
从十本年度报告说起〉，《传播、文化与政治》，2:179-205。

「国际文化交流」与「国际文化贸易」的目标与机制，并不相同。前者

投稿日期：2015 年 8 月 15 日；通过日期：2015 年 12 月 5 日。

* 《传播、文化与政治》编辑委员会，e-mail: editor.2015ccp@gmail.com。

旨在促进彼此的认知与了解，后者少问内容而以牟利归私为主。二者可能局部重迭，但其相得益彰的成分，按理应当远远小于彼此扞格与冲突的机会。

在中国，明白并作此确认而笔之于书（论文集）¹的第一人，可能是陈晓宁与马庆平，时为 2001 年，中国方当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前夕。

在《广播电视新媒体政策法规研究》这本文集的序言与专文，虽然扼要，陈晓宁与马庆平精确地指出，1995 年 WTO 开始运作那一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适巧」起步，其后再次召集了多回文化问题圆桌会议，其局部重心，就在回应 WTO 因文化而起的相关争论。²到了 1999 年 11 月，WTO 部长会议首次在美国本土，也就是西雅（Seattle）举行时，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 EU）已经早先一个月，亦即 10 月形成了共识，准备在该次会议坚持「文化例外」与「文化多样性」，必须作为 WTO 经贸政策与规则谈判的原则（陈晓宁，2001，页 3；马庆平，2001，页 249-250）。

隔了一年，北京大学的关世杰等人（2002）翻译出版了 Unesco 在 2000 年推出的《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2003 年中央政治局专题讨论了文化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与 Unesco 举办了单日研讨会「文化多样性、发展与全球化」。³大约在这个时期，移居海外前，曾在中央宣传部出版处任职的张玉国前往「渥太华大学加拿大文化研究中心」研习。游学加拿大及返国期间，他在 2002 至 2004 年，陆续就文化例外与文化政策等主题完成专论，稍后并辑录成书，至今仍是汉文类书的重要成果（张玉国，2005, 2006a）；此外，他并翻译 Unesco 前述文化研究会议的第一本报告，并更动书名，以便强调「文化多样性」（张玉国，2006b）。

到了 2004 年 10 月，中国承办第七届「文化政策国际网络」（International

¹ 这是指图书，在期刊文章方面，如本文「附录」（本期页 210-211）所示，1994-2000 年已有 10 篇谈到「文化例外」。

² Unesco 在这段期间完成的相关报告，目录可在下列网址取得（上网日期：2015 年 5 月 24 日）
<http://www.unesco.org/new/en/culture/themes/cultural-diversity/cultural-expressions/programmes/culture-for-development-indicators/resources/key-documents/>

³ 该消息似乎仅见于《民族学报》第 138 期，页 37 的简要报导。

Network on Cultural Policy, INCP)部长会议。这是加拿大等国家从 1998 年起,为了推动文化多样性的国际立法工作,前后接力主办的协商会议;2004 年在上海的场次,参与人数在历届最多(参见本期页 179)。但凑巧的是,弄错事实,误指文化例外已经「衰亡」,并有人照引的文章,同样在当年刊登于《读书》月刊(单万里,2004)。⁴

2005 年 5 月,中国广电总局副局长田进在第二届亚洲媒体峰会,以〈全球化趋势下的广播电视与文化多样性〉⁵为题,发表讲演。2006 年 9 月,田于首届「亚太与欧洲媒体对话会议」,再讲〈传播多元文化 共建和谐世界〉⁶时,特别提及「去年 10 月在巴黎召开的第 33 届联合国教科文大会,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简称 CDC)。几乎与该次讲演的同时,中国通过《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呼应前一年的十一五「建议」,宣示要「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并将「公共文化服务」(第三)列于「文化产业」(第五)之前。⁷

其后,有关文化例外或文化多样性公约的文字,开始增加(王晓德,2007;马冉,2006;梁治平 2005;章建刚,2005;傅谨,2004;赵月枝,2006,2007)。第一篇讨论文化多样性与 WTO 竞合关系的硕士论文(薛狄,2007),亦告出现。

不过,大致说来,是在美国于 2007 年 4 至 10 月之间,主张中国违反为入世所做的市场准入承诺,致使 WTO 据此成立专家组审理之后,⁸文化例外

⁴ 这个错误的说法亦为专家援引,如张塞(2013,页 53)说「文化多样性原则是对『文化例外』的扬弃」。这个认知应该逆反于事实,见本期页 181。

⁵ 上网日期:2008 年 9 月 24 日,取自

<http://www.sarft.gov.cn/articles/2005/05/16/20070910202851520332.html>

⁶ 上网日期:2008 年 9 月 24 日,取自

<http://www.sarft.gov.cn/articles/2006/09/20/20070910202851520698.html>

⁷ 上网日期:2007 年 9 月 4 日,取自

<http://culture.people.com.cn/BIG5/22226/71018/4814170.html>

⁸ 比如,钻研欧洲联盟文化政策的专书未能专章论述文化例外之外,仅有一处提及,却是误认『「文化例外」条款写入』了协定,全书则没有谈及文化多样性宣言或公约。虽然是单一例子,惟或仍可说明,2007 年以前,学者对此议题相对陌生张生

但特别是文化多样性的相关认知与论述，才告明显增加。（参见本文附录，页 201）

2007 至今（2015）年之间，又是另一个巧合。在中国，顺应十一五纲要的《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以及更偏向经济面向的《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研究（报告）》，各自出版了五次，显示「文化例外」与「文化多样性」对于本国产业的意义，在中国已经得到更多人的重视。

浏览这十本出版物之后，以下试着择要，讨论其若干特征。

首先，相较于近十年来，文化产业、广播电视、电影产业……等等「皮书」，逐年印行，相当频繁。与其相较，前述两类报告（或文集）的出版频率较低；当然，亦可反过来说，是一年一皮书的频率太高。

其次，以「公共文化服务」来说，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最大的广播与电视内容服务的公共化，所受注意相当稀少，似乎看电视（无论是通过传统的电视机，或电脑与手机萤幕）与听广播，非关乎文化，并且还有逐年减弱的样子。

第一本「公共文化服务」报告（李景源、陈威，2007），主谈视听服务的文章仍有四篇，分别是〈发挥制作与传播优势 铸造广电公共服务体系〉（李国瑞，2007）、〈当前农村广播影视公共服务建设的基本特征和主要任务〉（杨明品，2007）、〈中国电影公共服务发展报告〉（刘汉文，2007），并有一篇谈〈构筑新闻出版业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全民文化共用〉（郝振省、徐升国，2007）。

到了第二本（李景源、陈威，2009）虽然主谈视听仅剩两篇，但杨明品（2009，页 129）的〈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建设实践与发展模式〉不再行礼如仪，并且不停留于表述文化产品是公共财。杨明品并未照本宣科，而是指陈文化公共财固然同时具有经济、意识形态、社会效益与外部性，但如今已经商业挂帅的中国广电传媒，无法兼顾这些属性。因此，该文指出，中国广电体系的公共财政用于硬体、传输系统的建设，远多于用在广电节目的制作，并且，公共财政所占的无线与有线广电之总收入，在 2007 年只有

祥（2008，页 209）。

「13.3%.....（未来）还会降低...商业经营越来越成为广播电视机构的价值取向.....越来越暴露由市场导向与公共利益导向的冲突和矛盾」。若看最近可以取得的资料，杨明品所说的数字，确实继续降低，至2013年仅有11.7%（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2014，页347）。

到了第三至第五本（于群、李国新，2012；文化部公共文化司，2013；孙逊，2014），所有收录的文章，没有任何一篇的标题出现广播或电视。2013年，中国国务院大部制改革，合并「新闻出版总署」与「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不及于「文化部」（赖锦宏，2013年3月11日），是否显示文化行政机关的职掌内涵，仍然对于价值的取舍与施政重点的协调，会有重大影响，值得研究。不过，文化行政更动之后，可能无法很快扭转窠臼，有个现成的例子，来自台湾。2012年，行政院调整部会，创设执掌涵盖影视的文化部两年之后，国家文艺奖得主（影视戏剧艺术类）、电视导演王小棣的得奖感言，虽然针对台湾，似乎同样可以适用于对岸的政府。她说：

战乱过了六十年了，仍然一面费尽全力的搞不定经济政治，一面轻视文化 尤其是大众文化。到今天上呼下效高喊文创，心里想的还是赶快赚钱，首富和首长为精致艺术可以动辄上亿的盖馆收藏；引入每个平民家庭的电视品质和诸多大众文化，却每每被菁英份子和政府单位看作理当鄙视或保持距离的低俗商业作为（王小棣，2014）。

关于「公共文化服务」，这是政府对内、对国民的责任。其论述的核心就在于探讨，政府财政、传媒经济与公共文化之间，理当有何应然面貌，但这个理论与实践课题，在中国的主流论述似乎日趋遭致架空，至少是视听传媒这个部分的文化，遭致架空。由于回避了影音图文等文化「内容」的特殊性，不肯正视视听内容的供应（生产）与需求（使用、消费），如果仅只是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作为协调之用，并且又使其盈亏责任归由个人或机构承担，那么就会产生一个现象：对于个人与社会，可有可无或甚至有害的影音图文「内容」，很容易就流于超量存在；反之，对于个人及社会可能会有陶冶作

用与正面收益的影音图文「内容」，往往流于生产不足，或是未能得到应该拥有的青睐水平。

「国际文化贸易」则是外向的论述，而如同「外交是内政的延长」，存在于五本「公共文化服务」报告的缺点，也就是不注重对于传媒「内容」的公共、非商业投入与论述，同样显现在「国际文化贸易」的五本（年度）报告（研究）（文化部、北京大学，2011，2012，2014；中央文化企业等，2014；深圳市等，2007）。其中，最明显的地方是，「文化例外」与「文化多样性」这两个概念在国际经贸谈判的过程，是核心争论所在（参见本期编委会另一篇文章，页 167-183），但在前举五本文集、超过七十篇文章，加上附录等资料总计约有两千页的文字，出现「文化例外」与「文化多样性」这两个术语及概念的次数，实属稀少。

首先，是有少数页次，提及这两个术语。其中，部分是中性的，指认其存在但未曾给予评价（深圳市等，2007，页 17-19, 77, 83, 99；文化部、北京大学，2010，页 103）。另有一些则并不恰当，未能合理地认识「文化例外」与「文化多样性」的正面价值，反而可能产生误导，致使读者或许会以为，予以舍弃并无不可。比如，有篇文章在肯认法国与加拿大运用文化例外作为 CCD 的张本，并且取得成效之后，紧接着却又突兀也不无前后矛盾地声称，法国与加拿大「仍然难以阻挡美国文化的入侵」（文化部、北京大学，2012，页 32-33）。作者不是从中发掘，进而论述法、加等国，必须再作改进（包括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是说美国应该戒除咄咄逼人的作为，而是停留在概念的二分，将「保障本国影音工作资源」，对立於（资本的）「自由」竞争，并在引述这两个术语时，显现为对于后者的更为认同，放弃了阐述在不同阶段，二者的关系会有不同。

以南韩作为例子，1994 年以前，该国电影占有的戏院电影的票房，曾经跌至谷底（约 15%），致使好莱坞形同「屋宇四周的高墙，阻绝了视野，紧闭的窗牖，隔离了光线」。（Kim, 1999）其后，电影人发起社会运动，诉求政府落实银幕配额政策，得到响应，遂使南韩电影的占有率从本世纪迄今，大多能超过 50%。唯有到了这个阶段，南韩或许勉强尚能与好莱坞在本国有些竞争，但不是能在国际舞台与其争雄。惟即便如此，电影等韩流视听现象，

随着其制播资本化程度的增加，依旧不可能逃脱内在的生产成本膨胀的危机、南韩电影文化同质于好莱坞风格而渐失阿里郎面貌的困境，以及韩国人除了观看美国及本国电影，很少能有机会观看来自其他国家的电影，视听美学经验的萎缩，在南韩是与他国相同的，距离「尽情享受来自寰宇四海的文化 and 风」的境界，仍很遥远（陈世钦，2007年10月16日；卢开朗，2015；Lee, 2005；Lee, 2006, July）。

再者，在仅有的两篇专论，有一篇是〈自由贸易与文化多样性研究〉（尹昌龙、崔燕，2007），稍见提及二者的可能冲突，惟重点从而更多篇幅是在宣称，「在自由贸易体制中促进文化多样性的战略」是势所必然。这个认知的立场，轻是自相矛盾的修辞，重则是抱薪救火，即便书写者或许兀自认定，此乃正反辩证之统一。另一篇专论尽管并未涉及规范面的探索，仅只是从实践的角度耙梳与立论，反而却有不错的成绩。在检视加拿大期刊案、美国赌博案，以及中国出版品准入市场案的 WTO 仲裁与上诉过程，吴承忠、牟阳（2012）提出了四项实质提醒或建议。

两位作者指出，国际法律或协定文字的法条之外，前言或序言也很重要。这些文字都必须解释与认定，以 CDC 等国际协定或条约为例，各国在进入仲裁过程时，可能必须援引本国相关法律或行政规章，作为呼应或排除国际条约适用的需要。此时，本国的相关立法与行政「目的及其说明」文字，可能会产生有利于或不利于本国的效果，因此，为了因应国际仲裁，各国相关国内法律的新制或修订过程，就得考虑前述状况的存在，预作因应。其次，与前相关，他们强调，「要努力提高中文在 WTO 中的地位，争取能让中文成为普遍性条约的官方语言之一……以自己的母语解释会减少很多误会和障碍……」（页 25）。第三，WTO 的上诉机构仅 7 人组成，审理时轮换，不考虑国籍回避。美欧日在建立这个机制时，通过先行协议，从 1995 年 WTO 挂牌运作伊始，就已经各自拥有 1 人作为上诉专家。施行 17 年之后，才在 2012 由韩人取代日本专家。中国则有张月娇在 2008 年成为上诉成员，2012 年连任。国籍虽然不一定影响案件的审理结果，但是作者考察了上诉成员国籍，发现涉及美国的三个 WTO 文化案例，「无一例外」「有利于美国」，而中美出版品准入案的上诉若干点，中国固然败诉，但依旧有一项对中方有利，这凑

巧是张月娇入上诉机构后所做出的裁定。据此，他们建议中方向 WTO 的上诉专家推荐名单应该增加，目前中方 20 人，美欧各是 30 人与 20 人(页 25-26)。最后，他们认为中方已经做出不利的贸易承诺，甚至超过 WTO 义务，导致中方目前诉讼不利，因此中国在日后签订各种(区域)条约时，应该提高意识。(另参见本文附录，页 204 对张华与张蹇的引述)

第三是「文化统计」的引用与解释，这里以中国电影的出口金额为例。(文化部、北京大学，2012，页 180、190)⁹。2010 与 2011 年，中国电影国内票房是 101.72 与 131.15 亿人民币，相应的电影出口收入是 35.17 与 20.24 亿人民币。对于这四个数字的解释，作者的陈述是负面的，他指中国近 5 年海外电影收入增长 113%，但国内票房增长高达 410%，两相比较，中国电影在海外扩张，慢了许多，因此应该要能更快。若是依照前述数字，中国 2010 与 2011 年的电影外销与内销比例，分别是 34.58% 与 15.43%，¹⁰按理作者应该不是批评，反而可以惊讶于海外与国内票房比例之高，举世可能仅次于美国。毕竟，对照之下，本世纪蔚为寒流说法的南韩，其近年来电影出口量与其国内票房的比例，高低亦仅介于 3.06%-5% 之间(根据丁祈方、曾姝瑜[2012，页 5-7]表格数字换算)。

这里针对 2010 与 2011 年的数字，继续提出两个层次的补充与讨论。

一是数字或其计算，是否失真，¹¹从而前述比例并不正确。比如，根据 WTO 从 2001 年起发布，但到了 2007 年版，才首度开始统计的影音部门(电影、电视与有声出版品)之贸易额(2007 年发布了 2005 年的数字)，其最后一年列有「美国」所有「影音服务」(电影之外，还有电视与有声出版品)的出口额是 2010 年，数字是 145.56 亿美元(WTO, 2012, p. 181)。2011 年(含)起，WTO 的国际贸易统计视听服务表(4.8.1)，美国不再列入(WTO, 2014,

⁹ 另见同出处页 5, 114 (指许多年来，中国的文创出口金额几乎是日韩合计的 10 倍。如 2010 年，中方出口 977.54 亿美元，日本是 58.28 亿而南韩是 39.91 亿美元)。

¹⁰ 2008 年则是 43.41 与 25.28 亿人民币，比例更高达 58.24%，而 2000-2005 年电影贸易都是入超，最低 2 千万而最高 1.35 亿美元，2006 与 2007 两年却能分别出超 2 千万与 1.2 亿美元(梁昭，2013，页 133、140)

¹¹ 另有其他堪疑的数字，如张华(2013，页 1、19、22)虽然注意到「统计数据的可靠性」及国际文化品出口的垄断等问题，却仍两次引述 Unesco，指英美中是 2002 年是世界文化产品出口国的前三名，分别出口 85、76 与 53 亿美元。

p. 179)。然而，依据美国电影公会（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MPAA）所发布的统计数字，单是「电影」，美国电影在海外（不含加拿大）的戏院票房在 2010 年，就有 210 亿美元（MPAA, 2015, p.4），这已经超过 WTO 数字 50% 以上。假使 MPAA 或 WTO 的统计，必有一伪，或者二者皆非，则中国电影票房的计算，很有可能不会没有疑问。

其次，中国电影文化是要「走出去」，还是要「卖出去」？好莱坞以其八十多年的霸权与国际发行网络的建立，显然已经统合二者，走到哪里就可以卖到哪里，原因之一是，表面上因为没有「文化部」，以致显得没有文化政策的美国，其实「不仅有文化政策，而且有极强的、极有效的文化政策...渗透在其各项政策，特别是外交政策之中」，作者并深信读其论述后，「读者会认同我的观点。」（张玉国，2005，页 4；另见 Gounary, 2002 / 李颖译，2010，页 6-7、16、34、44-45、77）。

MPAA 的秘书长任期长，并与美国高层人员交流良好，历来都有「小国务院」称号（Swann, 1991），适足以显示美国政府通过外交，推进好莱坞于他国的积极与共谋程度。中国或任何国家能够学习，应该学习吗？真有能力在模仿或竞争后，占有一席之地吗？特别是假使「尽情享受来自寰宇四海的文化和风」，会是（影音）文化跨国流动所应该承担的任务，那么，好莱坞模式重则窒息当事国的电影，「轻」亦使得当事国与好莱坞在寡占了当事国电影票之房后，必然致使其他各国的电影来源，无缘进入，这个模式不会是值得师法的目标。

以其为师，其实只能进入霸权者设定的游戏规则，为其吸纳与利用，卷入业已形成的霸权秩序，不是另求新局。单是民族主义的诉求，不足以变化好莱坞的霸权，民族主义结合社会主义的诉求，才是予以松动后翻转的契机。在中国入世前夕，陈高桐（2001，页 44）的看法，至今依旧必须参考。他说，中国不宜模仿美国电影产制模式，因为：「恐怕收效比较小。怎么办？就是要应对形式多样化，大片瞅准了也可搞一点，主要的还是弘扬我国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农村文化市场还是很大的……。」入世后，中美电影贸易出现冲突，WTO 仲裁后，电影导演刘苗苗的评论是，大片可以拍摄不宜热衷，中国电影要有相当部分，「走低成本的、现实主义电影的路子，争取

自己的观众」(王晓帆、马欢, 2009 年 8 月 20 日)。

以上两个段落的讨论, 用意在于再次申明与表明, 统计数字的编纂与制作并不仅涉及技术, 在其背后, 另有相应支持的世界观与利益归属(Tremblay 2011)。¹² (另见本文附录, 页 202-203 的补充讨论)

当陈柏福(2014, 页 213)注意到, 虽说负载影视内容的「硬体制造」……等等产品之出, 中国口举世第一, 是美国的两倍以上, 但这些制造业货品「以有形的资源耗费和生态环境破坏为前提, 并不需要太多的智力资源」。这个对比与强调很有意义, 作者将文化产品恰如其份, 分作硬体与软体两类, 确实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但是, 作者其后对于「文化例外」的讨论, 以及据此提出的对策, 仍然仅能说是停留在未经反省, 也尚未反思的民族主义及国家政策的思维(陈柏福, 2014, 页 89-97、159-160、201、207)。

就此来说《国际文化贸易》(韩骏伟、胡晓明, 2009)这本「编着」, 虽非原创, 表现形式亦可改进, 但作为教科书, 已经称职, 其中投入相当篇幅直接谈论文化例外与文多公约, 显示作者有意予以凸显, 尤其是第三章, 这段文字显示深刻的反思, 值得以较长的篇幅, 予以引述:

「如果说全球化在威胁着多样性, 那么也是建立在国家化已经抑制了政治共同体内部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之上……要深刻反思……相应的政治结构之制度性安排是否妨碍着本土化多样性的发育成长, 不仅是指多种文化的共处繁荣, 也包括同一种族内部不同群的文化也获得…切实保障…全球化…在…相对…的专制国家…可能通过缩小国家限制国民的权力范围和深度, 释放小群体和个人的自由空间, 从而可能增加文化的多样性…缓和各种针对『异端』和『边缘』的压力…在一统政治威权和意识形态内部争得若干缝

¹² 黎欧(Leo, 2001)就说, 贫穷国家、富裕国家的贫穷人口, 其文化活动不经市场交换的部分, 未能包括在文化统计; 又如, 若经济不发达, 则制作文化活动的统计, 不会是行政重点。遇有这些情况, 文化活动也就为人低估, 或显得并不存在。其次, 文化统计往往只是数量的计算, 无法知道各文化使用或消费的品质, 比如, 除了知道各种影音消费器材的持有量及其接触时间或收视收听率, 收听与收视质, 少见闻问。

隙伸展和抬头，进而反抗....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回到本土，而在于要什么样的本土化...」（韩骏伟、胡晓明，2009，页 75-77）。

这段引述虽仅概括，并不具体指涉，但显系作者体会中国现状后的论点，因此，作者紧接着不能不触及具的体例子。他们说，当前中国政府执行多时的「国家工程」「政府扶助」只是「苟延残喘」，是以某种「制度性安排」妨碍本土的多样性发展。那么，紧随其后的规范提问，如果不要苟延残喘，那么，中国应该要通过哪些文化与传播的「制度性安排」，实践「当代文化建设的使命」？（韩骏伟、胡晓明，2009，页 79）

在法国学人马特拉出版《文化多元性与全球化》（缪咏华、廖润佩译，2011）之前，陈卫星（2001，页 7、10）对马特拉的引述与阐述，提供了进一步讨论的基础。他说，相较于某种传统作法，文化的商品流通认可了个人的消费权力，因此是种进步，却也同时是「反动...商业利润主导的文化交流背后隐藏着新的权力形式和新的社会整合形态，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意味着社会的终结、社会意识的蒸发、社会意义的缺失.....」。有了这个体认，陈卫星以赞成与力挺的认知，指认了可能的出路之一，在于马特拉所说的「公共服务的思想能够让人相信有利于所有人，公共垄断不服从于商业营利标准.....。」

在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最为人敬重的前主席米诺（Minow, 1961）针对业者讲演，指美利坚商业化的电视环境呈现给美国人的是「苍茫荒原」后五十余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力推该校新闻学院改革，本人是传播公法教授的包林杰在本世纪再写一书，《不羈不绊、健全壮实、广泛开放：论新世纪的自由传媒》，他的见解，与此扣合：「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理出更好的系统，以公共基金兴办传媒.....情势严峻.....来日终将印证.....挹注公共基金.....这是**维系自由传媒的唯一办法。**」（Bollinger, 2010, pp. 131-132）。

事实上，凸显公共体制的意义，正也是《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所特别强调的重点之一。该约第六条说，在举世传媒文化面对商业同质化的压力时，维护媒体多样性的积极措施，就在「运用公共广播服务」（参见本期页 177-178；页 179-180）。

公约通过至今已又十年，传统电视之外，愈来愈多的人也通过个人与平

板电脑至手机萤幕，结合网际网路，使用公共服务广播所已经完成的影音图文。公共体制不但不因为科技日新月异而过时，反之，以其不同的财政方式，较少或没有广告的干扰，较少牟利的要求，以及若有利润则回流内容产制的部分远大于商业媒体，公共服务广播晋身为公共服务「媒体」(public service media, PSM) 的成绩与时俱进，¹³发挥维护并努力提振多样文化表现的努力，理当瞩目，再进民主文化的远景，值得支持(比如，Gulyas & Hammer, 2013; Titley, Horsti & Hultén, 2014; Burri, 2015; Ibarra, Nowak & Kuhn, 2015)。

参考书目

- 丁祈方、曾姝瑜(2012)。〈综观萤幕配额制减半后的韩国电影产业〉，《传播管理学刊》，13(1):1-21。
- 于群、李国新(2012)。《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 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2014)。《中国对外文化贸易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 尹昌龙、崔燕(2007)。〈自由贸易与文化多样性研究〉，深圳市等(编)，《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研究》，页 32-40。广东：深圳。
- 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港澳台办)、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主编)(2011)《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年度报告(2010)》。北京：北京大学。
- 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港澳台办)、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主编)(2012)《中国对外文化贸易报告(2012)》。北京：北京大学。
- 文化部公共文化司、于群与张永新(2013)。《2013 中国公共文化发展报告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制度设计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 文化部公共文化司(2013)。《中国公共文化发展报告：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制度设计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 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2014)。《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年度报告》。北京：北京大学。

¹³[公共事业的再造与诠释](Re-Visionary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ublic Enterprise, RIPE) 这个组织从 2002 年至今，每两年主办一次跨国研讨公共服务传媒的议题(参见 <http://ripeat.org/about-ripe/>)，2014 年双年会后另有国际 PSM 专家调查，预定在 2015 年底发布结果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9muPteWnSWxf3zPOAxfRrjng_IrZshFmNLjFEkash50/viewform)。参加 2014 年会议后，程宗明(2014)撰有报告并可上网取得。

「文化例外」与《文化多样性公约》在中国

- 王小棣(2014)。〈第十八届国家文艺奖得主(2014年)影视戏剧艺术家得奖感言〉。
取自 http://www.ncafroc.org.tw/award-prize.asp?ser_no=109&Prize_year=2014&Prize_no=%A4Q%A4K&prize_file=Prize_feeling
- 王晓帆、马欢(2009年8月20日)。〈中美文化产业WTO争峰始末:中方暂失利 文化市场狼来〉,《时代周报》。取自 <http://finance.ifeng.com/news/industry/20090820/1115847.shtml>
- 王晓德(2007)。〈全球自由贸易框架下的「文化例外」——以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抵制美国文化产品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12:71-77。
- 吴承忠、牟阳(2012)。〈从WTO与「文化例外」看国际文化贸易规则〉,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港澳台办)、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编),《中国对外文化贸易报告(2012)》,页17-28。北京:北京大学。
- 李国瑞(2007)。〈发挥制作与传播优势 铸造广电公共服务体系〉,李景源、陈威(编),《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页141-14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 李景源、陈威(主编)(2007)。《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 李景源、陈威(主编)(2009)。《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 李颖译(2010)。《反思文化例外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原书 Gounary, B.[2002]. *Exception culturelle et mondialisation*. Paris, FR: Presses de Sciences Po.)
- 金旻宣(2012)。〈中日韩内容市场统计数据(2010)〉,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港澳台办)、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编),《中国对外文化贸易报告(2012)》,页402-411。北京:北京大学。
- 孙逊(2014)。《2013年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北京:商务。
- 马冉(2006)。〈浅议文化多样性在WTO中的发展〉,《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7:29-34。
- 马庆平(2001)。〈「文化例外」与有线电视网络的地位〉,收于陈晓宁(2001),《广播电视新媒体政策法规研究》,页247-259。北京:中国法制。
- 郝振省、徐升国(2007)。〈构筑新闻出版业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全民文化共享〉,李景源、陈威(主编),《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页180-19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2014)。《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 张玉国(2005)。《国家利益与文化政策》。广州:广东人民。
- 张玉国(2006a)。《文化产业与政策导论》。北京:高等教育
- 张玉国译(2006b)。《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广州:广东人民。(原书 UNESCO & WCCD [1996]. *Our creative diversity: 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UNESCO Publishing.)
- 张生祥(2008)。《欧盟的文化政策:多样性与同一性的地区统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 张华(2013)。《文化产品国际贸易法律问题研究》。厦门:厦门大学。

- 张蹇(2013)。《国际文化产品贸易法律规制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 郭周明(2014)。《国际分工视角下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研究》。广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 梁治平(2005)。〈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万象》,10:132-141。
- 梁昭(2013)。《文化贸易统计》。北京:中国统计。
- 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国家对外文化贸易理论研究(深圳)基地(主编)(2007)。《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研究》。深圳:海天。
- 章建刚(2005)。〈让资源成为产品—关注《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公约》制定中的问题〉,《文艺研究》,2:121-127。
- 陈世钦(2007年10月16日)。〈批评南韩之光 影评人变公敌〉,《联合报》,A14版。
- 陈柏福(2014)。《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发展研究:基于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视角》。厦门:厦门大学。
- 陈高桐(2001)。〈加入WTO与我国文化及其产业面临的问题和对策〉,刘玉珠、金一伟(编),《WTO与中国文化产业》,页42-51。北京:文化艺术。
- 陈卫星(2001)。〈马特拉的词与物(代译序)〉,收于陈卫星译(2001),《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页1-14。北京:中央编译。(原书 Mattelart, A. [1992]. *La communication-monde: Histoire des idées et des stratégies*. France: La Découverte)
- 陈晓宁(2001)。〈序言〉,陈晓宁(编),《广播电视新媒体政策法规研究》,页1-9。北京:中国法制。
- 冯建三译(2003)。《全球好莱坞》。台北:巨流。(原书: Miller, T., McMurria, J., Maxwell, R., & Wang, T.[2001]. *Global Hollywood*. London, UK: BFI.)
- 傅谨(2004)。〈《文化多样性公约》与中国的国家立场〉,《博览群书》,10:4-9。
- 单万里(2004)。〈法国「文化例外」主张的衰亡〉,《读书》,7:99-106。
- 程宗明(2014)。〈夏末的秋凉·RIPE的震荡 国际眼中的公视得肯定〉。取自 http://info.pts.org.tw/open/paper/2014/doc2014/2014_014.pdf
- 杨明品(2007)。〈当前农村广播影视公共服务建设的基本特征和主要任务〉,李景源、陈威(编),《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页192-20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 杨明品(2009)。〈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建设实践与发展模式〉,李景源、陈威(编),《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页123-13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 裘安曼译(2010)。《文化产品与世界贸易组织》。北京:商务。(原书 Voon, T. [2007]. *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赵月枝(2006)。〈文化产业、市场逻辑和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文化传播理论与实践(上)〉,《新闻大学》,90:1-7。
- 赵月枝(2007)。〈文化产业、市场逻辑和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文化传播理论与实践(下)〉,《新闻大学》,91:56-62。

- 刘建华（2013）。《对外文化贸易研究》。北京：中国书籍。
- 刘汉文（2007）。〈中国电影公共服务发展报告〉，李景源、陈威（编），《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页 201-2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 卢开朗（2015）。〈「韩流后」与「后韩流」之间〉，《新闻学研究》，122: 219-232。
- 赖锦宏（2013年3月11日）。〈「大文化部」未实现 先朝市场化〉，《联合报》，A13版。
- 韩骏伟、胡晓明（2009）。《国际文化贸易》，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 缪咏华、廖润佩译（2011）。《文化多元性与全球化》，台北：麦田。（原书 Mattelart, A [2005]. *Diversite culturelle et mondialisation exception culturelle et mondialisation*. Paris, FR: Reperes）
- 薛狄（2007）。《《文化多样性公约》对 WTO 法律制度的影响》。吉林大学法学硕士论文。
- 关世杰等译（2002）。《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北京：北京大学。（原书 Unesco.[2000]. *World culture report 2000: Cultural diversity, conflict and pluralism*. UNESCO publishing.）
- Bollinger, L.C. (2010). *Uninhibited, robust, and wide-open: A free press for a new centur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urri, M. (2015).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3.0: Legal Design for the Digital Present*. London: Routledge.
- Gulyas, A., & Hammer, F. (Eds.). (2013). *Public service media in the digital ag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castle,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 Hobson, J.A. (1902) *Imperialism: A study*. London, UK: Cosimo.
- Ibarra, K. A., E. Nowak and R. Kuhn. (Eds.). (2015). *Public Service Media in Europe: A Comparative Approach*. Publisher: Routledge.
- Kim, S. (1999). The reasons for maintaining the screen quota. Retrieved 2000, November 5, from http://www./sub2_8.htm
- Lee, J. N. (2006, July). *A study on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an alternative plan of Korean screen quota in Korean film marke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r-Asian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nflict and Peace, Bangkok, Thailand.
- Lee, K. (2005). Assessing and situating the Korean Wave (Hallyu) through a cultural lens. *Asi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9, 5-22.
- Leo, G. L. (2001). Cultural statistics. In R. Towse (Ed.). (2003). *A Handbook of Cultural Economics* (pp.177-182).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 Minow, N. N. (1961). The "Vast Wasteland". In P. Golding & G. Murdock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 (II)* (pp.301-312). Brookfield, VT: Edward Elgar.
- MPA (2006). *U.S. theatrical market: 2005 statistics*. Sherman Oaks, CA: MPAA.
- MPAA (2015). *Theatrical market statistics 2014*. Sherman Oaks, CA: MPAA.
- Swann, P. (1991). The little state department: Hollywood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in the postwar world. *American Studies International*, 29(1), 2-19.
- Titely, G., Horsti, K., & Hultén, G. (Eds.). (2014). *National conversations: Public service media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Europe*. Bristol: Intellect.
- Tremblay, G. (2011). Creative statistics to support creative economy politics. *Media*,

· 传播 文化 与政治 · 第二期
2015 年 12 月 页 179-205

Culture & Society, 33(2), 289-298.

Unesco (1986). *The Unesco framework for cultural statistics*. Unesco publishing. From <http://www.uis.unesco.org/culture/Documents/unesco-fcs-1986-en.pdf>

Unesco (2000). *International flows of selected cultural goods, 1980-98*. From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2/001213/121362Eo.pdf>

Unesco (2005). *International flows of selected cultural goods and services, 1994-2003, defining and capturing the flows of global cultural trade*. From http://www.uis.unesco.org/Library/Documents/culture05_en.pdf

Unesco(2009). *The 2009 Unesco framework for cultural statistics*. From <http://www.uis.unesco.org/culture/Documents/framework-cultural-statistics-culture-2009-en.pdf>

Unesco(2011)。《200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统计框架》。取自 <http://www.uis.unesco.org/Library/Documents/framework-cultural-statistics-culture-2009-chi.pdf>

WTO (2012). *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11*. Geneva, Swiss: WTO.

WTO(2014). *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13*. Geneva, Swiss: WTO.

附录：「文化例外」与「文化多样性公约」的中国硕博 博士与期刊论文统计及其说明

表一：「文化例外」与「文化多样性公约」的中国硕博博士与期刊论文统计

检索关键字	2000~2004		2005-2009		2010-2015		合计
	硕	博	硕	博	硕	博	硕博
文化例外* ¹	五年间并无硕博		6	0	4	2	12
文化多样性(公约)* ²	士论文以文化例外或文化多样性公约为关键词。		2	1	17	2	22
文化例外* ³ (期刊)	1994-2004		2005-2009		2010-2015		合计
合计	21		31		47		99

* 2015/8/29 查询并统计自「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与「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¹ 中国硕士与博士论文讨论「文化例外」的论文一览，见本期页 206。

*² 中国硕士与博士论文讨论「文化多样性公约」的论文一览，见本期页 207。

*³ 中国期刊讨论文「文化例外」的论文一览，见本期页 208-211。

如〈表一〉所示，作为国际论争与角力的「消极工具」，「文化例外」在转换性质，成为「文化多样性」这个「积极价值」的表述、推进与扩大之过程，相关论述在中国也同步增加，最明显是表现在 2010（含）年以后。

其中，又以「文化多样性公约」的学位论文之增加，最为突出。在 2010 以年前，仅有硕士论文 2 篇，其后至今（本文完稿时间是 2015 年 8 月）已达 17 篇，虽然博士论文仅从 1 增加为 2 篇。再者，虽然「文化例外」一词从 1993 年底已经外传，但长达十年期间，学院对其感应似乎比较慢，至 2004 年仅见期刊文章，未有学位论文。2004 年，中国举办「文化政策国际网络」，2007 至 2009 年，中国历经影音等出版品在 WTO 与美国有所争议，并以败诉告终，可能都是 2005 及 2010 年以后，期刊论文缓增而学位论文明显增加的原因。

在 2010 年，中国学者第一本有关文化产品与 WTO 及 Unesco 的国际法规竞合问题之专书，以翻译英文为中文的形式出场（裘安曼译，2010）。其

后，到 2014 年，至少另有五本出版品，涉及「文化例外」与「文化多样性」这两个概念，其中，直接相关者有两本，下文就对这两本略作介绍与评价（张华，2013；张蹇，2013）。¹⁴

对于数位（数字）产品这个新兴课题（第三章），以及引用「公共道德」作为「一般例外」，主张文化产品与服务可以不必适用自由贸易原则的问题，张华（2013，页 93-99）有更多的着墨。张蹇则对 Unesco 与中国本身对于文化产品的定义及其历史沿革，提出了更为周延的介绍与讨论（第一章），并对从双边（国）、区域至接近全世界范围的 Unesco 与 WTO 的各种国际（投资与贸易）协定，另有相当冗长的介绍（第三章）。

以上两本书对于文化产品的界定，最终都是遵循 Unesco 研拟的「文化统计框架」(Framework for Cultural Statistics, FCS)。不过，假使要能凸显 WTO 与 Unesco 的争议所在，亦即如果真要回到文化例外的呼吁，以及文化多样性公约的制订根源，Unesco 的前引统计，仍然必须改进。

FCS 的第一个版本在 1986 年推出，拟定这份文件的最早的动力，来自许多欧洲国家的文化部长，在 1972 年于芬兰召开了 Unesco 文化会议。其间，仅有一个地方使用了「文化财与服务」(cultural goods and services) (Unesco 1986, p. 2)，没有另作解释「文化财与服务」各是何种内容。十四年后，Unesco (2000) 第一次推出「文化财」的跨国流通统计，又再要五年，Unesco (2005) 才对「文化服务」的跨国文化服务，首度进行统计¹⁵。2009 年，Unesco 将 FCS 作了大规模扩充、说明及阐述，并在英文本出版两年之后，Unesco 另推

¹⁴ 另三本是泛论之作，郭周明（2014）更是蜻蜓点水；陈柏福（2014）从经济学出发，投入三分之一以上篇幅谈国际贸易里问，似乎太多，另一方面，亦可说嫌少，毕竟，明显有别于这些篇幅所论的经贸角度，无论是霍布森（John A. Hobson）出版于 1902 年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或是源出于马克思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或文化帝国主义论说，乃至于米勒等人（Toby Miller et.al.）在 2001 年在《全球好莱坞》(Global Hollywood) (冯建三译，2003) 提出的「文化的新国际分工」，何以不需列入？刘建华（2013：3-4；67,69, 83, 79-81, 97-99, 149, 152）著作的缺失是，虽然多次提及「文化例外」却使其连结于美国的「文化多元主义」，自称要对文化贸易的「历程、动力、约束、输出与输入进行深层结构特征的研究」，但作者却只是凌空俯视，不是入阵厘清。

¹⁵ 文化财与文化服务的统计资料，均由「联合国商品贸易部门」(COMTRADE) 提供，必要时佐以其他来源。

出中文版本。(Unesco, 2009, 2011) 其后, 并没有更新的文化财或文化服务之跨国统计比较; 这就是说, 从 1986 至 2015 的 30 年期间, 文化统计赖以进行的「框架」(FCS) 有两份, 而据此进行「统计」的跨境文化流通之报告, 也有两份。

Unesco (2000, p.V, XV) 的第一份统计说, 这份报告「仅涉及文化财货 (goods) 可以量化的贸易部分」(就是说, 该文化财通过边境时填报的价值), 不是指它们真正的市场价值。

然而, 在大多数, 如果不是所有时候, 文化财货的市场价值 (或说价格), 远远要比该财货在海关填报的价值, 还要大得更多。因此, 根据 Unesco (2000) 的第一份报告, 举世两个最大的文化财货出超国, 在 1998 年依序是日本的 144.51 亿与中国的 132.78 亿美元, 与此相对, 最大的入超国赫然是美国 (218.76 亿美元)。即便不予明查, 任何人对于这些数字立刻会起疑心: 美国的文化工业世界称冠, 就算不统计其他文化产品项的出口, 而仅单只是计算电影戏院的票房, 在 2000 年, 美国本国的数字是 76.6 亿美元票房, 海外电影的比例非常低, 亦即 76 多亿美元的收入, 大多留在美国; 至于外销, 2000 年美国电影的海外票房高达 159.2 亿美元 (MPA, 2006, pp.4-5)。反观中国, 1998 年是中国国片制播数量跌至历史最低 (82 部) 的一年, 票房仅有 14.5 亿人民币, 到了 1999 年春节前后, 更有 18 个卫视频道同播香港电视剧【天龙八部】, 这些都显示当年中国电影工业的经济疲弱体质。

到了第二份统计, 虽然加入「文化服务 (services)」, 但数字无法对应现实的困难, 应该还是没有解决。该份报告先行坦承, 「文化服务的资料匮乏, 国家通常并未将其纳入依法所要搜集的对象...视听服务是唯一还有足够材料可供掌握收支平衡表的部门...显示最大文化服务出口国 (按: 在 2002 年) 是美国的 67 亿美元。」然而, 67 亿美元这个出口值, 单是对照前述的电影票房, 还是低得太多; 并且, Unesco 这份统计显示, 人口两亿多的巴西与十多亿的中国, 在 2002 年的视听与相关服务的出口金额, 竟然低于人口仅近千万的厄瓜多尔, 而巴西、中国与厄瓜多尔等三国视听服务出口金额, 加总起来竟然比匈牙利还要来得少。(Unesco, 2005, p.11, p.46)

「文化例外」与「文化多样性 (公约)」的起源, 诚如 Unesco 的法国委

员会成员所说,「主要涉及两类『产品』: 电影和音像节目。」(李颖译, 2010, 页 67; 另见本期页 179)。再者, WTO 至今的两大一小争议, 中国的重心是电影及音像与其他出版品、土耳其是电影, 而加拿大是期刊, 其共通处在于都是涉及经过机械中介的文化内容。加拿大与美国的期刊出现争议, 与其说纸本出版品也是争论重心, 不如说两国语言相同、地理邻接、期刊通过卫星传送, 加上时代-华纳集团积极游说美国政府, 遂有期刊案所展现的冲突。因此, 如果说 WTO 过去已经是, 而未来若还出现文化贸易的摩擦, 那么, 这些冲突依然将会集中于影音及视听部门。作为流行文化的展现, 透过机械中介的影音图文之影响力, 规模庞大而速度飞快, 乃至可以异地而同时并发, 流行文化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由来已久, 并且, 随着网路、手机……等等新媒体发达的过程, 这类现象也就更加凸显。

若是就此考量, 与其采用 Unesco 为了概括而作的统计分类, 径自取用其中之一, 也就是影音视听服务部门 (audio-visual) 的「内容」而开展论说, 会有可取之处。其一, 张蹇 (2013, 页 23-24) 亦有引述与讨论他人已经建议, 将文化产品分作「硬件」与「软件」之议; 日本与南韩也使用「内容产业」作为其统计框架的构成要件, 中国据此制作亦无困难 (金旻宣, 2012)。再者, 经此转换, 如前所述, 可以恢复并凸显 WTO 与 Unesco 的竞合症结, 从而让历来就有相当多人力从事于研究的电影与电视及流行音乐等部门的成果, 能从文化多样性公约汲取更多材料与养分。如此一来, 目前讨论文化例外与文化多样性公约的人力, 更多是来自人文学科与财经法学的情况, 也会另外得到更多的奥援, 直接相关于影音事业的人, 或许更有机会响应, 入场参与并论述。

最后, 两书作者 (张华, 2013, 页 115-116; 张蹇, 2013, 页 236-242) 都从国际法学理论, 以及文化交流与贸易所生的个案经验, 归纳了即便在 WTO 体制之下, 为了伸张与实践文化多样的价值, 主权国家或作为 WTO 成员者, 可以采行的政策内涵。

值得强调的是, 两位学者的专论所述, 无论是市场准入问题、内容审查、补贴、配额 (或「进口节目与本国节目的比例」)、进口文化产品的税收政策、适度限制外商投资本国文化产业、促进本国文化产品出口, 以及建构文化产

品国际贸易或交流协作机制，并无例外，他们所举的例子及其论说的重点，几乎都是通过不同机械（科技形式）中介的文化内容，特别是电视与电影等影像作品。这就是先前已经再三提出，未来各国（主要就是美国与他国）就文化的跨境流通若是会出现争议，仍然会是集中在影音视听文化。通过网路串流等新形式的传播现象，重要性只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两人所归纳的政策工具，究竟是万变不离其宗而仍然足以因应，或是，如同一些人的主张，即将在科技新形式的冲击与挑战下，不再能够发挥羽翼影音文化的多样产制与交流的空间¹⁶，有待如实思考与建构。

¹⁶ 比如，「配额」这个政策工具是对线型影音模式而定，在选视讯若与串流普及过程，应该通过哪些转换才能落实配额所要达成的目标？两本书似乎都未就此探讨，也都说明在 2010 年至书成的两年多时间，中国是否因 WTO 败诉于美国，其（影音）文化产业产生哪些变化，包括进口电影仍由两家国营事业寡占的持续，是否非关中美的前述 WTO 文化贸易争议？

(表一*1): 中国硕士与博士论文讨论「文化例外」的论文一览

说明: 2015/8/29 以「文化例外」关键字检索「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与「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结果如后:

1. 硕士得 10 篇, 条列如后:

- [1]王芳芳. 国际贸易协定中的“文化例外”问题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15.
- [2]张啸. 国际版权贸易中视听产品分销服务法律研究[D].复旦大学,2015.
- [3]冯庆冉. 论法国大革命与法国文化政策形成之关系[D]. 首都师范大学,2011.
- [4]何俊杰. 文化与贸易冲突[D].上海交通大学,2010.
- [5]任毅. GATS 下境外视听服务市场准入制度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09.
- [6]赵修洪. 全球化语境中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及应对策略[D]. 曲阜师范大学,2008.
- [7] 代彬. 电子商务中数字化产品的分类问题探析[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
- [8]高洁. 从文化贸易看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5.
- [9]赖宏宇. 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安全策略[D].中共中央党校,2005.
- [10] 高兵强. 西方文化产业扩张与当前中西文化关系[D]. 上海外国语大学,2005.

2. 博士得 2 篇 (均以法文书写), 条列如后:

- [1]陈丽娟. 论安德烈·马尔罗时期的文化政策 (1959-1969) [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 [2]叶丽文. 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和法国[D]. 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

〈表一*²⁾〉：中国硕士与博士论文讨论「文化多样性公约」的论文一览

说明：2015/8/29 以「文化多样性公约」关键字检索「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与「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结果如后：

1. 硕士得 2 篇，但若以「文化多样性」检索则硕士得 292 篇，逐篇读其论文名称，得知与「公约」有关者 17 篇（包括前述 2 篇当中的潘东旭，但不含张薇）。二者加总是 19 篇，条列如后：

- [1]潘东旭. 跨境电影贸易的国际法规则适用探究[D]. 吉林大学,2015.
- [2]曹倩倩. WTO 体制下我国进口电影审查制度研究[D]. 外交学院,2015.
- [3]孙梦瑶. WTO 视角下视听产品贸易法律问题研究[D]. 天津师范大学,2015.
- [4]张啸. 国际版权贸易中视听产品分销服务法律研究[D]. 复旦大学,2015.
- [5]张丽丽. 综艺节目模板的版权保护[D]. 西南政法大学,2015.
- [6]迟频. 新闻出版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现状与对策研究[D]. 西北师范大学,2014.
- [7]王冬月. 国际影视贸易壁垒研究[D]. 东华大学,2014.
- [8]陈芳. 文化贸易自由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国际法律冲突与协调[D]. 天津财经大学,2013.
- [9]蔡梦波. 国际文化贸易的法律冲突与协调[D]. 连海事大学,2013.
- [10]董艳.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与 TRIPS 协定之冲突与协调[D]. 郑州大学,2013.
- [11]杨诗勤. 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的法国国家电影干预机制[D]. 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
- [12]王娟. 视听产品进出口贸易法律规制问题研究[D]. 安徽大学,2012.
- [13]蔡蓉丹. WTO 规则下的中国文化产业研究[D]. 天津财经大学,2011.
- [14]张薇. 数字化环境下贸易与文化的冲突与协调：WTO 规则与《保护与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公约》[D]. 吉林大学:2011。
- [15]李静. 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及其启示[D]. 成都理工大学,2010.
- [16]宋韦韦. WTO 体制下视听产品贸易限制问题研究[D]. 山东大学,2010.
- [17]何俊杰. 文化与贸易冲突[D]. 上海交通大学,2010.
- [18]路竞祎. WTO 和 UNESCO 框架下文化贸易自由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冲突与协调[D]. 中国政法大学,2009.
- [19]高洁. 从文化贸易看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D].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5.

2. 博士得 0 篇。但若以关键字「文化多样性」检索，得 23 篇，惟检视后，仅张蹇一篇同时与公约有关；此外，另通过其他机制，编委会得知另有两本博士论文与此相关，因此将 3 篇条列如后：

- [1]李洁. WTO 文化贸易法律制度研究[D]. 武汉大学,2009.
- [2]张蹇. 国际文化产品贸易公法研究[D]. 苏州大学,2010.
- [3]张斌. 国际文化贸易壁垒研究[D]. 山东大学,2010.

〈表一^{*3}〉：中国期刊讨论文「文化例外」的论文一览

说明：2015/8/29 以「文化例外」与「文化多样性公约」关键字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前者得 99 篇，后者得 2 篇，条列如后（若以「文化多样性」检索则得 3977 篇，不另判读个中哪些与经贸有关，亦不条列）：

1. 文化多样性公约

- [1]李河,. 参与“文化多样性国际基金”项目评审的几点观察[J]. 长白学刊,2014,(5).
- [2]张蹇,. UNESCO 文化多样性公约与 WTO 规则之冲突初探[J].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0,(6).

2. 文化例外

- [1]中东动荡与中东治理的新常态[J]. 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1).
- [2]吴毅宏,钱学文,. 海合会国家对外经济合作中的“文化例外”[J]. 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1).
- [3]师晓丹,. 美国数字商品税收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J]. 法学杂志,2015,(3).
- [4]党世丽,. 浅析 TiSA 谈判中电子商务议题所涉相关问题——基于美国、欧盟 FTAs 中所涉电子商务议题的分析[J]. 经营管理者,2015,(6).
- [5]陈靛,. 数字贸易自由化的国际谈判进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5,(3).
- [6]黄先蓉,刘菡,刘玲武,. 法国数字出版法律制度的现状与趋势[J]. 科技与出版,2015,(6).
- [7]陈行之,. 陈行之思想小品辑录[J]. 杂文月刊(原创版),2015,(5).
- [8]王品芝,. 法国长期坚持“文化例外”[J]. 中学生阅读(初中版),2015,(3).
- [9]吴攸,. 文化产业政策与民族文化复兴[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12).
- [10]李祎,.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困局、战略机遇与发展对策研究[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2).
- [11]范春燕,. 解读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政策——西方学者对文化政策的研究及其启示[J]. 国外社会科学,2013,(3).
- [12]周文华,. 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形成、意义及困境[J]. 齐鲁学刊,2014,(1).
- [13]邢进生,马冉,. 试论 WTO 项下文化贸易政策与文化产业政策的冲突与协调[J]. 公民与法(法学版),2014,(3).
- [14]周文华,. 世界文化多样性相关理论分析[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4,(4).
- [15]张莹,. 法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软实力建构——以《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的通过为例[J]. 法国研究,2014,(2).
- [16]翟晓雪,. 关于文物拍卖市场的外资准入问题——以自贸区暂不对外资开放文物拍卖市场为视角[J].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4,(4).
- [17]庄向阳,. 法国例外·文化例外·文化多样性——“多样性修辞”辨析[J]. 中国图书评论,2014,(7).
- [18]《中国图书评论》(月刊)2014 年第 7 期要目[J]. 文学与文化,2014,(3).
- [19]张满丽,. 影像战争:美国的故事与世界的抵抗——关于好莱坞全球扩张的国际贸易争端与公共舆论争议[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6).
- [20]谈谈“文化例外”(笔谈)[J]. 红旗文稿,2014,(19).

「文化例外」与《文化多样性公约》在中国

- [21]沈孝泉,. 法国:“文化例外”是确保文化安全的国策[J]. 红旗文稿,2014,(19).
- [22]吴毅宏,. 沙乌地阿拉伯:在贸易谈判中坚持“伊斯兰文化例外”[J]. 红旗文稿,2014,(19).
- [23]陈家瑛,. 巴西:一边主张自由贸易,一边反对不加区别的自由化[J]. 红旗文稿,2014,(20).
- [24]周菁,. 加拿大对“文化例外”原则的应用及启示[J]. 传媒,2014,(19).
- [25]曲如晓,刘杨,. 贸易开放促进还是抑制了一国文化进步?[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
- [26]李河,. 参与“文化多样性国际基金”项目评审的几点观察[J]. 长白学刊,2014,(5).
- [27]商忱,. 法国电影业复兴之路(下)[J]. 中国电影市场,2013,(11).
- [28]鲁春晓,. 文化入侵背景下我国“文化例外”原则实践研究[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0).
- [29]丁政,. 基于“文化例外”原则的国际文化贸易保护研究[J]. 高等建筑教育,2013,(1).
- [30]吴承忠,牟阳,. 从WTO与“文化例外”看国际文化贸易规则[J]. 国际贸易问题,2013,(3).
- [31]马冉,. 试论文化多样性概念的发展及其对国际法的影响[J]. 公民与法(法学版),2013,(7).
- [32]吴赞,. 当今世界两种图书价格制度比较研究[J].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 [33]动态集锦[J]. 出版参考,2013,(19).
- [34]张盟,. 中美服务贸易纠纷引发的思考与对策——基于对中美出版物市场准入案的研究[J]. 中外企业家,2013,(15).
- [35]王吉英,. 从“文化例外”看法国的文化保护主义政策[J]. 科教文汇(上旬刊),2013,(10).
- [36]王璇,. 法国文化政策下的文化遗产保护[J]. 财政监督,2013,(27). [44]安娜·帕拉西奥,. 通往自由贸易的地区途径[J]. 中国新闻周刊,2013,(29).
- [37]沈孝泉,. 文化例外:法国保护本国文化的盾牌[J]. 时事报告,2013,(9).
- [38]夏国涵,. 法国文化产业的国家战略[J]. 才智,2013,(31).
- [39]温晓红,.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化的市场失灵及应对[J]. 经济论坛,2012,(1).
- [40]何其生,张哲,. 国际自由贸易中的“文化例外”原则[J]. 公民与法(法学版),2012,(5).
- [41]杨均华,刘吉发,. 文化国际贸易发展的意义、模式和市场战略思考[J]. 商业时代,2012,(35).
- [42]张斌,. 国际文化贸易中文化保护所面临的局限性[J]. 湖北社会科学,2011,(3).
- [43]崔斌箴,. 法国政府对图书出口很“给力”[J]. 出版参考,2011,(9).
- [44]解奥衍,张杨,. 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国际文化产物贸易思考[J]. 法制与经济(中旬刊),2011,(3).
- [45]韩卓,. 浅析全球化与文化冲突[J]. 经营管理者,2011,(10).
- [46]肖庆,. “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J]. 文化艺术研究,2011,(2).
- [47]李健彪,赵建婷,. 全球化背景下花儿的保护与传承[J]. 民间文化论坛,2011,(5).
- [48]张颖,. 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战略研究[J]. 当代经济管理,2010,(1).
- [49]孟宪平,. 论文化全球化中的边界意识及影响因素[J]. 理论学刊,2010,(5).
- [50]贝尔纳·古奈,李颖,苏哲,. 反思文化例外论[J]. 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0,(3).
- [51]朱岚,. 文化自信与文化的交流合作[J]. 重庆社会科学,2010,(12).
- [52]陈伯祥,. 翻译思考:exceptionnel是“无与伦比”吗?[J]. 法语学习,2009,(1).
- [53]马冉,. WTO体制中自由贸易与文化多样性问题初探[J]. 法制与社会,2009,(9).
- [54]胡珊珊,. 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冲突[J]. 襄樊学院学报,2009,(3).
- [55]马冉,. 论WTO自由贸易体制内文化政策的选择空间——兼论中国文化政策措施的建议[J].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2).

- [56] 马冉,. 文化贸易领域欧洲政策法规研究[J]. 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3).
- [57] 岳振宇,. 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双重性[J].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 [58] 马平,. “优胜劣汰”法则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J]. 宁夏社会科学,2009,(3).
- [59] 马冉,. 试析文化与贸易的冲突与协调[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9,(2).
- [60] 宋蒙,. 从“文化例外”看当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中的几个问题[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 [61] 黄安平,. 论中美文化贸易争端中的若干法律问题[J]. 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9,(7).
- [62] 张赛花,.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以美国为例浅谈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多元性趋向[J]. 青年文学家,2009,(7).
- [63] 张杰,. 文化自觉、文化战争、文化立国——世界“现代性”进程中的文化三部曲[J]. 南京社会科学,2008,(2).
- [64] 闫肖锋,. 《新周刊》的全球观——看清世界,读懂中国[J]. 青年记者,2008,(12).
- [65] 王晓德,. 全球自由贸易框架下的“文化例外”——以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抵制美国文化产品为例[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12).
- [66] 张杰,. 文化产业的双重本质与发展战略[J]. 长江学术,2007,(1).
- [67] 宋磊,. 20 世纪欧洲漫画的变迁[J]. 美术观察,2007,(11).
- [68] 何向,. 浅谈法国民族主义与其文化政策[J].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3).
- [69] 马冉,. 浅议文化多样性在 WTO 中的发展[J]. 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6,(7).
- [70] 黄力之,. 再论文化帝国主义问题[J]. 思想战线,2006,(1).
- [71] 刘海静,. 全球化的文化内涵与文化殖民主义[J]. 理论导刊,2006,(2).
- [72] 李宁,. “自由市场”还是“文化例外”——美国与法-加文化产业政策比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5).
- [73] 刘俊,. 米老鼠和好莱坞的背后[J]. 华人世界,2006,(10).
- [74] 陈弦章,. 知识时代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思考[J]. 龙岩学院学报,2006,(1).
- [75] 姜飞. 欧洲的文化保护意识和策略[J]. 对外大传播,2005,(10).
- [76] 马平. 现代化的碰撞与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J]. 宁夏社会科学,2005,(1).
- [77] 金柄亮. 给文化安全加把锁[J]. 编辑学刊,2005,(1).
- [78] Monks during the Period of Six Dynasties: Special Messengers of Cultural Exchange[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05,(1).
- [79] P.M. 得法尔热,灵隐. 国际社会与文化多样性[J]. 国外社会科学,2004,(1).
- [80] 郭京花. 从文化多样性看法国外交[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1).
- [81] 单万里. 法国“文化例外”主张的衰亡[J]. 读书,2004,(7).
- [82] 于沛. 反“文化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文化多样性的思考[J]. 史学理论研究,2004,(4).
- [83] 刘轶. 他山之石:美、英、法、韩等国的文化政策[J]. 社会观察,2004,(4).
- [84] 石中英. 论国家文化安全[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 [85] 陈熙. 文化主权、文化产业与全球化趋势[J].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3,(1).
- [86] 翟华. 法兰西例外[J]. 课堂内外(高中版),2003,(9).
- [87] 夏云珍,王云飞. 简析冷战后的美国文化霸权[J]. 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 [88] 李怀亮. 中美文化贸易的新特点及中国入世后的对策[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 [89] 关世杰. 把握世界文化发展趋势 寻求中国文化发展对策[J]. 国际新闻界,2002,(1).
- [90] 肖云上. 法国为什么要实行文化保护主义?[J]. 法国研究,2000,(1).

「文化例外」与《文化多样性公约》在中国

- [91] 聂震宁断想^⑩——WTO:与狼共舞[J]. 出版广角,2000,(2).
- [92] 小知识[J]. 党政干部文摘,2000,(3).
- [93] 马肇元. 传媒学的创立、内涵及意义——雷吉斯·德布雷一席谈[J]. 国际新闻界,1997,(2).
- [94] 阿娜日娃. 精英文化例外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馆价值取向的理性选择[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7,(2).
- [95] 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J]. 外国文学评论,1996,(2).
- [96] 洪晓东. 美国同欧盟在视听服务谈判中的争端[J]. 国际贸易,1995,(3).
- [97] 刘世文. 面对市场经济图书馆应坚守精英文化例外论[J]. 山东图书馆季刊,1995,(1).
- [98] 刘世文, 刘丽. 论图书馆与非市场文化[J]. 图书馆建设,1994,(4).
- [99] 晓春. 视听产业及贸易——乌拉圭回合中的顽石[J]. 经贸世界,1994,(3).

订 阅

零售：每期新台币 500 元

个人订阅：国内一年两期 1000 元

海外一年两期 1500 元(或 50 美元)

机构订阅：国内一年两期 2000 元

海外一年两期 3000 元(或 100 美元)

以上均含挂号邮资

邮政划拨户名 社团法人媒体改造学社

邮政划拨帐号 50313103